

先秦巴蜀



毛曦◎著

XIANQIN BASHU CHENGSHI SI YANJIU

城市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先秦巴蜀 城市史研究

毛 曦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辉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毛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01-006960-9

I. 先… II. 毛… III. 城市史-研究-四川省-先秦时代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189 号

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

XIANQIN BASHU CHENGSHI SHI YANJIU

毛 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6960-9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史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推进。对于中国早期城市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早期区域或方国城市的研究,应是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强化和拓展的学术领域。毛曦教授在四川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以先秦巴蜀城市的历史发展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规律进行探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2004年5月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出站,本书就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本书首次以先秦巴蜀城市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研究,是作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我想这一成果的面世,必将对早期城市研究、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以及巴蜀古代文明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观全书,我觉得这部著作具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和值得肯定的方面:

第一,选题新颖且富有价值。长期以来,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对先秦时期中国早期城市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固然受到了历史文献资料欠缺的局限,而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城址考古的巨大进展,促进了中国早期城市史的研究。此

外,由于城市与文明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高度关注,也促成了中国早期城市研究热点的形成。在中国早期城市研究中,从区域或方国的角度进行探讨,无疑是深化和拓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步骤。本书从区域空间的角度,对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相关理论进行一定探讨,这一课题成果的面世,对于深化中国早期城市研究和古代巴蜀城市研究,促进巴蜀古代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研究,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和较高的价值。

第二,重视对研究现状的总结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吸收。学术研究的推进总是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和新的起点,因而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对研究的状况进行总结与分析,以便确立新的课题和研究的方向。本书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的现状和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向,使其课题研究站在了学术的前沿。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十分重视对已有的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如对古蜀国城市历史的研究,既注意到历史考古方面的成果,也注意到了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果。又如在认识三星堆古城性质时,既重视对国内已有相关成果的吸收,也重视对美国、日本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在征引他人成果时,均能详细予以注明。这些做法体现出作者既博采众家之长又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第三,重视史料的占有和运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从本书来看,作者在史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先秦城市史,尤其是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中,考古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局限,研究的深化和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考古工作的推进。近年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史前城址、三星堆古城、金沙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发掘,

为巴蜀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作者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作用,搜集占有了本专题已有的相关资料,并大量使用了新发掘的考古学成果。此外,作者还重视对仅有的文献资料的辨析与运用,重视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并重视将各种资料综合加以运用,进行分析并形成认识。对于史料的全面占有和科学运用,使得本书的立论建立在了可信的基础之上,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所具有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

第四,研究方法富有特色。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突出的一点就是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密切结合,正如谭继和研究员在鉴定意见中所指出:“难能可贵的是,该课题对巴蜀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二者做了对接工作,并以考古资料为主,以文献资料为辅,构筑了巴蜀古典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新框架,这是城市文明史新的研究方向,是城市文明研究思维的革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应该说,本书在研究古代巴蜀城市的方法上对传统方法有所突破,具有创新之处。此外,本书重视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采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及城市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来看,本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表现出作者富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第五,对于巴蜀城市研究富有创见。关于古代巴蜀城市的研究,已有不少著作有所涉及,但以此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研究,本书则为首创。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论证,具体而明确地勾勒出先秦巴蜀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剖析了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空间特征以及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构建出作者关于古代巴蜀城市研究的理论框架。另外,在一些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本书也不乏新解。如关于古蜀国杜宇时代城市发展的研究,提出在杜宇时代,成都城市

开始建设并与三星堆鱼凫古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又如,对于古蜀国蚕丛时代、鱼凫时代、杜宇时代及开明时代等的时间范围等问题,都具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本书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专门研究,在同类研究成果中个性显明,富于创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

第六,重视理论的分析 and 探索。浓厚的理论色彩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书中对于城市史学的理论以及中国早期城市研究的相关理论等进行了专门探讨。作者讨论了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与国家、文明、民族历史发展的同步关系,特别是引用与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B 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来阐明自己的论点,既体现了理论的深度,又表明了作者的指导思想明确。本书所分析提出并归纳总结的关于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历程,城市形成标准的界定应考虑到城市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和地域差异等论断,均属科学的学术总结,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体现出作者浓厚的理论兴趣和丰厚的理论素养。

总的来说,本书选题新颖,材料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理论性强,特点突出,富于创新,是一部以古代巴蜀城市为研究重点的有特色、有学术水平的研究专著,是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新成果。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由于材料的局限,认识的深度和全面性还有待加强,随着相关考古发现的进展,需要继续搜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不断完善和加宽加深这一研究;二是对于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宏观系统的研究,仅以巴蜀地区作为个案进行专门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其他区域的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早期城市史进行综

合的整体研究,以期对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是作者今后城市史研究需要重点着力所在。

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毛曦同志博士后在站期间的导师,看到其研究成果的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长绳系日,天道酬勤。”希望毛曦教授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进,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廖立涛

2005年10月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目 录

序	隗瀛涛 (1)
第一章 先秦城市史研究略论	(1)
一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现状	(2)
1. 城址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2)
2. 城市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8)
3. 先秦都城研究	(17)
4. 先秦城市发展的宏观研究	(20)
5. 国外先秦城市史研究	(25)
二 先秦城市史研究中的问题	(29)
1. 资料问题	(29)
2. 研究理论滞后	(31)
3. 认知结构有待完善	(32)
4. 跨学科研究较为薄弱	(33)
三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趋向	(35)
1. 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开展	(35)
2. 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	(37)
3. 城市内涵的多层面研究	(38)
4. 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	(39)

第二章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现状与相关说明	(41)
一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现状	(41)
1. 总体研究	(42)
2. 蜀国与蜀地城市研究	(44)
3. 巴国与巴地城市研究	(49)
二 选题说明	(51)
1. 提出与意义	(52)
2. 范围限定	(53)
3. 研究思路	(53)
第三章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55)
一 城市史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背景	(55)
1. 社会发展的推动	(56)
2. “城市史学”的形成	(57)
3. 城市史研究的传统	(60)
4. 多学科发展的推动	(63)
二 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方法	(65)
1. 城市史与城市史学的学科属性	(65)
2. 城市史学的学科特点	(67)
三 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深化	(71)
1. 综合性的宏观系统研究	(72)
2.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73)
3. 考古学资料的充分利用	(73)
4. 城市发展规律的探寻	(74)
5. 城市史学的理论建构	(75)
第四章 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理论探讨	(77)
一 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	(77)

1. 城市的界定和标准	(77)
2. 中国城市的起源	(87)
3. 中国城市的形成	(91)
4. 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	(93)
5.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特点	(98)
二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与国家、文明、民族演进的关系	(102)
1. 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103)
2. 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106)
3. 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108)
4. 城市与国家、文明及民族演进的关系	(110)
第五章 古代巴蜀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	(113)
一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	(113)
1. 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114)
2. 温带亚热带的自然环境	(116)
3. 邻近水源的平原台地	(118)
4. 经济活动的发达地区	(119)
二 古代巴蜀城市的历史地理环境	(121)
1. 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	(121)
2. 地形特点	(124)
3. 生产与经济的发展	(126)
4. 早期文化遗址的分布	(129)
第六章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与古蜀国城市的起源	(133)
一 史前城址概况	(133)
1. 新津宝墩城址	(134)
2. 郫县古城城址	(136)
3. 温江鱼凫城址	(138)

4. 都江堰芒城城址	(140)
5. 崇州双河城址	(144)
6. 崇州紫竹城址	(146)
7. 大邑盐店城址和高山城址	(147)
8. 小结	(148)
二 古蜀国城市的起源	(154)
1. 蚕丛与柏灌时代	(154)
2. 宝墩文化城址与城市起源	(160)
第七章 三星堆城址与鱼凫王朝的国都	(165)
一 三星堆遗址及其社会性质	(165)
1. 遗址概况	(166)
2. 鱼凫王朝与三星堆古城	(170)
3.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	(176)
二 鱼凫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	(180)
1. 鱼凫王朝的国都	(181)
2. 鱼凫王朝城市的探寻	(186)
第八章 杜宇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	(189)
一 杜宇王朝的兴亡	(189)
二 杜宇时期的蜀国城市	(194)
1. 郫邑与瞿上	(195)
2. 金沙遗址与十二桥遗址群	(197)
3. 杜宇时期的成都	(202)
第九章 开明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	(208)
一 开明王权的更替	(208)
二 开明时期的蜀国城市	(212)

1. 成都	(213)
2. 广都和新都	(218)
3. 一般城市	(220)
第十章 巴国城市的发展	(222)
一 巴族迁移和巴国城市	(222)
1. 民族迁移与社会演进	(223)
2. 巴国的城市	(228)
二 环境、文化与巴国城市	(235)
1. 巴国城市的特点	(235)
2. 环境与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237)
第十一章 巴蜀郡县城市的发展	(241)
一 巴蜀郡县的设立	(241)
二 蜀郡郡县城市	(244)
1. 郡治成都	(244)
2. 县治城市	(249)
三 巴郡郡县城市	(253)
第十二章 先秦巴蜀城市的特点与地位	(256)
一 巴蜀城市的特点及其成因	(256)
1. 城市发展的特点	(256)
2. 城市特点的成因	(261)
二 巴蜀城市的历史地位	(263)
1. 巴蜀地区城市史上的特殊时期	(263)
2. 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264)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88)

图表目录

表 4—1	中国城市、国家、文明、民族同步演进表	(111)
图 5—1	中国史前城址分布示意图	(122)
图 5—2	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130)
图 6—1	新津宝墩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135)
图 6—2	郫县古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137)
图 6—3	温江鱼凫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141)
图 6—4	都江堰芒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143)
图 6—5	崇州双河古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145)
图 6—6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分布示意图	(148)
表 6—1	考古发现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状况表	(149)
图 7—1	三星堆遗址分布示意图	(170)
图 7—2	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商周遗址分布图	(178)
图 8—1	十二桥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199)
图 8—2	成都金沙遗址位置示意图	(203)
图 10—1	巴国城市分布示意图	(232)
图 11—1	蜀郡成都城市平面示意图	(248)
图 11—2	巴蜀郡县城市分布示意图	(250)

第一章 先秦城市史研究略论

先秦史(现代史学界亦称为上古史)研究的时段一般主要是指夏朝建立至秦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①然而,在中国早期城市史的研究中,为了搞清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状况和规律,研究时段自然应向上延伸到史前时期^②。事实上,史前时期是城市起源的重要阶段,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对先秦城市史研究现状的总结和分析乃至全书内容的完成均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即研究的时间范围包括了先秦和史前时期。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先秦史

① 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广义的历史包括了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而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狭义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前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出现并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这种现象源于史学界对历史的广义和狭义的新的诠释:“广义的历史,指人类以往全部的发展过程;狭义的历史则仅仅是能够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人类历史。”史前史(prehistory)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即狭义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然而史前史的下限却难以确定,至今史学界关于史前史的具体范围尚无统一标尺。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史前史的下限说法不一,如有人把中国的商代仍然划在中国的史前时期。我国史学界的多数意见认为中国的史前史应是指夏代国家建立以前的历史。(可参考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2页)

研究呈现出新的热潮,加之中国城市史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先秦城市史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先秦城市史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已有的研究,反思存在的问题,把握研究的方向,无疑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是十分有益的。

一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现状

就目前先秦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来看,涉及了先秦城市史的方方面面,当然,在学术研究中也形成了一些讨论的热点,下面仅以这些热点问题为中心,对国内外中国先秦城市研究的状况做一总结。

1. 城址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欠缺以及释读中的困难,包括先秦城市在内的先秦历史研究对于考古发现的遗迹和出土文物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整合,不失为先秦城市史研究的一条良好途径。每一次重大的相关考古发现,无疑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为中国城市史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古代城市考古、古代都城考古、古代宫城考古、古代宫殿考古等遂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领域或分支。^①

城市史的研究必然要追溯到史前时代,《史记·封禅书》记

^① 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载《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杨鸿勋:《宫殿考古学研究》,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版。

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吕氏春秋·贵因》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世本·作篇》又记载：“鲧作城郭。”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史前筑城的记载。大量的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并大力推进了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史前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期，几乎贯穿了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①“目前发现的这类城址，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千年的一段时期，分属于 8 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区可划为四大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另外还有与此相关的长江下游太湖地区。”^②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现了近 60 座史前城址，并且呈现出不断增多的态势。^③ 这些城址的不断发现，为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城市乃至中国文

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②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 年第 1 期。

③ 据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3 期）一文，“自 1949 年至 1996 年，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近 50 座”；又据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 年第 1 期）一文，我国史前城址“总数约 50 座左右”；再据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书的统计，“考古工作者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现了 50 余座夯筑或石砌城址”；据该书后记判断，所据资料当不会晚于 2000 年 6 月。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史前城址考古又有了新的进展，新的城址不断发现，如 2003 年在成都平原又发现了两座史前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成温邛高速惊醒“第七城”》，《成都日报》2003 年 1 月 16 日 B1 版；4000 年前成都平原腹心

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之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夏商西周三代城市考古中,夏代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而且争议颇大。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夏代城市,学者们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和其中大量传说成分的存在,研究结论尚需得到相关考古发现的证实。关于夏代城址,较前发现的有夏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1处^①和夏方国城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1处。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学术界虽存有异议,但从遗址本身的材料及其与河南偃师商城的关系上看,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都城之一。^②近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探明12万平方米左右的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的线索,在弄清二里头遗址都城总体结构和布局上取得重要突破。“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表明,这里是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

就有人住》,《华西都市报》2003年6月1日第1版);使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数目由6座而变为8座;又如2003年10月在陕西省佳县发现了4500年前的古城,这是陕西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佳县发现4500年前古城堡》,《华商报》2003年10月11日第4版);到目前为止,城址总数继续攀升,故这里提出到目前为止我国史前城址已经有近60座。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②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都城遗址。”^①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无论是对于夏代历史研究,还是对于中国早期城市研究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河南辉县孟庄遗址被评为199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该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夏及商代3个时期的三叠城,其中龙山文化城址为河南同时期最大的古城址;夏代城址在中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夏、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②此外,2002年3月至2003年12月对河南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进行了发掘,确认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③2006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郧县汉江边的辽瓦遗址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代城址,“这一发现为史料稀少的夏代研究找到了新的文物实证”。^④夏代城址的不断发现,为研究夏代城市乃至夏代历史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目前发现的有河南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陕西扶风和岐山境内的周原遗址、西安附近的丰镐遗址和洛阳洛邑遗址等。考古发现聚落形态较为清楚的商代方国城址有河南焦作府城村古城遗址、山西垣曲古城遗址、夏县东下冯古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等数处。西周时期大量分封诸侯国,目前,诸侯国的都城大多有线索可查,但这些城址多未经正式发掘,或未见考古报告发表,具体情况难以搞清。现在可以确认的

① 《夏都城遗址布局搞清: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华商报》2003年10月14日第7版。

② 《'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

③ 《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16日。

④ 《南水北调库区发现夏代城址》,《光明日报》2007年4月11日。

有城垣存在的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都城遗址仅有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1处。此外,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两处西周城址,分别是列入“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和2006年新发掘的湖北麻城金罗湾西周城址。^①西周城址在长江流域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城市地理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夏商西周时期周边的邦国部族城址近年来也屡有发现,属于我国东部的岳石文化和东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已发现多处,属于陕西山西北部的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城址见于报道的仅有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属于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城址仅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1处。^②以上城址的发现,对于夏商西周城市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数目较多,已经见于报道或已公布材料的达428座。到目前为止,各列国的都城遗址大多已发现,其中做过系统发掘、布局较为清楚的周王朝和主要诸侯国都城遗址有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陕西凤翔秦都雍城、临潼秦都栎阳、咸阳秦都咸阳、山西侯马晋都新田、夏县魏都安邑、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易县燕下都、平山中山灵寿、湖北荆州郢都纪南城、安徽寿县楚都寿春等。这一时期的一般城市与军事城堡更有着大量的发现,其中,面积在1平方公里至10平方公里的城址有100座,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下的有201座。^③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快速发展时

① 《湖北首次发现西周城址 全国仅8处 有助于研究楚文化起源》,《长江日报》2006年2月11日。

②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7页。

③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84—125页。

期,也是中国城市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先秦城市的研究当中,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加之城址的大量发现,为其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先秦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相伴随,关于考古发现的先秦城址的各种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①、《曲阜鲁国故城》^②、《燕下都》^③等著作和考古报告的出版即是明证。在诸多研究成果当中也不乏理论色彩较强的综合性研究。苏秉琦1986年发表论文《陕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提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市,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④严文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一文,将史前城址置于聚落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开拓了史前城址研究的新的视野。^⑤此外,这一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任式楠的《中国史前城址考察》^⑥、张国硕、阴春枝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⑦、曹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④ 苏秉琦:《陕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又见《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0—131页。

⑤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⑥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⑦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兵武的《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①和《中国史前城址略论》^②、徐良高的《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③等。还要特别提到许宏的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该书“所收田野考古的资料截至于1998年，是目前所见关于先秦城市考古学第一本最为完备的学术著作”。^④作者对所有已知的先秦城市遗址进行了认真系统的综合性的整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先秦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等许多富有创新的见解，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徐良高在其《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一书中列专章《辉煌与穷困：从聚落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对先秦城市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具有新意的看法。^⑤

2. 城市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城市起源的研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秦城市史研究的起点。学术界对于中国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⑥，多年来一直是先秦城市史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这

① 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曹兵武：《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③ 徐良高：《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载《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徐苹芳：《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序，载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79页。

⑥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一方面的学术成果极其丰硕,然而至今仍然难以就某些核心问题形成基本的共识。关于中国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对城市形成标准和城市起源时间的讨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要弄清中国城市的起源问题,首先必须搞清城市产生的标准有哪些,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学者从内涵方面对城市形成的标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俞伟超指出:“只有到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时,城市才算真正形成。在通常情况下,这个时期便是文明时代的初期。”“不能拿城墙的出现与否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发生时间的标志。”“判断一个遗址是否为城市,关键要看这个遗址的内涵是不是达到了进行城市活动的条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不是具有出现城市的可能。”^①张光直提出,城市最初出现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史的过程中,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变化标志出来的。他以商代的城市为依据,列举了城市的五项标准: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宫殿、宗庙与陵寝;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迹;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整性。^②李先登认为:城市内涵的物质表现主要是城墙与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城墙是主要的防卫设施。宫殿、宗庙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③郭正忠强调“可以称之为‘城市’的聚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即具备城

①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又见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 李先登:《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郭,或者具备一定规模而又大致稳定的市场。”^①高松凡、杨纯渊列举了判断城市起源的三条标准:一是多职能(至少两种)的复合体;二是人口、手工业、贸易、财富、建筑、公共设施集中的场所;三是人口密度高,主要从事非农业的职业。^②许宏则指出:“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组织是国家,而与国家相应的、作为国家的物化形式的聚落形态则是城市。鉴此,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③

有不少论著从现代城市的本质和特点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准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张全明认为:“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基本的标志。”^④谢仲礼通过城市与乡村的比较,归纳出城市的特征:第一,人口密度、生产力水平、商品贸易的程度高于乡村,表现为大量房屋和手工业作坊基址的发现;第二,布局较乡村规整;第三,有较严密的防卫体系,大多有城墙或者壕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第四,一般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往往表现为规模宏大的建筑的出现;第五,已出现公共设施,如铺设地下排水道等。^⑤何一

① 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高松凡、杨纯渊:《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讨》,《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③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④ 张全明:《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⑤ 谢仲礼:《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民提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形成，不是看它是否修筑了城墙，而是应该看它是否具备了城市的基本特征。”认为早期城市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三个方面：一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筑物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规模；二是具有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和军事据点的职能；三是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兴盛，初步具有经济职能。^①

西方学者关于城市形成的标准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促进了中国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早在1948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就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②1950年，他又发表文章，提出“很可能，城市生活就开始于文明时代”，从考古材料概括出城市形成所具有的10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可容纳更为稠密人口的大型聚落的形成；二是人口构成与功能呈现多样化；三是纳税及其剩余产品的集中化；四是巨大的公共建筑的出现；五是出现了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六是发明了文字及精确的、实用的科学；七是几何学与天文学进一步精确化；八是形成了专职的艺术家；九是对外贸易已经出现；十是以地域而非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形成。^③柴尔德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提出异议者也不少。西方有学者指出，柴尔德的十条标准对中美洲城市起源和印加帝国的早期城市发展并非完全适用，标准中列举的一些特征与城市起源并不必然相关。^④柴尔德提出的这些标准到底是否适用于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历史实

① 何一民：《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

② [英]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

③ [英]柴尔德著、陈星灿译：《城市革命》，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陈淳：《城市起源之研究》，《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

际呢?国内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徐良高将中国三代时期城市的特征同这十项标准相比较,发现其中第一、三、四、五、七项两者基本相同,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余各项则相差甚大,表现出文化发展的个性特征:在中国三代城市中,大量农业人口依然存在,从事着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与西亚各城市中心存在的美术的差异不同,三代城市规模呈现等级化,美术特征又表现出统一性;作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中心的证据几乎不见;与财富的经营迫使西亚文字发明不同,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促使了中国文字的产生;血缘组织一直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城市内表现为聚族而居和家族墓地的存在,宗庙为城市核心。^①这种深入的讨论对于从理论上揭开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谜团无疑是积极有益的。

此外,王妙发从地理学意义上提出了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准,反复强调“都市与否的判断主要应该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判断的方法应该是地理学的方法”,早期都市的形成问题,“主要应该是从聚落功能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同时,在都市和村落两个概念之间,又提出了一个似都(城)聚落的概念。^②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学术观点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城市形成于何时?这是城市起源讨论中又一个重要的问

^①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② 王妙发:《论长江流域早期都市》,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王妙发、郁越祖:《关于“都市(城市)”概念的地理学定义考察》,《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妙发:《略论似城聚落》,《地理科学》1992年第1期;王妙发:《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题。有的论著立足于文献资料,有的从考古资料出发,有的则将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璧合,学者们就此充分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总的来看,所提出的观点可大致归纳为六种:

一是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追溯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汉书·食货志》晁错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根据古史传说和考古发掘判断,神农之世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在中国,这种从氏族聚落向城市的转化是从神农之世开始,到唐虞大禹之际完成的。”^②目前,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史前城址考古发现已有3座,这些城址可否作为中国城市开始形成的依据,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二是主张中国城市始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文献记载黄帝时期开始筑城。《史记·封禅书》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又记载舜世筑城。《吕氏春秋·贵因》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文献中还记载夏鲧开始作城。《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这些文献记载反

① 唐明邦:《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曲英杰:《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

映的时代属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已开始筑城,大量的龙山时代的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说明中国城市早在龙山时代就已开始形成。^①“到了龙山时代,许多城址的结构和内涵已明显有别于一般聚落,在城乡分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具有早期城市性质,标志着城乡分化格局的出现。”^②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可以说,这一观点已逐渐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

三是主张中国城市始于夏代。有文献记载夏禹开始筑城。如《太平御览》卷192引《博物志》云:“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夏代城址也证实了夏代城市的存在。傅筑夫认为:城市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城市的产生,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阶级社会的产生时期,具体说,奴隶占有制的形成时期,便是城市的开始时期。”主张夏代“是古代城市的开始时期”。同时又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③

四是主张中国城市形成于殷商时代。“我国的城,最初见于

①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李先登:《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②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③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早商时代。”^①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中提出:邑既是城又是国家,古代的城就是国,国就是城,“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②

五是主张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时期。马正林提出:“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因为人口众多和有市场是城市的基本标志,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之为城市。”^③

六是主张中国城市起源于春秋时期。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的《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何健民译,见《时事类编》1937年第5卷第9期)认为:城市的形成与铁器生产工具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即中国城市形成于春秋时代。^④张鸿雁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⑤

与中国城市起源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的关系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蔡凤书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基础,文字的使用和通行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文明标志的关键在于城市和文字。”^⑥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城市是

① 《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2页。

③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④ 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⑤ 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⑥ 蔡凤书:《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①多数学者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②,因而对史前城址和早期城市的讨论便自然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有学者主张中国城市的形成早于文明的产生^③;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出现要晚于文明的形成^④;而多数意见则将城市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本上赞同城市和文明是同时形成的。如吴春明撰文认为:不断发现的史前城址是中国文明漫长起源期的历史反映,仰韶时代的城市代表了中国文明的萌芽和奠基,龙山时代的城市的繁盛是文明即将诞生的标志,夏以前的中国不属于文明社会。^⑤孙广清提出:在较大的史前城址的周围,分布着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聚落遗址群,甚至还有一些小型城址存在,产生了众多的方国文明。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中原地区形成了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⑥马利清在文章中通过对照有关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认为史前城址“应是早期城邦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华夏文明的起源应从这里去追溯”。^⑦关于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还要特别提到的是钱耀鹏所著《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一书。正如严文明在该书《序》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②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③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⑤ 吴春明:《史前城市的考古新发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⑥ 孙广清:《中国史前城址与古代文明》,《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⑦ 马利清:《从早期城址看华夏文明的起源》,《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中所言：“它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我国史前城址以探索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著作。”作者将文明起源的要素分为物化形态要素和社会形态要素，认为城市是极为重要的物化要素之一；认为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不等于文明社会的形成，惟有诸多要素的同时存在才表明文明社会的形成；我国城乡分化意义上的早期城市出现在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①

3. 先秦都城研究

对于都城的研究向来在城市史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先秦城市的研究中情况更是如此。这固然是都城在城市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和先秦时期都城的历史状况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郡县城市兴起以前，国家形态以都城为中心，“国”与“城”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义语，从史前城址多为一方之中心，到夏商西周三代，多数城市要么为王朝之都城，要么为方国之都城，要么为周边邦国部族之“都城”，都城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先秦城市研究中都城研究的突出位置。到目前为止，关于先秦都城研究的论著极其丰富，研究的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下面仅就重要的论著略加综述。

近年来，我国都城史研究出版和发表的论著颇多，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不少论著都对先秦城市发展有或多或少的论述。^②在通论中国都城的著作中，对于先秦都城的发展自然有所论及。史念海著《中国古都和文化》在倡导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同

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时,分析了古都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总结了古都形成的自然环境、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社会基础等条件,综论了包括先秦都城在内的中国古都及历代陪都的数目、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方面的内容。^① 叶晓军在《都城论》一书中论述了中国都城的规制、类型以及历史上的陪都制等方面的内容。^② 在此之前,作者在《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一、二、三、四集)一书中将中国都城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二里头文化以前,可称为“萌芽期”;从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时期,是“雏形期”;秦汉至隋唐是“发展期”;宋、元、明、清是“成熟期”。^③ 此外,还出版有《中国都城发展史》^④等著作。这些著作都论及了先秦都城的发展情况。

关于先秦都城研究的专著,首先应提及的是曲英杰所著《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该书对《史记》所载王权及诸侯国的 86 座都城给予了包括地望、方位、原貌、布局、特点、沿革等方面的全面系统的考述,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⑤ 此后,作者又发表了《楚吴越三都城综论》一文,以互补之法揭示出楚都郢城、吴都吴城及越都越城的初始面貌,认为三城皆出于楚人之手,体现了楚人崇尚天道的观念。^⑥ 徐卫民著《秦都城研究》一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秦国都城(包括秦统一以前秦国不断迁徙的都城及统一后的都城咸阳)进行了系统研究,是“第一部关于秦都城之全景式综合性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② 叶晓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叶晓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一、二、三、四集),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1987 年版。

④ 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⑥ 曲英杰:《楚吴越三都城综论》,《东南文化》1992 年第 2 期。

研究著作”。^① 郭德维著《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对楚都纪南城做了专题性的复原研究，其中不乏新的创见。^② 此外，朱彦民出版了《殷墟都城探论》，对都城殷墟进行了系统研究。^③

对于都城规划和都城制度的研究是先秦都城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俞伟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分散存在的特点，是初期阶段都城的形态；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确立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第二阶段形态；从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是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后封建等级制森严时期的都城形态；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阶段的形态。^④ 贺业钜在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研究中，认为《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营国制度”是对西周城市建设高潮中城邑建设制度的全面总结，春秋战国之际的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又促使规划制度的再次变革。^⑤ 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提出，西周初年的东都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布局，这是“坐西朝东”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表现，这种布局对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都

① 朱士光：《〈秦都城研究〉序》，载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朱彦民：《殷墟都城探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⑤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年版；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年版。

城都产生了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西汉都城长安的布局。^①新近出版的张国硕著《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一书,对夏商王朝时期的都城情况及其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专门研究,提出夏商时代推行的是主辅都制。^②

关于先秦都城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大,此不列举。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专门研究中国都城的学术组织中国古都学会,自1983年9月在西安成立以来,学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交流,学会主办的《中国古都研究》目前已出版20余辑,发表包括先秦都城在内的专业研究论文,促进了包括先秦都城在内的中国古都的学术研究。

4. 先秦城市发展的宏观研究

关于先秦城市史的宏观研究,不仅通论性质的中国城市史著作中有所涉及,而且更有专门的论著做了一定的专题研究,其中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先秦城市的发展阶段、先秦城市的特质等问题上。

近年来出版的通论性质的中国城市史著作,其中涉及对先秦城市史的宏观论述。何一民著《中国城市史纲》将中国城市史的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此外,杨宽还专门讨论了战国和秦代都城设计对于汉长安城的影响,其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1984年和1989年杨宽著文指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承袭了战国和秦代都城布局模式,有西边小城与东边大城郭连接而成,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内。若干年后,考古学家刘庆柱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布局并不一致,不能以某些都城作为普遍模式概而论之。关于杨宽提出的大郭依据,刘氏指出,它们不过是汉代桥和墓葬遗址;东西两市也并非在城外,而是在洛城门和横城门以内的城内。”(彭卫:《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②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发展分为三大阶段:中国城市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时间为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典城市的发展阶段,时间是秦代到清代中期;中国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过渡阶段,时间为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书对先秦城市史设立章节专门论述。^①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著《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具有地理特色的城市史著作,其中对先秦城市的发展进行了宏观论述,认为:“区分中国初期城市和一般聚落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宫殿、宗庙、陵寝以及兵器、礼器,同时还要考虑聚落的规模、手工业作坊等。”提出中国城市的起源地有两个主要地带和次要地带,主要地带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次要地带指北方的草原游牧区和由东南沿海向西南地区延伸的弧形地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发展较快,出现了国家和城市,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起源地,而其他地区则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② 王瑞成的《中国城市史论稿》则更侧重于对中国城市史的理论总结和阐释,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七个解释性结构:城史、市史、城市关系史;四次城市革命说;城郭化、市镇化与城市化;中国城市史上的四个时代;中国历史城市的内外循环系统;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历史城市的排列与组合。其中自然涉及对先秦城市相关理论问题的论述。^③

关于先秦城市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许宏在其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从考古学角度将我国的先秦城市研究史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期 of 20 世纪 20 年代

①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王恩涌:《评〈中国城市发展史〉》,《人文地理》1996年第3期。

③ 王瑞成:《中国城市史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后期至 40 年代前期(1928—1943 年),是田野资料的初步积累阶段;第二期为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1950—1976 年),是田野工作大规模进行与初步研究阶段;第三期为 70 年代至今(1977—),是田野工作进一步展开,进入全面系统研究阶段。并将先秦城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肇始期,约当仰韶后期到龙山时代阶段,即距今 5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的铜石并用时代;确立期,约当夏商西周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至前 771 年);转型期,约当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至前 221 年)。^① 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一文将中国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祭、政与军镇三位一体的城邦,大约从西元前二千年到春秋中晚叶;二是统一帝国行政基础的县城,从战国开始孕育,秦汉成熟;三是坊制破坏、商业与行政并重的城市,唐宋之际至明清;最后是现代都市,城墙逐渐拆毁,没有城墙的城市不断形成,现在仍然处于这个阶段中。”并对先秦城市的特点进行了论析。^② 杨年撰文认为中国城市的起源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村落——城堡——城市。^③ 董琦把先秦城市发展史也分为三个时期:城堡时期,为我国先秦城市的萌芽时期,相当于氏族社会末期;都邑时期,为我国先秦城市的形成期,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城市时期,为我国先秦城市的成熟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④ 张全明提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1 本第 4 分,1980 年 12 月版。

③ 杨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城市的基本特征》,《齐鲁学刊》1994 年第 3 期。

④ 董琦:《中国先秦城市发展史概述》,《中原文物》1995 年第 1 期。

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这时‘市’还没有出现;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这时‘市’虽已产生,但城的防御功能等与市的买卖交换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融合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表明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①

对于先秦城市的特征,学者们在讨论中渐趋形成基本的共识。早在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就指出:“希腊古代的城市是基于经济的分业,故建立于土地私有的城市,必然发生城市的繁荣,而且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因了经济的基础决难有所迁移。在东方则不然……据文献上,我们看到经济意义上的城市性质者绝少,而宗庙社稷意义上的城市性质者,所在多有。”^②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古代城市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张光直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③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早期城市一出现就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与欧洲的不一样。因为中国早期城市是以宫室宗庙为主要内容的,城墙不是城

① 张全明:《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90—91页。

③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市的决定性标志,在中国早期城市遗址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①赵冈在《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一文中也认为:“中国的城郡自古以来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先秦城郡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②杜正胜提出:从公元前2000年至战国以前属中国的城邦时代,“而军、政、祭三位一体正是城邦时代城邑的本色”^③,即军事、政治、宗教功能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先秦城市的最根本的特质。“中国早期城市首先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工具出现的,而其经济地位尤其是代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城市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进步意义上的城乡分化方面。”^④当然,先秦城市的发展表现出了许多方面的特点,但其中最显著者当推政治因素在城市形成、发展及功能方面的突出地位。

以上仅就先秦城市史研究主要方面的内容做了一些简单总结,事实上,有关先秦城市研究的论著涉及了先秦城市史的方方面面。论文方面,如《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⑤、《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⑥二文分别从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方面对先秦城市发展做了讨论。在专著方面,如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

①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② 赵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4分,1980年12月。

④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0页。

⑤ 贺云翱:《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⑥ 傅兆君:《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①《中国城池史》^②、《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③、《中国城市建设史》^④等著作从建筑学、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城市发展做了专门论述。这些论著都涉及了先秦城市的发展,都对先秦城市有着一定的研究。

除以上论及而外,我国台湾地区还有不少论著对先秦城市史做了一定的研究,主要的有许倬云的《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年第48本第2分;又见许倬云的《求古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杜正胜的《周代城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和《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51本第4分)、萧国钧的《春秋至秦汉之都市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等。

5. 国外先秦城市史研究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史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其城市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著作六十年代按每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七十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中国城市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重视。”^⑤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术界举办了城市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出版了研究中

① 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庄林德、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⑤ 《近代重庆史》课题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内容及线索》,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5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国城市史的著作。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与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中国社会研究分会联合发起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城市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分三卷出版,第一卷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生活方式研究,第二卷主题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城市现代化研究,第三卷是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①在美国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论著中,也有学者对中国先秦城市做了专门研究,如1971年芝加哥出版了保利·惠特列著《四方之极》一书,此书“从一区域中的城市形成、发展,阐述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其宗教职能。”^②又如罗伯特·贝格勒的《四川商城》和《四川的商代蜀城》两文,对考古发现的三星堆城址做专题研究,认为三星堆古城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③

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极为重视,已出版许多论著,如岸俊男编的《中国的都城遗迹》和《中国江南的都城遗迹》、村田治郎的《中华的帝都》、服部克彦的《古代中国的城市和他的范围》等著作,对中国古代的都城和城市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④

① 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学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关于保利·惠特列的《四方之极》一书,国内还有不同的翻译,[美]史明正、范瑛译《西文中国城市史论著分类要目》将其译为: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中枢: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与特征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美]罗伯特·W.贝格勒著,雷雨、罗亚平译:《四川商城》,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美]罗伯特·贝格勒著,谢丹译:《四川的商代蜀城》,《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美]贝格莱:《四川境内的一座商代城址》,[德]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巴蜀书社2003年版。

④ 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日本对中国先秦城市的研究,首先应提到的学者是五井直弘。他曾编有《中国的古代都市》(日本汲古书院 1995 年版)一书。在《中国古代城郭史序说》(载《西嶋论集》)一文中,他对殷商至春秋战国的城址资料加以系统考察,针对“内城外郭”的观点,认为商以前仅有围绕宫殿的城墙,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围绕宫殿区的“子城”以及围绕百姓居住区、作坊区的“大城”,即所谓“外郭城”,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军事上的需要。^①他在另外的论著中又进一步提出,春秋战国时代东方各诸侯国的居城多由大城和小城两个城组成,但是秦国居城是一个城,认为这表现了国君的性格和对人民统治性质的不同。^②他还从都城形态和结构方面将春秋以来至唐代的都城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春秋战国时代具有小城和大城(郭)的都城时代;第二是从秦到北魏无郭的都城时代,如汉代的长安和洛阳;第三是从公元 501 年(北魏景明二年)创始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洛阳城所继承的有条坊制外郭(居民区)的都城时代。”^③江村治树的《战国时代的城市和城市统治》一文,从考古学的视点考察了战国时代城市的性质,主张战国时代存在着城市发达程度迥异的两个地域,“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三晋地域的大城市多且发达”,“在三晋地域的周边地区,国都另当别论,城市一般都属小型规模,既不密集,又不发达”。^④渡边

① 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8 期。

② [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见该书《比较都市论》一章。

③ [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见该书《都市与人类》一章。

④ [日]江村治树著,徐世虹译:《战国时代的城市和城市统治》,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卓的《墨家的守备与城邑》(载《古代中国的思想》)一文提出,春秋战国的城市布局与墨子、管子等人的思想有关,秦国都城的设计受到了墨家思想的影响。饭岛武次的《东亚细亚都城的系谱——从郑州故城到平安京》(载古代学协会《日本古代学论集》,1979)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栎阳城、楚皇城以及唐代长安城,是日本古代都城平安设计的原型。谷口满的《楚都丹阳探讨——古代楚国立国试论》(载《东洋史论集》)一文,主要考订了楚都丹阳的位置,认为楚都在西周的某个时候由秭归县的丹阳迁移到枝江县的丹阳。^①冈村秀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属城市文明吗》一文,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7座城郭分为大小两种类型,认为小型城郭聚落是农业共同体的地域性据点,大型的石家河聚落是“由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圈内众族群集体建设的萌芽城市”,“石家河城郭聚落尚未发展成为文明阶段的城市”。“若以外部(国家)势力建立的统治秩序和社会阶层分化程度为标准衡量,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石家河文化应属商周文明之前的阶段”。他还就日本学者中村慎一主张石家河遗址属于城市文明的观点加以批判。^②古货登的《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一文,认为在蜀最初建立古代国家的是杜宇,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③此外,日本学者还从建筑史的角度对包括中国先秦城市

① 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② 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7页。

③ [日]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1—181页。

发展在内的中国城市史做出了一定的研究。^①

二 先秦城市史研究中的问题

应该说,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先秦城址和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多,加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和中华文明起源重大研究课题的开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在这些多重学术发展因素的作用下,先秦城市史研究也呈现出不断繁荣的景象,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对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仍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清醒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并着力加以解决,无疑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问题

资料问题向来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先秦城市史研究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文献资料相对匮乏,从战国时期向前追溯,愈是年代久远,记载愈是粗略,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局限。且同时代留存的文献资料极少,多为战国时人所追述春秋以前史事的记载和汉时人所记有关夏、商、周事^②,因现存文献多为后人对前代历史的追记,尤其是对早期历史的记载多带有传说色彩,加之长期流传过程中文献传抄等方面造成的讹误,虽有后人特别是清代考据学家的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文献中的问题依然较多,从而造成研究先秦城市时文献利用的困难。在

① 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王玉哲:《漫谈学习中国上古史》,《历史教学》1984年第1期。

引用史料前,先要对其做考辨工作,分析其可信性及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合理利用文献史料。

先秦城市的研究还要更多地利用考古发现的遗址和出土文物等考古学资料。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先秦城址已有数百个,一般聚落数量就更多,这些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欠缺,丰富了文献记载的内涵,对于先秦城市研究工作的进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考古出土的文物包括古文字与考古实物资料,也能积极促进研究的进展。然而,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考古发掘的进度一般较慢,遗址发掘也很不彻底,如有些城址内部布局规划至今还不清楚,文化内涵不明确。在史前城址发掘中,“问题比较集中的就是,迄今在城乡分化迹象明显的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还没有一座城址的工作做到城内城外情况均较清楚的程度。”^①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发掘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先秦城市史的研究。此外,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文字资料史料价值很高,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艰苦的解读工作,才方可用于历史研究当中。

在研究先秦城市问题时,史料的运用最难莫过于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古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的整合或互证。文献资料的欠缺,造成史事记载的不够完整;而考古发现多带有偶然性因素,所出土古文字资料及其他文物资料也多不够系统完整。因而要实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整合或互证,就会存在一定的难度,而这些又是先秦城市研究的基础工作。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许多论著尚难以将文献与考古资料完美结合,大多论著只是要么侧重于文献资料,要么侧重于考古资料。对于后人对前代历史的记载特别

^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是对于中国的古史传说,更应结合考古发现,透过文献记载的表面,抓住文献所反映的深藏背后的历史真实的合理内核,辨伪存真,揭示远古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包括先秦城市史研究在内的古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2. 研究理论滞后

近年来,先秦城市研究成果显著,其进展主要体现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如对古都的复原研究、对个案城市的研究等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与此相比,相关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和滞后。这种状况对于先秦城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极为不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不断深化。“历史学本身的实践启示我们: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理论研究从来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古史研究期待着理论的更新。^①“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与方法,自然成为当前中国古史新体系建构中最迫切和最关键的问题。只要运用不断丰富各种材料,应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同时继承发扬我国古史研究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就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新的突破。”^②先秦城市的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相关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反过来看,如果相关理论研究获得进展和突破,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先秦城市的具体研究、实证研究乃至整个研究的飞跃发展。

① 王和:《古史研究期待理论突破》,载2001年9月6日《光明日报》;王和:《史学的发展依赖于理论更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王和:《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② 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为例》,《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从先秦城市发展的历史实际情况来说,在其学术研究中更应重视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是在中华特有的地理环境中独立进行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点。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从历史主义出发,弄清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规律,搞清中国城市产生的标准以及城市与国家起源和形成、文明起源和产生的特殊关系,明确中国早期城市的性质和特征,等等,不仅是先秦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早期城市研究的整体推动意义重大;而且构成了中国古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古史研究也至关重要。可以说,在先秦城市及先秦历史研究中,理论研究的地位尤为重要。唯有理论研究的新的进展和突破,才能促使整体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先秦城市研究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会意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所在,先秦城市的理论研究必然会有新的发展。

先秦城市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理论研究的成果又能促进具体的实证的中国早期城市研究。由此可以看到:在先秦城市研究中,二者不可偏废,在以前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和滞后的情况下我们强调重视先秦城市的理论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的忽视。只有二者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才是先秦城市研究的康庄大道。

3. 认知结构有待完善

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不难发现先秦城市史研究表现出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人员认知结构的不够合理和不够完善相关。有的学者擅长于文献,有的学者擅长于考古,有的学者则擅长于古文字,这从学术论著中内容的不够丰富、结构的不够完

善、论证的不够充分可以反映出来,而能够将文献资料、古文字资料及其他考古资料相互融通结合,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研究,却是较为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与主体的认知结构有关,研究者主体的不够合理与完善的认知结构制约了先秦城市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从某一角度出发,运用某一种资料、手段或方法,对先秦城市的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内容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完善、论证更为充分的先秦城市史论著更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

包括先秦城市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古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较高的学术素质,具有良好的认知结构:首先,必须对古史理论有一定的研究或了解;其次,要掌握历史文献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其他考古资料,并能将其相互结合融通;再次,熟悉或掌握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并了解其研究进展,力求将新的知识及理论方法应用于先秦城市史领域的研究;最后,还要熟知或掌握现代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并将这些手段和方法尽量用于城市史领域的研究当中。当然,对个体来讲,要建构和具备这样的认知结构并非易事,但这至少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研究人员科学合理的认知结构是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前提条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可喜的是,在老一代学者的带领下,一批认知结构更为合理的中青年复合型专业人才正在成长,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相信:随着研究者认知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先秦城市研究的发展将会有新的飞跃。

4. 跨学科研究较为薄弱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固然较为丰硕,然而系统的宏观的整

体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却较为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跨学科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对此,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先秦城市研究要求研究者主体具备较为合理完备的认知结构,而主体认知结构的建构和完善需要逐渐来完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为弥补这样的不足,提倡不同个体不同学科的学者联手合作,进行跨学科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了不断整合和分化的趋势,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促使了学科向纵深化发展,学科的这种发展以及信息化时代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对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也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其中,在各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一些重大的课题项目皆需要不同学科或研究方向的人员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跨学科整体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相比,先秦城市的跨学科整体研究更值得加以提倡。

先秦城市研究是中国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我们已经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重大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该项目现已取得一定的收获,发布了阶段性研究成果。^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课题,目前,关于这一方面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的力量正在整合形成。关于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城市与国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中国城市特性及其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等等,先秦城市研究中诸如此类重要课题的完成,都迫切需要不同领域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实施跨学科的整体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体综合研究。

三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趋向

从先秦城市史研究现有的丰硕成果中,我们可隐约看到先秦城市研究未来发展的趋向,一方面,原有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以及方式方法会继续发展下去,并将产出越来越多的更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会形成和凸显出一些新的研究发展的趋向。下面仅对此试做论述。

1. 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开展

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区域城市史是“以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有共同联系和特色的地区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既是区域史的一个专门分支,又是城市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及其发育演变的历史过程。^② 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区域城市史研究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除王朝都城外,方国都城和周边邦国或部族的都城和城市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如段渝的《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③,第一次

① 赵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述评》,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③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对巴蜀区域城市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城市结构和体系做了系统的探讨。又如高介华、刘玉堂的《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讨了先楚城市的起源、楚国始都丹阳、都城郢及别都、春秋战国地方城市等的发展状况,并从城市设计、建筑、艺术、文化等横的方面对楚地方城市进行了考察,是系统研究楚区域城市发展的专门著作。^①再如车广锦的《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对良渚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古城特点进行研究,认为良渚文化具有地方特点的古城应是以河道代替城墙,在早期良渚文化中,一城就是一国。^②可以说:这些成果代表了先秦城市研究的新的发展趋势——先秦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兴起,而且随着先秦城市研究的深入,这种趋势必然将会愈加明显。

先秦区域城市研究与先秦方国城市研究、周边邦国或部族城市研究关系密切,二者既有重合,又有所区分。方国城市研究、邦国或部族城市研究是对某一政权组织所辖范围内城市的研究,政权所辖范围有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可能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或横跨几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时间上,其区域范围随历史发展过程而可能发生变化,其城市发展随历史推移时间或长或短。而先秦区域城市研究是对先秦时期某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系统研究,不论其政权组织和政权更替或多或少,某一政权组织延续时间或长或短,总是以相对独立的地理范围作为考察研究的坐标。在先秦区域城市史研究中,既包括某一地理区域内类型或同或异的史前城址的研究,也包括方国、邦国、部族都城和城市的研究,还包括春秋战国郡县城市的研究

① 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

究,以及区域范围内城市发展演变和城市体系等的研究。

先秦区域城市研究是先秦城市史研究和中国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同时是区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之所以以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先秦城市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是考虑到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早期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的客观存在^①,这种客观影响也自然反映在早期城市的发生发展上。伴随着中国古史研究、先秦城市史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先秦区域城市研究将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当然,先秦区域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化,为下一步开展综合性的先秦城市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

2. 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

对于先秦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是先秦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之一,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方面的研究。如段渝在《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一文中,通过分析巴蜀古代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至西周春秋以后,随着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巴蜀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业已初步形成,并就古代巴蜀的城市体系进行专门探讨。^②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应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史研究和先秦城市史研究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对先秦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会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其发展趋势会渐趋明显。

先秦城市体系的研究不仅包括了对先秦城市体系形成和发展

^① 毛曦:《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唐都学刊》2001年第3期;毛曦:《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条件分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的宏观的综合性整体研究,也包括了对先秦区域城市体系的研究、先秦不同类型城市体系的研究和不同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城市体系包括了城市间的各种类型的关系所形成的系统,如城市间在建设、管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等级体系。从先秦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春秋战国郡县城市的逐渐兴起以及不同类型城市的并存,使先秦城市由原有的管理体系迈入新的城市管理体系——城市网络体系,这种城市体系对其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想到: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于先秦城市体系的专门研究将会逐渐得到强化。

3. 城市内涵的多层面研究

综观先秦城市史研究的已有成果,从城市内涵的构成来看,对于先秦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布局、城市建设和建筑等的复原研究以及对城市规划制度、城市性质等的分析研究,而对城市内涵的其他方面则涉及稍少。城市史研究要求对城市内涵各个方面和层面的历史过程加以揭示,先秦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必然会要求对先秦城市进行多方面多层面的研究,应该说,对先秦城市内涵的多层面揭示将会成为先秦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目前,已有一些论著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先秦城市发展做了探讨。如傅兆君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①、杨生民的《论春秋战国的市》^②等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也有一些论著中对先秦城市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

① 傅兆君:《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杨生民:《论春秋战国的市》,《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各种构成进行分析和推测。应该说这些都反映出对城市内涵的多层面研究这一先秦城市研究的发展趋势。对先秦城市内涵的多层面研究包括了对城市建筑和建设、城市布局结构、城市人口及其构成、城市交通、城市地理、城市商业和经济、城市生产、城市生活、城市社会、城市教育、城市文化、城市管理、城市功能性质、城市规划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揭示。当然,在先秦城市发展中,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城市内涵的各种层面是逐步展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加之年代愈远,资料愈为欠缺,从而造成了在追溯城市各种内涵的历史过程中的困难,而考古工作的进展将会为其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条件。城市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各种内涵业已形成并显现出来,且对其后中国城市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我们有条件对其内涵做多层面的考察研究。

4. 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一种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学术研究中经常用到的方法之一。学者们认识到城市史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外城市史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化城市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①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比较研究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特别是中外古代城市的比较研究,其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② 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使用这一方法,如漆蒙的《东西方城市起源比较研究》^③、曲英杰的

① 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② 杜瑜:《中外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的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③ 漆蒙:《东西方城市起源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3期。

《周代都城比较研究》^①等论著就是对先秦城市的专门比较研究。从已有论著的整体来看,比较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然而却代表了先秦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先秦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加强城市比较研究这个环节,先秦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是先秦城市研究发展的又一趋势。

先秦城市的比较研究包括了先秦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构成了先秦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而外,更应该开展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惟有如此,才可能发现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有规律。先秦城市的比较研究,既有微观的比较研究,也有宏观的比较研究,而宏观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先秦城市研究中显得更为急需。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相联系,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也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比较研究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中外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比较研究的开展就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说,伴随着先秦城市研究的不断进展,先秦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更加热烈地开展起来。

^① 曲英杰:《周代都城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二章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 现状与相关说明

对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囿于文献记载的粗疏和史料的匮乏,长期以来,研究进展极为缓慢,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巴蜀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古城遗址的发现以及相关文物的出土,从而为先秦巴蜀城市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由此,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选题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拟在总结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城市史的角度对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做一较为系统的探索。

一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现状

先秦巴蜀城市研究是先秦城市史乃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巴国史、蜀国史或巴蜀区域史研究以及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便与方方面面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便有了多种角度的切入和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秦巴蜀城市研究有了一定的新的进展,既有对先秦巴蜀城市的专门研究,也有为数很多的论著涉及了先秦巴蜀城市这一问题;既有对先秦巴蜀城市的总体研究或论述,也有对先秦古蜀国城市和巴人早期城市的专门讨论。

1. 总体研究

关于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源头可追溯到“巴蜀文化”的兴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致华发表了《古巴蜀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该文对巴、蜀的立国、疆域、社会发展等进行了考证,认为殷商时期蜀已有了城郭都邑,巴人已有货币、城市、职官和君臣等观念。到了40年代,卫聚贤收集文物资料,撰成论文《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和1942年第3卷第7期),此后,“巴蜀文化”一词开始为学术界广泛采用。^①50年代以来,巴蜀历史文化研究不断有优秀成果问世,其中对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多有论及,代表性的论著有: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②、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③和《成都二江考——附论大城、少城、七桥、十八门》^④、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⑤、邓少琴的《巴蜀史稿》^⑥、任乃强的《四川上古史新探》^⑦等。

① 林向:《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载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5页。

② 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二文后收入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收入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③ 文章发表于1959年,收入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3页。

④ 文章发表于1980年,收入蒙文通:《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10—139页。

⑤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童恩正:《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⑥ 邓少琴:《巴蜀史稿》,见邓少琴:《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27—290页。

⑦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0年代以来,随着三星堆遗址、成都平原8座史前城址、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的发现以及巴文化考古工作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先秦巴蜀城市的研究,形成了不少专门研究的成果,使巴蜀城市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先秦巴蜀城市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对先秦城市的发展做了总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应提到的学者是段渝,多年来,他对古代巴蜀城市发展做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1993年,他发表了《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和《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两文,第一次对古代巴蜀城市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对早期城市的范畴进行界定,对巴蜀早期城市进行确认,对古代巴蜀城市的起源、结构、体系、演进进行独到探索,认为三星堆古城表现出强烈的神权政治中心性质,成都从一开始就朝着工商业城市的方向发展,而巴国城市的演变则与其军事重镇的发展有关,西周春秋以后,随着一批地方城市的兴起,构成了巴蜀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①同年,其所著《四川通史》第一册出版,其中在《古代蜀国的社会经济》和《古代巴国的社会经济》两章中,列专节对先秦巴蜀城市发展做了专门研究。^②此后,在其相继出版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等著作中,列出专门章节对先秦巴蜀城市继续进行研究探索。^③此外,孙华的《四川盆地的

①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段渝:《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② 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段渝、谭洛非:《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青铜时代》^①、蒙默等的《四川古代史稿》^②和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③等著作对古代巴蜀的城市也有一些论及。

2. 蜀国与蜀地城市研究

对于古蜀国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的论著进行了整体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以三星堆文明为轴心,对于先秦蜀地的城市发展做了专门讨论,该书以《古蜀国的城市与文明》、《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成都社会生活与城垣建设》为题,安排两章篇幅探索蜀地早期城市的发展。^④ 段渝在新近出版的《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一书的《文明的动力——古蜀的商业、城市和交通》一章中,也对古蜀国城市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做了专门研究。^⑤ 江章华、王毅、张擎的《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一文,对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和三星堆城址以及相关遗址考古进行总结,分析这些早期城址的性质和文化情况,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和东部的先秦文化序列和发展脉络,在距今 5000—3700 年间分属两支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和哨棚文化可能是蜀文化和巴文化的直接渊源,到三星堆文化时期,两地文化基本趋同,其后到战国时期,川西是“蜀”人遗存,川东可能是“巴”人遗存,蜀和巴的考古学遗存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⑥

①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④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⑥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宿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9—721 页。

有的论著专门对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进行了研究讨论。《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①、《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与史前文化》^②等一批论文从考古学角度对这些早期城址做了详细论述。王妙发在《论长江流域早期都市》一文中,强调“都市与否的判断主要应该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判断的方法应该是地理学的方法”,该文根据自己从地理学意义上提出的“都市”定义和都市形成的标准,对成都平原史前的宝墩、鱼凫村、郫县古城、芒城、双河、紫竹6座古城遗址是否属于都市进行了性质上的分析判断。^③段渝、陈剑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一文,通过对史前古城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共存形成的古城群,则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考古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城墙的确认和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论著在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同时,也论及了三星堆城市的发展问题,也有一些论著对三星堆城市的性质与发展等进行了专题研究。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著《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一书的《古蜀城市文明觅踪》一章提出:“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

① 宋治民:《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

② 江章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与史前文化》,《寻根》1997年第4期。

③ 王妙发:《论长江流域早期都市》,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

④ 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

政治文化的中心,从各个方面都反映出王都的气象。成都也以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成为与三星堆文明中心相呼应的次级中心。”^①黄剑华的《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一文,主张早在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已在三星堆建立了古蜀王都,而在此之前或更早时候就出现了宝墩文化等早期古城。^②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格勒的《四川商城》和《四川的商代蜀城》两文,将三星堆遗址纳入商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三星堆曾是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中心,与商文明关系密切;三星堆城址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学术界形成的安阳中心论的框框,使人们不得不调整有关商代中国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古货登在《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一文中,认为在蜀最初建立古代国家的是杜宇,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瞿上是在流经三星堆的鸭子河、马牧河从湍江分流之处的彭州市九陇镇的关口一带。^④

在对先秦蜀地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对于早期成都的研究特别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早期的论著多从沿革地理的角度或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对成都的历史变迁做了详细考述或论证,其中对先秦时期成都城市情况多有论述,如蒙思明的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黄剑华:《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③ [美]罗伯特·W.贝格勒著,雷雨、罗亚平译:《四川商城》,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美]罗伯特·贝格勒著,谢丹译:《四川的商代蜀城》,《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

④ [日]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1—181页。

《成都城池沿革》^①、刘琳的《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②、李金彝和王家祐的《成都考》^③、任乃强的《成都城址变迁考》^④、王文才的《成都城坊考》、四川省文史馆编的《成都城坊古迹考》^⑤等大量论著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此外,徐中舒的《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⑥、李金彝的《先秦时代的成都》^⑦、沈仲常和黄家祥的《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⑧、谭继和的《成都城市历史概述》^⑨、张学君和张莉红著《成都城市史》^⑩等一批论著,则将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就成都城市史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内容自然涉及先秦时期的成都。近年来,伴随着成都平原考古工作的进展,学者们对成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何一民的《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一文和专著《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将文献资料与最新考古资料相结合,分析了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早在4500—3500年前,成都平原已具备产生城市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从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到成都十

① 蒙思明:《成都城池沿革》,《禹贡》1936年第5卷第12期。

② 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③ 李金彝、王家祐:《成都考》,《地名知识》1980年第4期。

④ 任乃强:《成都城址变迁考》,《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⑤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 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又载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⑦ 李金彝:《先秦时代的成都》,《成都文物》1990年第3期。

⑧ 沈仲常、黄家祥:《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载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⑨ 谭继和:《成都城市历史概述》,《成都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 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城市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二桥宫殿建筑群遗址,是成都早期城市产生和初步形成时期,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成都是具有4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① 罗开玉的《早期成都城初论——兼论早期南方城市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现有考古发现认为:成都在商周至战国早期已是一大型城邑,其中心地在今西门十二桥至中医学院一带,沿古郫江东、北岸形成半月形布局,战国中期,蜀国“少城”尚无城墙,秦灭巴蜀后始筑土城。^② 李令福的《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一文,则通过对文献源流的辨析和对各家结论的评述,认为成都“与咸阳同制”不是指城市平面布局,而是指政治经济上推行的秦国制度。^③ 段渝、邹一清的《成都城市聚合形成模式的中外比较》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成都城市聚合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主权在聚合形成过程中起凝聚和推动作用,工商业是城市聚合的重要因素。这两大特性决定了成都城市为自由都市、工商业都市的性质,并影响了成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④ 此外,白剑的《成都与金沙——兼论成都城及名号起源》一文,对成都的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⑤

① 何一民:《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罗开玉:《早期成都城初论——兼论早期南方城市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③ 李令福:《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段渝、邹一清:《成都城市聚合形成模式的中外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⑤ 白剑:《成都与金沙——兼论成都城及名号起源》,《文史杂志》2004年第5期。

3. 巴国与巴地城市研究

关于先秦巴国城市和秦灭巴后巴郡城市的研究,由于文献资料和考古工作进展的局限,与先秦蜀国和蜀郡城市的研究相比,进展要较为缓慢一些,然而也产出了不少的学术成果。

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虽以研究近代以来重庆的发展为重心,但将重庆城市的历史也回溯到了先秦时代,该书第一章《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对早期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论述。^①周勇主编《重庆通史》也设专门章节对先秦巴地城市进行论述。^②此外,邓少琴著《重庆简史》和《重庆简史和沿革》、彭伯通著《古代重庆》^③、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著《重庆建置沿革》^④、重庆博物馆古代史部撰《重庆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古代重庆》^⑤等论著也对先秦巴地城市发展做了一定论述。

有不少论著对先秦巴地城市做了专门论述。董其祥在《古代的重庆》一文中,依据已有的资料,对从地质时代重庆地形的形成,中经原始社会、殷周时代,下及秦统一巴蜀这一段时期的重庆历史进行了系统考述。^⑥燕庄和在《重庆城的创建及其演变》一文中,认为战国以前,巴蜀地区的先民多散居,少聚族而居,无城;战国时期巴族地区的城堡纯属军事防御性质,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商业城市是在秦灭巴后逐渐产生的;战国末年,秦灭巴蜀后,首筑

①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彭伯通:《古代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⑤ 重庆博物馆古代史部:《重庆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古代重庆》,载重庆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巴渝文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⑥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126页。

三城,即成都、郫县、重庆(江州)。^①唐昌朴在《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一文中,提出汉代将巴国故地划分为巴东、巴西、巴郡三个部分,这是对该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客观反映;商周之时,巴国各部落联盟已初建“方国”,《华阳国志》所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是指统一的三巴大部落联盟的都邑,这时已是春秋时期,然而分据的三巴部落联盟都各有其聚邑。^②

近年来,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巴人早期城市的历史遗存,以揭示该地早期城市形成与发展之谜。杨华发表《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遗迹的考古与研究》、《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上、下)、《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上、下)等系列论文,认为:长江三峡地区虽然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史前城址,但现有考古资料已可透露出与城址相关的信息,如刻划符号、大型聚落、宗教祭祀、战争与贫富分化等出现,为寻找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提供了线索;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居住遗址数量已大大增多,普遍流行一种“干栏式”建筑,出现“地面台式”建筑,大量应用板瓦、筒瓦覆盖屋顶;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确认远古时期三峡地区已有了城市的雏形,上古时期,三峡地区的城市多用“栅栏”来作为防御设施,从而代替

① 燕庄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39页。

② 唐昌朴:《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载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巴渝文化》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34页。

了“城垣”，建筑形式比较独特。^①

此外，随着重庆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和四川宣汉罗家坝等巴文化遗址^②的新发掘，巴文化的面貌渐渐清晰起来，虽然巴国城址至今尚未找到，但考古专家认为，罗家坝遗址“应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地位”，发掘工作应“注意寻找同墓葬对等的大型建筑，探索有无城、壕等防御设施和祭祀遗迹”。^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巴国城址的历史资料会逐渐丰富起来，关于巴国城市的研究会不断得到深化。

二 选题说明

基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先秦城市史研究现状以及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的进展，笔者提出选题“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拟对先秦巴蜀城市的历史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讨论，仅就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① 杨华：《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杨华：《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遗迹的考古与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上、下），《四川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4期；杨华：《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上、下），《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1、3期。

②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管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淑卿、王芬：《重庆余家坝巴人墓地的发掘收获》，《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③ 《罗家坝遗址笔谈》，《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1. 提出与意义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如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①、成存洁的《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②等就是断代城市史研究的代表著作,任重、陈仪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③、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④等对于城市史中的城市管理、城市文化进行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整体情况以及其他断代城市史的研究进展相比较,先秦城市史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这固然是因为文献资料的相对缺乏造成的,然而相关考古工作的新的进展,为进一步推进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区域城市史的研究又是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古代巴蜀地区早期城市的发展,限于文献记载的粗疏,长期以来研究进展较为缓慢,可喜的是近年来四川盆地先秦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为进一步搞清巴蜀地区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可能。本选题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选题属断代区域城市史研究,以先秦巴蜀地区城市的起源与早期发生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综合运用现有各种资料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揭示先秦时期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规律。

本选题属基础理论研究,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选题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题关于先秦时期巴蜀区域城市

①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成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尤其是先秦城市史研究以及区域城市史研究领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化这些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作用;二是选题涉及对于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而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又和国家、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而选题的研究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尤其是长江上游文明形成的研究可提供一定的参考;三是本选题研究亦属古代区域文化之一巴蜀文化的研究范围,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构成了古代巴蜀文化的重要部分,因而,选题的研究对于丰富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2. 范围限定

选题研究以先秦时期为时间范围,上限至史前时代城市的萌芽、起源,下限到前 221 年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既包括了巴国、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包括了秦统一巴蜀后巴蜀地区郡县城市的发展。

选题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古代巴人和蜀人生活的地域,从地理单元上讲,主要是指四川盆地。当然,古代蜀国和巴国的疆域有一个历史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不同时期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两国之间也有相互消长的现象,然而他们共同活动于四川盆地,并主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地域。可以说,四川盆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空间范围与古代蜀国和巴国的疆域大致吻合。正因为古代巴国和蜀国在地理单元上的共性,二者共处于四川盆地之中,加之两个古国文化上久已有之的密切关系,因而才有“巴蜀”合称的形成。

3. 研究思路

本选题的完成,首先有赖理论上的准备。由于城市形成的标

准、城市的起源、城市与文明形成的关系、早期城市的性质,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在先秦城市史研究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涉及,在一些较为宏观或系统的研究中甚至是无法回避的,这些理论也构成研究的理论指导。研究先秦巴蜀地区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自然要涉及诸多理论问题,作为选题研究,首先要对这些理论问题作出回答,这也是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当然,这些理论认识尚需与先秦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才会具有生命力。

选题的完成力求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已有文献资料和现有考古资料加以整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在中国城市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先秦巴蜀城市发展做较为专门系统的初步探讨。

选题拟对先秦城市史研究和先秦巴蜀城市研究进行总结,就城市史学科问题和早期城市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如城市的定义、城市形成的标准、城市起源及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规律及其与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等)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就先秦巴蜀城市史进行系统探究,具体包括:就先秦巴蜀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作出分析说明;就史前城邑的出现到秦灭蜀国前蜀地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及相关问题做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就秦灭巴国前巴地城市的早期发展和相关社会历史问题作出分析说明;就秦统一巴蜀后到秦统一全国前巴蜀郡县城市情况作出总结说明;就先秦巴蜀城市发展的特征以及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加以论析。

第三章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发展较快,进而有学者提出城市史的研究是中国 21 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① 我国城市史研究在新的时期的发展,既有国外学术发展和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也有中国史学传统的奠基。城市史学在我国的提出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已开始对城市史的学科问题予以关注,这里仅就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和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发展陈述陋见,并就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推进提出粗浅看法。

一 城市史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背景

城市史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新的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既是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也是学科发展分化的结果;既是国外学术发展的影响的产物,也是国内学术自身发展的反映;既是史学现代发展的产物,也是诸多学科共同推进的结果。

^①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 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 年第 12 期。

1. 社会发展的推动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入了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与繁荣,由此城市化的速度在逐步加快,城市化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因素之一。当今社会,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们深感保存城市历史的必要。“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抓紧时机对城市史进行研究,将来的城市也许会失去自己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城市将不复存在。”^①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存留底蕴、具有特色和保持活力的必然之举。

现代城市的发展还在环境保护、文物古城保护、城市建设、文化继承等方面暴露出了不少城市问题,并且随着城市的继续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些不断涌现的城市问题,为了避免新的城市问题的出现,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寻求借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借鉴功能,城市史的研究可为现代城市解决城市问题、避免出现新的城市问题提供各种各样的借鉴。城市发展的需要,促成了城市史研究的新的的发展。

探寻城市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未来的发展,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城市史的研究可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给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并预测城市的未来,就

^①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需要研究城市史。城市史通过研究城市的起源、历史发展和必然趋势,揭示城市的本质和规律。”^①可以说,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种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广而言之,现实的社会发展的需求的推动,促成了学科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研究的兴起与繁荣。

我国城市史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的发展,也是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城市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城市化速度迅猛加快,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这种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促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正如学者所指出:“当今我国城市史研究的勃兴,其深厚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城市建设、城市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性城市化趋向。”^②现代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通过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③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认识和解决,推动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繁荣。

2. “城市史学”的形成

“城市史学”^④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大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城市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标志着

① 陈绍棣:《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② 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③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④ 皮明庥在《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一文开篇提到城市史学简称城市史,如果从城市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史学与城市史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城市史研究在前且有非历史学科的城市史研究,城市史学提出在后,属历史学之分支。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我国城市史研究发展的一种学术背景,是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城市史研究兴起和发展的一种回应。

关于城市史学形成的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说认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一说主张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而公认的意见则认为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①“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以埃里克·E. 兰帕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新城市史学与旧的方志式的城市史相区别的标志。”兰帕德提出“应该把城市社会诸多关联的方面作为一个生态复合体来研究”。^②然而,城市史的研究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可以认为,城市史学是在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在诸多学科和理论方法的带动下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后城市的广泛重建,城市史研究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城市史国际委员会就常设在法国巴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罗马召开了第十次国际历史学会议,提出了促进城市史研究的问题;到了60年代,德、法等国进入了城市史理论的更新和确立时期;1975年是“欧洲城市建筑保护年”,在这一年,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欧洲城市史研讨会;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城市史研究日益组织化、系统化,并且积极扩大了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国家之间

① 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姜芑:《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的学术交流。^①在美国,早在城市史学产生以前,城市史研究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33年,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所著《城市的兴起》一书出版,它在美国开启了史学家研究城市史的先河。1959年,理查德·韦德出版了《城市的边疆》一书,将美国的城市史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了快速发展,研究领域也从本国扩大到了包括中国城市史在内的世界范围。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拿大的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研究一道形成了热潮。^③在亚洲,城市史研究较早得到新的发展始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城市史研究跨入快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开拓自己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也引用了西方城市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成果。也就是说,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城市史研究正逐步开始同外国的城市史研究接轨。”^④

我国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发展是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史研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积极回应。中国的城市史学的提出^⑤,作为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进

①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② 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李巍:《加拿大城市史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④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⑤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皮明庥:《城市史研究概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瑞成:《中国城市史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隗瀛涛指出：“中国国内研究近代城市，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具体讲来起步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七五’规划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四个近代城市的近代化研究列为国家课题。”“以‘七五’规划的近代城市研究为契机，近代城市史研究勃然而兴。”^①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以来，目前已出版20余辑。近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将城市史研究视作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城市史学，“城市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城市史研究和城市史学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认为：“城市史学，这个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它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实体，是对以城市文明发展为主轴的专史的研究。在纵向上，主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脉络的阶段性，横向上注意研究城市环境、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城市阶级和阶层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学，其发展颇有西方城市史学影响的痕迹。”^②但不管怎样，城市史学在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中的提出，是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理论方法开始更新的一个信号，可视为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3. 城市史研究的传统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其渊源远可追溯到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形成了诸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

①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武林旧事》、《历代帝王宅京记》等一批与城市史相关的著述。而我国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却是源于近代,傅崇兰提出:“直到近代,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中国都市》的短文,内容属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史。”^①近代以来,在沿革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从城市地理角度对中国的城市史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②,而且城市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被提出并加以探讨,主张城市历史地理学“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对象为“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③。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历史地理学以其独有视角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年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明确提出,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和出版文集,加强了对以都城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促成了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发展繁荣。以历史地理学学者为主体,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较多地保留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传统,在面对西方城市史研究发展和城市史学形成的形势下,原有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史学传统正在不断进行着革新,并开始向现代的新的城市史研究方式进行转变,而这一史学传统的革新与转变可以说发端于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

① 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

②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7页。

市发展史》^①一书的出版。该书“参考了外国城市发展史,纳入了区域与城市关系、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演变、城乡关系历史变革,重视了交通、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等”^②,是中国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的新的变革和转变。有学者撰文认为该书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产生了“先行著作”的影响作用。^③这种评判自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基于对以历史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的理性认识,朱政惠提出了“历史城市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历史城市学是新时期得以发展的又一新的独立学科,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却比历史地理学有更独特的研究内容,历史城市文化、城市风俗、城乡关系、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等,均属其研究范围。

历史城市学,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方面,几与城市史学无异,然而历史城市学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城市史学,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并不断吸取新鲜研究成果而自我更新完善。我们所以把通常人们所说的“城市史学”称为“历史城市学”,主要在于强调它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同时也为了提醒研究者:中国历史城市学要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传统的研究成果、方法和来自异域的研究成果、方法的结合。^④

①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③ 杨正太:《一部中国运河城市史专著》,《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④ 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可以说,“历史城市学”新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史研究的现代变革进行理性的学术反思的结果。

4. 多学科发展的推动

城市史研究的快速发展还得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多种学科的推动。社会学尤其是其分支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史研究的进步,社会学以城市社会作为其研究领域之一,其中包括对城市社会历史变迁的分析考察,自然也就涉足到城市史的研究。美国城市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他们在对城市社会进行研究时较早注意到了城市史的问题;到了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开始介入城市史的研究;60年代以来,在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美国形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①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促进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开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学的研究包括了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包括了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经济史的著作中,往往有专门章节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经济的专门探讨。从经济学学科的横向构成上看,城市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包含了对于城市经济的历史变化的研究。可以说,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成长,对于包括城市经济史在内的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

^① 可参考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作用。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空间规律的一门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其重要的分支学科。“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空间组织,也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律性。”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要涉及城市地理的历史变迁等情况,因而对于城市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地理学中的一些新的理论,如“中心地理论”、聚落理论、区域理论等的提出,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无疑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进行中国城市史研究所结出的硕果。^①

建筑学对于建筑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历史时期的建筑,不可避免地要对城市发展史的内容有所讨论。此外,作为建筑学组成部分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其学科的学术研究自然要对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这些讨论既是建筑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城市史研究的构成部分,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已有的城市史论著中,有许多是关于城市建设史和城市规划史的内容。建筑学的进展对于城市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着眼于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城市问题的需要,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建立我国的都市学,提出都市学“是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都市学要研究的不光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

^① 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国家的城市体系”。^① 学者们还就城市学的学科构成进行了讨论,认为“城市的起源、兴衰与历史演变(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城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可以说,城市学是在我国城市研究不断推进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城市研究本身的一种理性反思,它的提出对于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许多学者进一步认为:城市史既是城市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之一。^③

二 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方法

城市史研究与城市史学有所不同,城市史的研究有多种学科的参与,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得到了多种学科的推动;城市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其对城市史的研究自有其独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

1. 城市史与城市史学的学科属性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城市史与诸多学科的密切关系。城市史“虽以探索城市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规律为主要宗旨,却须涉及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乃至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等众多的学科”。^④ 事实上,城市史及其城市史的某些领域构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

① 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1985年第4期。

② 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5页。

③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自序。

④ 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学、建筑学、城市学、都市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组成部分。“城市史既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城市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①“国外的城市史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城市史和城市史的某些领域可以隶属于多种学科,这是由城市史的特性所决定的。哈里·詹森在《关于城市史学定义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城市史的定义是与方法论的内涵连在一起的,由于“城市”可以从不同的意义进行研究,所以城市史就可以根据研究的内容不同属于不同的分支学科。^③城市史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以时间变迁为线索的纵向研究领域,自然应是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又是由诸多横向方面如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组成,这些横的方面构成了历史学之外的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这些横的方面自身也有其历史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城市史或者城市史的某些领域就构成了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城市史的学科性质是多元的,城市史属于多种学科,城市史研究必然有多种学科的参与。

“城市史学是自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这早已成为学术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④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门分支学科,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有所不同,城市史学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采用历史

① 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②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③ 转引自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④ 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学的研究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学开始在我国史学界提出并逐渐被广泛使用。如有学者撰文指出:“城市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的历史学科的分支。”^①城市史学在我国的提出和发展,体现出我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也反映出中国史学学科的新的进展。城市史学以城市史的专门研究为使命,对于城市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和关注,城市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共同携手推进着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2. 城市史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的城市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其发展还很不成熟,尤其是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规范。但城市史学作为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值得加以分析概括。

“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的实体,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②由于城市是由多方面、多子系统组成的综合的系统的社会空间,因而城市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城市整体系统或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史或城市史的某些领域便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史学在研究城市历史的过程中便与多种学科发生关系,城市史学在史学分支学科中便呈现出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皮明庥认为:城市史学“既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又与城市学、社会学具有同构关系。它既具

①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自序。

② 陇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有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又兼摄自然科学(如地理、园林、建筑工程等)成分,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①城市史学因城市历史本身的特点而在诸多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

关于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已做了许多思考,值得加以总结。傅崇兰、朱玲玲撰文提出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

(一)城市内部的结构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主要是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文化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职能分区的发展变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变化。

(二)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所谓城市关系圈,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关系。^②

隗瀛涛在《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也提出了城市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③

皮明麻在《城市史研究略论》一文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①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③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指出了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城市史，从纵向上，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点。从横向看，要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人们的心理、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功能、疾病……而这些方方面面又相互联系、消长变化，每一个方面又可以成为一个母系统，延伸出许多子系统。^①

城市史学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自然包括了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了城市圈的历史变化，更包括了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过程和城市整体的历史变化过程。城市史学作为史学分支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其他学科多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变化作为其研究对象，并且以当代研究为重点，根据需要上溯城市的历史发展；而城市史学除了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外，更重视对整体的系统的城市历史的综合宏观的研究，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一种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将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关于城市史的研究相比较，也可看到城市史学的一些特征。一是对于城市历史面貌的揭示与复原。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城市史学作为其分支，自然在揭示与复原城市历史面貌方面，尤其是对

^① 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历史时期城市的微观复原研究方面^①,有着其他研究城市史的学科所不具备的优点。二是对于城市历史的综合性研究。西奥多·赫施伯格在《新城市史:走向跨学科的城市的历史》一文中认为:作为城市史学家需要更多方面的知识的训练,应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结合。^② 其他学科在研究城市史时多以城市历史的某一方面为对象,而城市史学除此以外可对城市整体的历史做综合性的宏观研究,这一点是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三是对于城市体系与系统的专门研究。研究历史时期某一或大或小区城内城市群的体系以及城市的内外系统等内容,是多以城市史某一领域为对象的其他学科难以完成的,而这一重任必然地落在了城市史学的肩上。四是对于城市历史的历史主义研究。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城市历史要将城市发展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考察,要对城市历史进行与所处历史环境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学科特色,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历史变迁的研究具有这样的特点,而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

城市史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上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城市史的多学科属性,决定了以城市史为对象的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的多元性特征。首先,史学方法是城市史学的基本方法,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证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等历史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史学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城市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其次,除了史学方法

① 曲英杰:《谈对古代城市的复原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转引自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外,城市史学还要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己所有所用。如城市史学对于社会学的人文生态学理论的吸收和利用,促进了本学科的极大发展。^①又如城市史学对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理论、聚落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环境史理论等理论方法的吸纳,对于城市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的继承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史学的形成和不断发展。^②城市史学的理论方法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城市史学要不断发展,就需要不断采纳甚至发展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方法。正如学者所指出:城市史学除了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理论方法外,还应吸取社会学、城市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计量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知识和手段,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③此外,现代的最新技术手段和方法,也会在城市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深化

城市史研究不仅要研究近现代城市的发展演变,也应该重视对古代城市历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显现出一些薄弱环节。“在研究时限上,普遍着眼于现状和展望未来,探索城市化发展方向,而对以往的历史经

① 姜芑:《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姜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验总结不够;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般认为西方对现代化城市各方面研究的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偏重于介绍翻译西方有关城市研究的论著和经验,忽略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①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研究人员比较分散,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城市的全国性组织机构或协会,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考古发掘与历史地理方面的探讨。中国古史研究的重点是在农村,城市问题研究重视不够,即使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没有把城市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进行研究。”^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但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是综合系统的研究,依然是我国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以为以下一些方面更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1. 综合性的宏观系统研究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对于单体城市的研究、城市某一方面的研究以及某一区域和某一时段的城市历史都有一定的研究,但综合性的系统的宏观分析研究相对较弱。^③而对于城市发展历史来讲,综合系统的宏观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许多非史学的分支学科对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城市经济史等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历史都有不少的研究,但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却是其他分支学科难以胜任的,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城市史学的肩上。作为史学分

① 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③ 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支学科的城市史学,不仅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微观的、局部的、单体的研究,更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分析研究。城市史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其显著的学科优势,将城市发展的历史置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考察,对于城市整体、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是历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学科优势的具体体现。

2.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城市和城市史的综合特性,决定了在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多种学科的广泛参与,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和新兴的城市史学对于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外,也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于较大的研究课题,还需多种学科学者共同合作,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从目前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来看,多是某一学科的单科研究;在历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十分有限。为了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历史学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城市史研究中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动组织各相关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多学科广泛合作,完成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城市史学的发展,要求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促进城市史研究的深化。为此,要求研究主体要不断扩充自我知识积累,了解掌握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完善主体的认知结构,强化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跨学科研究。

3. 考古学资料的充分利用

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考古资料应用于历史研究,有一定的方法值得探寻。如段渝提出:“考古资

料的应用,即在考古发掘、调查、实验、报告以及理论、方法论体系之外的如何应用其已有成果或资料的问题。这是建立在考古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略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类似,但范围还更宽广一些,史学、文化学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气息还要浓厚一些。也许可以说,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将考古资料纳入人类文化演化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给以理论阐释。”^①在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有限,城市历史依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上古城市的研究更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困难和局限。而考古发现与研究特别是古代城市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弥补古代城市史研究中资料不足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到考古学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过去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十分重视,而对考古资料和方法的运用却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对于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②一书的出版可视为其代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古代城市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积极开展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并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各种资料,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将其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4. 城市发展规律的探寻

哈里·詹森认为城市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其内涵是不同的。^③

① 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为例》,《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转引自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事实上,城市的内涵不仅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也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近代中国的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延续。只有通过对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特性和规律的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特点和规律等问题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如学者提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条是行政力量强制下全国一个模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两条线相互矛盾着,斗争着,发展着,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历史线索。”^①又如学者们对中国上古城市政治性特色的探讨,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客观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问题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特别是上古城市发展特点的形成以及发展规律的形成的影响作用;二是在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特色和特有发展规律时,要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政治特色等)对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探索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是我国城市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5. 城市史学的理论建构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构也是这样。城市史学理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① 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是其学科理论;二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理论。城市史学是研究城市史的历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尚处于建设当中。中国城市史学兴起较晚,其学科理论建设除了向国外学习引进外,还应该构建本国的城市史学理论体系。国内学术界已就城市史学的有关理论开始进行探讨,如学者们对区域城市史的理论方法做出探索,这些探索对于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的推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①但这仅仅是中国城市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中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还要重视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古代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践中提升形成理论,并形成城市史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应该说,我国城市史学的理论建设既可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及其研究中汲取营养,又可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②一书因其理论的提出,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建设,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必将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① 赵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述评》,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

第四章 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理论探讨

一般来说,城市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国家和地区其内涵是有所差异的。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在其特有的地理环境中,和远古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且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形成以及早期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无疑对于中国古史研究和城市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

城市既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作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城市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其起源于史前时代,形成于夏代,早期发展至战国时代出现飞跃,跨入新的发展时期。下面对此试做论述。

1. 城市的界定和标准

美国著名城市学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

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①人类对于城市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直到目前为止,要给城市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仍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城市的定义已经成了著名的难题”^②,虽然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然而要找到一个为学界所公认的定义却是十分困难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空间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的概念,因而对于城市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就涉及了多种学科,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各个学科也对城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也正因此,要对城市作出较为科学的定义,就必须尽量超越已有的各种学科对城市定义的局限,抽象出城市所具有的最为一般的特征。由于城市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发展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城市是有所差别的,因而对城市的科学界定还必须超越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找寻其共性成分的所在。

对于城市的界定应该把握住城市的本质性特点,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集中。一是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③城市是人口、资本、消费、文化等的集中之地,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点之一。如人口的聚集成为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宋俊岭:《城市的定义和本质》,《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衡量城市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我国现有的规定,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人口在 50 万—100 万的为大城市,人口在 20 万—50 万的为中等城市,人口在 10 万—20 万的为小城市。二是中心。列宁认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①据此,我国学者进一步提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金融、信息中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②可以说,城市是某一或大或小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的中心或某一方面的中心,中心是城市又一本质的特点。三是有别于乡村聚落的高级聚落。聚落属于地理空间概念,对于聚落,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分类是把聚落划分为农村型聚落和城市型聚落两大类。^③(也有在农村型聚落和城市型聚落之间划出似城聚落类型,实际上,似城聚落可根据其性质归属划入城市型聚落或农村型聚落)城市聚落是有别于乡村聚落的一种高级聚落,城市与乡村是相对而言的,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乡村聚落的形成要早于城市聚落,它们自形成始便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根据已有研究来看,我国“目前尚未发现有初期城市从原始中心聚落中直接演化出来的例子。”“这种演化,是指初期城市直接从原始聚落衍生出来的,而不是在同一地点上经过若干年后重建的。”^④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这应是城市的又一本质的特征。

① 《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4 页。

② 魏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前言。

③ 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史研究》第 17—18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徐苹芳:《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序。

根据以上对城市的本质性特征的认识,我们可将城市试定义为:城市是或大或小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等方面的集中之地和中心所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一种有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

城市的形成要早于“城市”一词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市”一词最早见之于《韩非子》当中。《韩非子·爱臣》中云:“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①也就是说,至战国时期,“城市”作为一种聚落名称已经形成。^②然而,中国城市于什么时期起源和形成?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要弄清这些问题,除了明确城市的定义外,还必须明了城市形成的标准有哪些以及在城市史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这些标准等问题。

关于城市形成的标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至今尚难形成统一的共识。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了城市形成的十项标准:一是可容纳更为稠密人口的大型聚落的形成;二是人口构成与功能呈现多样化;三是纳税及其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四是巨大的公共建筑的出现;五是出现了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六是发明

①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台湾学者杜正胜在《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中指出:“唐代以前,城是城,市是市,意指截然不同;城指城墙周圈内的范围,市不过占城内的一小区而已。城市连言,凡城墙所包含的聚落都叫做‘城市’,是宋朝以后的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4分,1980年12月版)“城市”一词在《韩非子》一书中最早出现,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城与市的结合,市进入城内,市与城合为一体。此后,“城市”一词即指与乡村有别的一种聚落,自然包括了城圈内的所有范围。杜正胜所说宋代以后的“城市”当指其所提出的“以商业为主体的都市”。(见杜正胜:《周秦城市——中国第二次“城市革命”》,载《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版)

了文字及精确、实用的科学；七是几何学与天文学进一步精确化；八是形成了专职的艺术家；九是对外贸易已经出现；十是以地域而非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形成。^① 苏联学者古梁耶夫根据古代东方和中美洲的相关材料概括出城市形成的八项标准：一是出现了统治者及其王室居住的宫殿群；二是出现了宏大的寺庙和宗教区域；三是最重要的宫殿、寺庙建筑群与平民的房舍相隔离；四是宗教区域与住宅区明显不同；五是具有奢华的王陵和墓葬；六是产生了大型的艺术品；七是形成了文字（碑铭石刻）；八是数量上的标志：大型广场、大量住宅和公用房屋，较密集的居民等。^② 日本学者狩野千秋将古代城市形成的标准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原始的国家组织和王权的确立；二是稠密的人口；三是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门化；四是大型纪念性建筑物的出现；五是文字、金属器物的发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六是由于剩余产品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是商业的出现和贸易组织的发达。^③ 国内学术界就此也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特别是近年来形成了许多更为深入的见解，如许宏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将中国早期城市与乡村相比较，提出了城市形成的三个方面的标准：

(1) 作为邦国的权力中心而出现，具有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职能；王者作为权力的象征产生于其中，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工程遗迹（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和城垣、壕）的存在。

① [英] 柴尔德著，陈星灿译：《城市革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转引自刘文鹏：《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③ 转引自陈桥驿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序言。

(2) 因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而具有居民构成复杂化特征,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使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社会;政治性城市的特点和商业贸易欠发达,又使城市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

(3) 人口相对集中,但处于城乡分化不甚鲜明的初始阶段的都市,其人口的密集程度不构成判别城市与否的绝对指标。^①

依据中外早期城市发展的历史实际情况,总结学术界关于城市形成标准的相关讨论及其观点,从城市的要素、本质和定义出发,通过归纳、概括和抽象,我们可对城市形成的标准进行新的更为全面的把握,下面试对城市形成的标准逐项加以列举和简要论述:

一是区域范围内政治、宗教、文化等的中心聚落的形成。城市是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落,它的出现是人类早期社会发展演进的反映,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私有制逐渐出现,财富形成积聚,阶级对立出现,国家形成。与这种社会变革相伴随相适应,城市作为新兴聚落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城市一出现就充当了一定区域内政治权力的中心场所,同时在人类早期崇尚宗教祭祀的社会氛围中,城市又有可能是区域范围内宗教祭祀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所在。区域范围内政治权力、宗教祭祀、地方文化等的综合的或者某一方面的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城市形成的标志之一。

二是军事防御功能得到加强的聚落的出现,其中许多以城墙的兴建为标志。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城市聚落开始形成。城市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聚落的出现是作为区域政治、宗教、文化等的中心而存在的,在社会剧变、战事频繁的时代,出于保卫政权和维护其利益的需要,加强防御外来军事侵略的能力,就成为新建的城市聚落的必然要求。城市聚落适应了这种社会变化的需求,其军事防御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城墙是作为新兴聚落军事防御能力不断加强的防御设施而出现的,城墙在中国城市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①“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②然而,城墙只是城市防御功能得到加强的一种(并非惟一的一种)实施方式,除此而外,也可利用山川地形险要作为城市有效的军事防御手段,也可利用其他设施加强聚落的军事防御。这种不断得以强化的聚落防御,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人类的战争威胁而不再是来自自然界的伤害。可以说,城墙的出现反映出聚落防御能力的增强,但城墙不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城墙不能单独用作城市特别是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志。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密集、众多、包围成圈的城墙,这只是城市的偶然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特征。”^③这一论述对于把握早期城市

① 可参考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100页;马正林:《论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陕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张鸿雁:《中国古代城墙文化特质论——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文化研究视角》,《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② 章生道:《城市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111页。

③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形成的标准,理解城墙在早期城市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国家、文明和早期民族的形成。城市、国家、文明和早期民族的起源、形成的历史进程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其同步性的特点(对此,下文有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论析),因而,城市、国家、文明、早期民族等的形成标准就可以相互借用或互为参照。城市的形成可以作为国家、文明、早期民族形成的标准或参照,同样,国家、文明、早期民族等的出现也可以作为城市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有学者将城市、文字和金属器物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又有学者将国家与王权的出现、金属工具的使用等作为城市形成的重要标准。^①

四是人口的聚集数量和密度要大于所在区域内的乡村。从乡村与城市的差异来看,城市是人口更为集中的地方,人口的数量一般要多于所在区域内的乡村,人口的密度一般要高于所在区域范围内的乡村。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不仅是城市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且也是衡量和判定城市发展规模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五是人口构成有别于乡村。与乡村聚落的人口构成有所不同,城市的人口构成要更为复杂。从社会生产角度来说,城市中已聚集有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和非生产人口;从职业构成来看,城市人口有农业人口、手工业人口和管理人口等的区分;从社会地位来讲,城市人口有了社会阶层和阶级的明显划分。人口构成的渐趋复杂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标准之一。

六是财富的聚集与消费中心。城市是区域空间范围内人类社

^① 于希贤:《对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两个问题的探讨》,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会活动的中心,“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①与乡村不同,城市是资本和财富的聚集之地,也是享乐和消费的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的职能除了表现为商贸中心外,也表现为财富与消费的中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所处历史地理环境的差异,城市的经济中心的职能的表现也因此有所侧重或有所不同,有的更多的表现为财富与消费的中心,有的则主要表现为商业与贸易的发展。在中国,“早期城市由作为权力中心而派生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②可以说,财富的聚集与消费中心的出现是城市聚落形成的标志之一。

七是大型聚落和建筑物的出现。与乡村聚落有所差异,新兴的城市聚落在规模上一般要大于所在区域内的乡村聚落;在城市聚落范围内,大型建筑开始出现,有些甚至是典型的标志性建筑。城市聚落中这些新的现象的出现,是城市作为区域范围内政治权力、宗教祭祀、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等的中心的必然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大型聚落和建筑物的建造,是判断城市形成与否的标准之一。由于这一标准表现为具体的实物,因而成为考古学上研究判定早期城市的重要依据。

八是金属器物的出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器物(青铜器)时代,不仅反映了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反映了由技术水平的巨大发展而引起的深层次的社会性质的变革,正因如此,金属器物的出现便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城市的形成也是随着技术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剧变而完成的,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金属器物的出现便被列入了城市形成的诸多标准中。

九是文字的发明和知识的生产。文字的出现和知识的生产是以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因此,文字的出现被视作了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同样,文字的创造和知识的生产便也可以作为在社会整体发展进步基础上出现的城市聚落形成的标准之一。

十是市场和贸易的形成。市场和贸易是构成城市空间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方面,市场的出现和贸易的形成是判定城市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对此,以英国学者柴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论述。然而,市场和贸易的形成仅是城市经济职能的一个方面而并非全部,但这并不影响市场和贸易的形成可作为断定城市形成与否的标准之一。

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单元内,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民族^①的不同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使得城市在起源、形成和发展中也有所差异。因而,不可用统一固定的没有变化的一个标准模式去判定城市的形成与否,否则,将可能抹煞不同地域城市发展的独特个性,也难以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符。因而,在应用判定城市是否形成的这些质的标准中,也可考虑采用量化的指标。例如,以上所列判定城市形成的十项标准,在某一个案的具体应用中可考虑不必强求全部达到,只要符合其中的大部分标准,如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标准,就可以初步判定该聚落已属于城市聚落。也许只有如此,才可能既注意到了城市形成发展的

① 这里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是指广义的民族概念,包括了民族形成以前的部族、部落等。

区域差异,又保证了判断城市形成与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 中国城市的起源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的形成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或者说是起源的历史过程后才完成的。那么,城市的起源又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呢?上文已列举了判断城市形成的十项标准,并提出了应用这些标准的原则,与此相联系,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标准中某一因素或几项因素在历史时期的出现,可以看做城市已经开始起源或者说开始萌芽。当然,处于起源阶段的城市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必须具备城市形成的必要标准,然而起源阶段城市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形成,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探讨城市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对城市起源的历史加以关注。

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已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①城市的起源植根于原始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社会的变化反映在聚落上的一种变化,就是新的聚落的防御功能的进一步加强,不仅要防御来自自然界的破坏(如野兽的侵扰、洪水的围困),更要防御来自人类社会变革中日益频繁的战争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晚于壕沟而出现的围墙或者说城墙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城市的起源。(当然,这并不否认处于起源阶段的城市聚落利用山川地形的险要而非建筑城墙以加强聚落的防御能力)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中国城市的起源始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这一结论已得到了来自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的证实。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近 60 座史前城址,并且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在这些已发现的史前城址中,有 3 座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留,其余皆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① 学者们依据这些城址发现,或认为中国城市始于仰韶文化晚期,或主张始于龙山文化早期。^② 应该说,这些史前城址的发现反映出中国城市的起源,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的形成。由于史前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我国不同区域城市起源在时间上也有早晚的差别。总的来看,中国城市的起源应始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

中国城市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早期也可以得到来自相关文献记载的印证。《汉书·食货志》晁错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神农之世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③,这条材料说明早在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神农时代,中国的城市就开始起源。又据《史记·封禅书》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又引

①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曲英杰:《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李先登:《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③ 曲英杰:《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

《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又记载舜世筑城。《吕氏春秋·贵因》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文献中还记载夏鲧开始作城。《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这些文献记载反映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的黄帝至夏王朝建立以前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处于中国城市的起源阶段。

市的形成源于产品交换的需要，市的出现也表明了城市的起源。“城市是由市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①然而，在中国城市的起源过程中，城的开始兴建并没有和市结合起来，直到周代，市场才进入城内，这正表明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所走过的特殊道路，但市的出现表明了城市的起源。《说文》云：“市，买卖所之也。”市就是交易场所即市场。据《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据《世本·作篇》载：颛顼时“祝融作市”。这些文献资料反映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中国城市就已开始起源。

中国城市的起源之所以发生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

①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1页。

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①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口的增长,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前苏联学者安德列耶夫在《都市化的早期形态》(载《古代史通报》1987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城市起源和形成的基本的先决条件:一是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相对的高水平,从而保障了剩余产品的出现并创立了作为其集中在一定地方的条件;二是以财富和地位为标志的早已升高的社会层次;三是最初孤立的农村公社政治上的整体化和原始的国家机关的形成;四是手工业、军事、祭祀活动等方面的专职化的发展。^②城市的起源是在具备了基本的必要条件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距今1万年以来,地质上进入了第四纪的全新世,在全新世的最初2000年间,全球气候由寒冷干燥逐渐转为温暖湿润。随后,全球气候进入了温暖湿润期(约距今8000—3000年)。^③我国的气候变化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距今8000年至夏朝建立以前的这段时期,持续温暖湿润的气候,为中华先民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环境。^④距今8000年以来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原始农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在中华大地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率先发展起来,人

①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② 转引自刘文鹏:《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英]A.高迪著,邢嘉明等译:《环境变迁》,海洋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70页。

④ 毛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口也开始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等各方面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任式楠认为,城邑的出现绝不仅是人类居住形式的自然变化,更是在政治力量驱使下营建的社会工程。^①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城市的起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3. 中国城市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是在夏朝。傅筑夫提出:“城市的产生,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阶级社会的产生时期,具体说,奴隶占有制的形成时期,便是城市的开始时期。”主张夏代“是古代城市的开始时期”。^②这里所说的“城市的开始时期”即应指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时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中国城市形成于夏代的主张。^③

关于夏代所建的都城,《古本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有着明确的记载。夏的主要都城有禹时的安邑(今山西夏县)、阳城(今河南登封)、阳翟(今河南禹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启时的夏邑(今河南禹县)、太康时的斟寻(今河南偃师)、相时的帝丘(今河南濮阳)、斟灌(今山东观城)、少康时的纶(今山东济宁)、原(今河南济源)、杼时的老丘(今河南陈留)、胤甲时的西河(一说今豫西陕东,一说今河南内黄)、桀时的斟寻(今河南偃师)。^④这些都城

①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②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③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④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300页。

是中国最早时期形成的真正意义的城市。徐旭生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认真分析,提出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文化关系特别密切,一是豫西地区伊、洛、颍水流域,二是晋南地区汾、浍、涑水流域。^① 这一论断正在逐步得到考古发掘的证明。

到目前为止,关于夏王朝的城市较早发现的有夏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②和夏方国城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关于夏文化虽然存在有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赞同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代表。依据碳 14 测出的数据,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的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冈期的早商文化。从二里头遗址本身的材料及其与河南偃师商城的关系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都城之一。^③ 近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二里头宫殿区外围探明了 3 条垂直相交的大道,确认由其围起的宫殿区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左右,……又发现了宫城城墙的线索,在探索二里头遗址都城总体结构与布局上取得重要突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 2400 米,南北最宽约 1900 米,北部被洛河冲毁,现存面积约 3 平方公里。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

① 徐旭生:《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新建设》1960 年第 3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 4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 年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③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遗址的东部边缘地带发现有断续延伸的沟状堆积,可能是建筑用土或制陶用土的取土沟,具有区划作用,形成遗址的东界。”“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表明,这里是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①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夏及商代3个时期的三叠城,其中龙山文化城址为河南同时期最大的古城址;夏代城址在中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夏、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②此外,2002年3月至2003年12月发掘了河南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③2006年9月,又在湖北郧县辽瓦遗址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代城址,“这一发现为史料稀少的夏代研究找到了新的文物实证”。^④夏代城址的不断发现,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的城市在经过漫长的起源时期后真正形成于夏代。

4. 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

从夏代立国到秦统一帝国建立以前,是中国城市形成后的第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的变化呈现出逐渐加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西周以来,中

① 《夏都城遗址布局搞清: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华商报》2003年10月14日第7版。

② 《'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

③ 《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16日。

④ 《南水北调库区发现夏代城址》,《光明日报》2007年4月11日。

国城市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开始于周初，兴盛于春秋中期以后。”^①也有学者主张周代曾出现过两次城市建设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西周建国之初，《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是对这次城市建设高潮形成的城邑建设制度的全面总结，曲阜鲁都的规划证实了这一制度的真实存在；第二次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其中城市性质的变化又引起了城市规划建设体制的巨大变革。^②西周初期，周人实施封邦建国方针，城市数目显著增加。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城市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城市数量明显增多。历史文献当中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筑城记载较为丰富，据学者统计，仅见于《春秋》、《左传》的筑城记载即有 88 次之多，其中鲁国 29 次、楚国 21 次、晋国 12 次、郑国 6 次、曹国 5 次、齐国 4 次。^③学者潘英根据《左传》等历史文献，查找到春秋时期 35 国的 581 座城邑，并提出春秋时的城邑应多达 970 多个。^④许宏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⑤一书中制作出《文献所见春秋诸国筑城一览表》和《春秋战国城址一览表》等，详细列举出文献所载和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信息，从中可

① 于云汉：《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编：《城市史研究》第 15—16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贺业钜：《试论周代两次城市建设高潮》，《建筑历史与理论》第 1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于云汉：《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编：《城市史研究》第 15—16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潘英：《中国上古史新探》，文明书店 1985 年版，第 253—262 页。

⑤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以看出这一时期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

(2)城市规模扩大。据考古发掘资料,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的面积一般较大。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是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秦国都城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 3480 米,南北宽 3130 米,总面积超过 10 平方公里。^① 湖北荆州郢都纪南城为东周时期的楚国都城遗址,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4500 米,南北宽约 3500 米,总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②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鲁国都城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最长约 3700 米,南北最宽约 2700 米,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③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遗址,遗址由大、小两个城垣组成,大、小两城的总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左右。^④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模的扩大还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有学者估算,战国时期大中城市的人口总数量约为 400 万之多,可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 20%。^⑤

(3)城市工商业繁荣。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从春秋末年以迄于战国,地处济水流域的陶(今山东定陶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

①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 年第 8 期;韩伟等:《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 年 5、6 期合刊。

②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4 期。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6 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 年第 5 期。

⑤ 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6 期。

除此之外,卫之濮阳、赵之邯郸、燕之蓟、周之洛阳、秦之雍和栎阳、楚之郢都、齐之临淄等城市,也是当时工商业极其繁荣的经济都会。^①这一时期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景象,可从苏秦对临淄城的描述中窥见一斑:“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踰跽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②

依据中国城市发展历史过程的实际情况,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期。自夏代中国城市形成至西周以前为一个时期,这是中国城市形成后的最初发展时期。从西周开始,中国城市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显著标志是城市内部开始设市。据文献记载,西周的都城丰镐已经设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里讲到了周朝国都营建的规模和布局,提到了市的设立和城内的布局。《周礼·地官·司市》还记载了市场的情况:“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政府对于市场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市又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④各诸侯国国都也广泛设市,“百乘之国,中而立

① 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载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②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版),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③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④ 杨生民:《论春秋战国的市》,《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管子·揆度篇》）学者们通过对出土陶文的分析考证，确证了战国时期的秦、齐、燕等国的都城皆设有若干的市，说明这一时期实行了一城多市制。^①

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城市的出现将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时期。春秋初期，秦国率先在新占领的地区设县进行管理，县直属国君领导。^②此后，楚、晋等国亦相继在新兼并地区设县。春秋后期，又在边地置郡，地位略低于县，归属国君统治。战国时期，随着边地的扩展，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逐渐繁荣，在郡下开始分置若干的县，形成了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组织。郡、县的设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郡、县的治所就是其所管辖范围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中心，应属于新型城市。郡、县皆建筑城市以作为治所，甚至在文献中“城”与“县”往往通用。如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道：“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虞卿对曰：‘……今虽割六城，何益！……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③很显然，这里的“县”与“城”通用，二者名异而实同。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普遍设置郡县，从而“使得中国城市由单一结构逐步向多层次发展的历史进程加快并趋于制度化”。^④秦统一天下

① 袁仲一：《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第1期。

②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

③ 张大可编著：《史记全本新注》（全四册），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于云汉：《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主编：《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后,建立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郡县城市普遍建立并得以充分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由此迈入了新的阶段,即由中国城市的早期发展阶段迈入了走向成熟的古典发展阶段。

5.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特点

张光直指出:“中国城市初期形式有它自己的特征。……如何解释它这种特性与近东和欧洲的西方文明这一段社会演进特征之间的差异,与由此所见中国历史研究对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贡献,正是亟待我们进一步积极研究的课题。”^①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从而使城市的早期演进呈现出显著的本民族所具有的独有特征。

(1)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具有多元起源和形成、不平衡发展并渐趋一统的特点。受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性特点的影响,各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在早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华文明就是多元起源共同发展并最终融合为一体的,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从已发现的近60座史前城址来看,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域之中,这些城址反映出中国城市在不同地域中的多元起源。各地城市在起源过程中处在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但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并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各地城市多元起源,共同发展,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率先在中原形成。其后,有些地域的城市发展受其影响,纳入统一的发展体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系之中,而一些远离或与之相对隔离的地域的城市发展仍处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中原王朝的更替和疆域的不断扩大,各地城市发展除了相互之间互为影响外,有越来越多地域的城市发展纳入了统一的城市发展体系之中,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随着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城市发展体系最终形成。从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整个范围来看,中国早期城市发展显然具有多元起源、不平衡发展、渐趋一体的重要特点。

(2)城与市双轨并进的城市演进道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城市的起源始于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其中市的出现和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防御而形成的城邑聚落的出现是城市起源的标志的重要方面。然而,市和城并非结合在一起,同处一个聚落,市和城独立成为中国城市起源的要素,这也是中国城市起源的独特之处。到夏代国家的建立,中国城市的正式形成,市仍然可能尚未与城结合为同一聚落,城与市的发展表现为双轨并进,从而使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市场和商业贸易,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征。直到西周时期,市才进入城内,纳入中国城市发展的体系,从而也大大加快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城与市双轨并进转化为一体共同发展。可以说,在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城与市双轨并进构成了城市演进的独特发展道路。

(3)政治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并不具备贸易中心的性质”^①，“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

^①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邵望平的发言),《考古》1989年第12期。

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①原始农业的发展,社会政治的变革,促使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政治因素是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另一方面,中国早期城市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西周以后,市场进入城市,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商业和贸易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的有生力量,然而政治力量依然是城市发展的主导方面。杜正胜指出:“战国城市商业虽发达,更重要的还是军事和政治的重心,兼具多重性质。所以中国城市发展曲线并非从军政祭一体的城邦转化为商业城市;在增益商业性质时,军政性质不但未曾减退,反而更加强。”^②应该说,城市的政治性质决定着其军事性质,军事性质是政治性质的延伸。战国城市商业的发展并没有削弱城市的政治性质,反而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战国时代,城市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对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就整体来看,政治因素依然在城市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③ 这种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杜正胜:《周秦城市——中国第二次“城市革命”》,载《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公司 1992 年版。

③ 关于城市经济在战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批学者主张经济是战国时代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有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战国时代城市的发展并非取决于纯粹的经济因素,其繁荣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政治或军事的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的城市发展,在一些区域,经济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更大的区域内,城市发展则主要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作用。(可参考日本学者江村治树《战国时代的城市和城市统治》一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0—211 页)不管从城市发展的各方面要素来考虑,还是从整个区域来思考,在战国时代城市的发展中,政治因素依然是主导因素。

状况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作为某一或大或小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中心而存在的,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中国古代,“从社会整体意义上说,城市始终是政治中心功能占主导位置,各级城市就是各级政府的治所所在地,作为政治中心统治着乡村。”“城市未能构建独立于自然经济之外的商品经济结构,而在政治结构的从属关系下,形成了以政治关系为主体特征的城市经济结构形式,并成为有助于封建经济关系延续的要素之一。”^①

(4)都城位置的频繁迁移。与秦汉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相比较,中国早期的都城迁移更为频繁。“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建都位置的迁移为世界各国少有,例如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意大利的首都一直在罗马,巴黎从五世纪至今仍是法国的首都,英国从中世纪七国战争之后首都一直在伦敦,日本古都变化也在京都与东京之间,而中国都城则东西南北地迁移。”^②都城位置不断迁移,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③先秦时期的都城迁移不仅表现在不同朝代都城位置的变化,还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同一王朝从建国前到建国后都城的不断迁移。徐旭生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认真分析,提出豫西晋南地区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域。^④夏代都城在此范围内经历了多次迁徙,近年来夏代城址在此范围内的不断发现也说明

① 张鸿雁:《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③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迁移的规律及其原因等问题一直是史学界长期讨论的学术问题,对此已形成诸多不同的见解。

④ 徐旭生:《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新建设》1960年第3期。

了这一点。商人都城“自契至汤八迁”^①，汤灭夏之后又有五迁，最后在盘庚时迁都于殷，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是我国第一座有文献记载、出土文字印证并被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周人的都城也经历了由关中平原自西向东不断迁移，最后定都丰、镐和雒邑等地的历史过程。秦人的都城自西向东，并在关中平原多次选址，最后定都于咸阳。先秦时期都城的频繁迁移，应属于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特点之一。

二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与国家、文明、民族演进的关系

城市的演进经过了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样，国家、文明、民族的演进也经历了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历史演进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与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大体同步进行的，即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基本发生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其演进发展的历程相互之间密切相关、共同一体推进。^②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关于人类社会城市、国家、文明、民族历史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城市、国家、文明、民族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一学术问题是笔者将长期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文中所阐发的仅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初步的看法，尚须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将此陋见发表，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深入研究。此外，导师隗瀛涛先生和段渝、谭继和、何一民、陈廷湘等先生对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和极大的鼓励，在此表示感谢。

1. 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发展经历了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它的起源与社会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发展繁荣,社会产品的相对剩余,财富的相对集中,使私有制和阶级开始形成和出现,与这种社会变化相适应,原始的初期的权力机构逐步形成,于是国家开始起源。国家在中华大地上的起源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国家的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国家起源的发生到夏代真正国家的建立,这一时期国家的起源阶段可谓准国家阶段,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称这一时期的准国家形态或为原始国家、或为雏形国家、或为早期国家、或为部落国家、或为城邦王国、或为酋邦、或为古国、或为方国等。^① 国家的起源是在中华大地的许多地域同时或相继发生的,诸多或大或小区域的权力中心的逐渐形成,为夏代真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诸多地方权力中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国家的起源,而且正在打破原有的自然的单一的地域结构,形成新的社会地域结构。正如学者所分析认为:

在酋邦时代,地域结构已经超越了纯血缘、纯自然的结构,反映财富和权力差异的地域结构已然出现。在酋邦社会,

^①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兹全:《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李黔宁:《近年来关于酋邦问题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4期;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在氏族群体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于血缘的差异之上又增加了财富与权力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新的、更为强大的对人文空间的创造力量。社会中因此出现了集中的对土地,更准确地说是土地差别使用的控制权力,这是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变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①

可以说,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和地域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土地控制权的差异,一方面正在打破原有的血缘社会结构,使血缘社会开始向地缘社会逐步转变;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地域结构的出现和发展,也为真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特别是到其后期所涌现的“万国林立”的权力中心^②,其各自的发展水平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在迈向真正国家的路途中也表现出快慢之别。然而,首先迈进真正国家大门的权力中心必须在历史地理环境上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如亨利·莱特(Henry Wright)指出:“‘复杂的酋邦’可能在条件优良的孤岛上存在,但如果它们不划入一个较大的系统之内,它们似乎便不会进一步演化成国家。”^③这里所说的较大的系统,应指某一区域范围内存在着较多的酋邦,并且这些酋邦间存在着矛盾和对抗,这种人文环境促成了国家的形成。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的形成,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特别是河洛之间众多权力中心之间长期相互对抗斗争的必然产物。

①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②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 转引自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原出处为:Henry Wright, "Recent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P382.

夏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种城市国家^①,这种国家形态一直延续到秦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前。城市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其国家领土的含义与秦以后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城市国家时期,“所谓‘国’,实际是一个大邑,所谓‘王朝’(如夏、商)也不过是一个大邑统治着在征服各地后建立的若干据点小邑。大邑与其统治的小邑之间的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敌对的不同种姓的小方国。”“当时人所想到的王朝国土,只会有分散在各地的几个‘据点(小邑)’的概念,还没有以大邑为中心的‘整个面’的概念。在这种群‘点’并立的情况下,自然更不会有‘王朝边界’的概念了。”^②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间兼并战争的加剧以及郡、县的开始建立,完整的王朝国土逐渐开始形成。有学者对古代城邦史进行专门研究,并将中国古代城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禅让时代为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为原始君主制城邦;春秋时代为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古代城邦制走向解体,向帝国阶段过渡。^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四

① “城市国家”这一概念以前曾有学者使用过,如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10月版,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修订版)中就用这一概念说明周代国家的发展状况。此外,日本学者鹤间和幸也曾论及“城市国家”问题。“他提出了从城市国家的出现到中华世界形成过程中三种地域扩大的概念。其第一地域——城市,指的是从殷周到春秋时期,‘领域国家’(即所谓‘领土国家’)形成之前以城市为基础而出现的城市国家。在领域国家形成之后,它们以郡县的形式成为传达中央政府意向的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第二地域——战国国家,指的是国土空间扩大了战国时期的诸‘领域国家’,但依然是扎根于各地域的国家。第三地域——华夷共存的世界,鹤间先生称之为广义上的‘中华’,它超越了战国地域国家框架,相当于诸子所言的‘天下’这样的地理概念。”(见王震中:《1998年日本先秦史研究的几部力作》,《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6期。)

②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4页;又参见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与“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③ 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属于城市国家形成前的准国家阶段外,其余三个阶段虽有发展的差异,但都属于城市国家阶段。

秦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在春秋战国逐渐形成的郡县制度的基础上,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国家领土和疆域局面,国家形态进入了领土国家发展阶段。

2. 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在所著《古代社会》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又对这一理论做了新的补充和发展。^① 这一理论对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学者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见解。^② 实际上,文明的演进经历了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文明的起源发生在野蛮阶段,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文明的形成标志着人类社会由野蛮阶段跨入了真正的文明社会。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一书,按照生活资料来源的扩充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细分为七个小的时期:蒙昧下层期——人类幼年期、植物采集;蒙昧中层期——使用火、鱼食;蒙昧上层期——发明弓、肉食;野蛮下层期——制作陶器;野蛮中层期——饲养家畜;野蛮上层期——铁矿的提炼;文明期——发明文字。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5页)一书,在摩尔根的理论的基础上,更加以婚姻形态,提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蒙昧期为集团婚,野蛮期为对偶婚,野蛮上层期为一夫多妻制,文明期为一夫一妻制。(可参考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载彭卫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的文化中，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却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点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面，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①文明要素的零星出现，标志着文明的起源；而诸多文明要素集中出现在某一时空范围，则是文明社会形成的表现。

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有学者以这一命题为基础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毋庸讳言，人类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适应各区域地理环境下的全方位的演进，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的智力、思维能力、思维方式以及宇宙观等）、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语言、文字、生产工具、武器、衣、食、住、行等）、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在这一系列的演进中，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表现为社会形态上的运动和推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③

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演进是整体推进的，国家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是同时发生的，并都经过了长期的起源过程，同时国家的形成和文明的形成也是同时发生的，“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中国文明的起源始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大约

①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徐莘芳的发言），《考古》1989年第12期。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③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距今 6000 年是我国私有制产生的转折点^①, 中华文明的起源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许多学者认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开始阶段即起源阶段, “龙山期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草创期”。^②

夏代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与此同时, 中华文明在经历漫长起源过程后至此也正式形成。从夏代开始, 至秦帝国建立, 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尚处于初期的早期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中华早期文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等各个方面, 并为文明的新发展注入了活力。秦统一王朝的建立, 领土国家的形成, 为社会的不断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展自此也从早期发展阶段步入了古典文明发展阶段。

3. 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包括了依次发展的四个类型: 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 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狭义的民族仅指广义民族概念中的“民族”部分, 斯大林指出: “民族是人们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狭义的民族是广义民族的最高发展阶段, 是前三个阶段连续发展的结果, 与前三个阶段既有密切联

① 知原主编:《面向大地的求索——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75—176 页。

② 王震中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39 页;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5 期。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64 页。

系,又有质的差别。这里讨论的民族主要是就其狭义而言的。

民族的历史发展也和国家、文明、城市一样,有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民族的起源发生在真正民族即狭义的民族形成以前的部族或部落阶段,并且与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同步关系。中华民族的起源开始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从这时算起,直到夏代夏族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期。在这一时期,由氏族发展而来的部族或部落构成了诸多准国家形态的国家形式存在的基础^①,原有的自然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结构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由单一走向复杂,这些为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由于各个部族历史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客观条件的不同,因而在迈向民族大门的进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最早形成的民族是夏族,夏代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夏族)的形成。夏代至秦帝国建立前属于中华民族的早期发展阶段,先是夏族的形成,随之以夏族为主干,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早期融合过程,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加剧和郡、县的开始建置,进一步加快了民族的融合,促成了以夏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发
展。^② 这一时期政治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郡、县的设置,使原有的血缘社会地域结构不断被打破,并开始形成了新的地缘社会地域结构,这些也为早期中华民族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秦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实行统一度量衡和文字、推行郡县制等政策,从而使地缘社会结构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由早期发展阶段进

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285页。

②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人到了古典民族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相互融合不断加强,到秦汉时期,由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为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期。

4. 城市与国家、文明及民族演进的关系

人类历史的演进应是整体推进的,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不仅四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其发展历程有着大体一致的同步关系。(见表4—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从马恩的这一论述不难看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准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部族向民族过渡是大体同时进行的,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同步发展关系。

“国家、文明和城市在起源上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原因是相互联系的。”^②正如所言,国家、文明、城市、民族等的起源是大体同时发生的,是以原始农业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的变革等为基础的。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文明、城市、民族的起源开始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其起源过程一直持续到夏代国家的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 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表 4—1 中国城市、国家、文明、民族同步演进表

历史进程	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至夏代建立	夏朝建立至秦统一国家建立以前	秦统一国家建立以后
城市演进	城市起源阶段	城市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	古典城市发展阶段
国家演进	国家起源(准国家形态)阶段	国家形成(城市国家)及早期发展阶段	领土国家发展阶段
文明演进	文明起源阶段	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	古典文明发展阶段
民族演进	民族起源(部族)阶段	原始民族的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	古典民族发展阶段

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形成也是大体同时完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他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他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在这里，恩格斯将城市的形成与文明的形成密切联系了起来，可以看出他们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同步关系。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将城市与文明的形成联系起来。^②实际上，除此而外，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形成都是同时发生的。夏代的建立，既标志着真正城市的形成，也标志着国家、文明和民族的形成。此后直到秦帝国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② [英]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英]柴尔德著，陈星灿译：《城市革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立以前这一时期,是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早期发展阶段,期间他们也随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经历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激烈变革,使他们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做好了准备。

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郡县制度的推行,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国家、文明、民族的演进也由早期发展阶段跨进到较为成熟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章 古代巴蜀城市发展的 历史地理环境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城市在某些区域的率先兴起和发展,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探讨城市兴起与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 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

自然和人文的地理环境因素是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地理位置(经度、纬度,主要是后者)、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矿藏等因素,对文明是否能够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简单地说,这些要素不仅对人类群体的经济类型,对作为古代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农业、定居以及农村和城市,从而对推动和促进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人们由发现和开发矿藏到冶炼和制造金属器,有着同

样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①正如所论述的那样,地理环境各要素对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作用。当然,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作用并不是均衡的,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是自然环境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作用要更为突出。^②中国城市的兴起和早期发展受到了所处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

1. 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距今1万年左右,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约与此同时,地质上进入了第四纪的全新世。在全新世的最初2000年间,全球气候由寒冷干燥逐渐转为温暖湿润,距今8000年至距今3000年的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进入了温暖湿润时期。^③中国的全新世大暖期出现于距今8500年至距今3000年间,其中稳定暖湿的鼎盛阶段发生在距今7200年至距今6000年间。^④据学者研究,在全新世中期,我国一些气候带相应的比现在稍向北偏移,如亚热带北界就由现在的秦岭—淮河一线北移到华北平原北部的京、津与关中平原的北山一线,证实了温暖湿润气候的客观存在。^⑤这一时期亚热带动物群的向北迁移和植被的分布状况,也

①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③ [英]A. 高迪著,邢嘉明等译:《环境变迁》,海洋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70页。

④ 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载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⑤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线的推移》,载《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说明在全新世中期,我国东部亚热带界限曾向北移动到黄河流域。^①“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大面积分布在黄河流域,现代竹类的大片生长基本上不超过长江流域。”^②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在距今 5000 年到距今 3000 年的 2000 年当中,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均温度比现今高 2℃ 左右,一月份温度比现在高 3—5℃。^③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中国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种适宜的气候环境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与文明。

全新世以来,特别是距今 8500 年以来我国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中国先民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极为有利的气候状况下,中国的原始农业得以快速发展,产品开始出现相对剩余,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变革相伴随,国家、文明、城市等开始起源,并在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后,随着夏朝的建立而正式形成。原始农业的突进、史前社会的变革以及国家、文明、城市等的起源和形成之所以发生在距今 1 万年以来的全新世特别是距今 8000 多年的全新世大暖期,是与这一时期优越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历史时期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为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以至早期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外

① 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8 页;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 1 辑。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8 页。

③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部自然条件。

2. 温带亚热带的自然环境

适度的自然条件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历史学家白克尔在其《英国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生产的粮食必然丰富,粮食的丰富就使得一部分人可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智力活动。因而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它的社会发展也就越发达。^①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早期,情况并非如此。就自然条件总的情况而言,过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样,对农业的起源和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过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早期人类产生了对自然界的过分依赖,易于养成惰性,缺乏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动力;而过于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早期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失缺了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段渝所指出:“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如寒带、亚寒带,无论如何也发生不了早期文明。但自然条件过于富饶的地区如热带的大多数区域,又会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反而束缚以至削弱人们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意志和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发展,同样也不会发生古代文明。”^②又如张之恒所分析:“新石器时代华南地区生产性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比中国其他地区优越。华南地区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温暖多雨,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使人们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仍将采

^① 王恩涌:《文明起源的地理条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②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集和渔猎作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从而抑制了农牧业经济的发展。”^①只有适度的自然条件才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以及城市、国家和文明等发生发展所必需的。因为这种自然条件既可为早期人类提供一定的生活生产条件,又迫使人类不断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促使了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中华文明以及国家和城市最早兴起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不是北方草原荒漠地带和华南地区,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温带、亚热带大多属于自然条件相对适度的地区,因而成为人类早期文明、国家和城市等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②许多哲人都指出,温带尤其是北温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舞台。实际上,从历史发展来看,除了温带,亚热带尤其是亚热带中靠近温带的地带同样也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舞台。温带、亚热带充当了人类早期文明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世界多数早期文明都形成于地球上的温带和亚热带,是由于温带和亚热带在自然条件方面富于差异性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这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分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自然基础,也促使人类需要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从而促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③在世界古代六大文明发祥地^④当中,古代印度、墨西哥和秘鲁虽位

①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②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24页。

③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世界有六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玛雅和安第斯(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提出世界文明有六大发祥地:埃

处回归线附近或者以内(在赤道与回归线之间),但由于其文明发生地地处高原、山谷等地形,海拔高度、土壤条件等因素使得形成了与温带、亚热带草原及河谷地区较为相似的自然条件,也就为其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可以说,温带、亚热带较为适度的自然条件,为中国早期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空间。

3. 邻近水源的平原地带

在诸多地形中,平原、河谷盆地和河湖沿岸的台地是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最早发生的地区。

平原、河谷盆地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土地平坦、开阔,土壤肥沃,水源丰富,交通便利,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良好地域,也是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所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平原、河谷盆地成为人类早期经济发展最为发达的区域,从而也为城市、国家、文明等在这里率先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航行极为容易,同时又为沿岸平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灌溉的便利,正是这样的地貌条件,在尼罗河流域孕育出了古老的古埃及文明。从已发现的我国史前城址的地理分布来看,城址一般紧邻自然水源,城址周围具有一定范围的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河谷盆地。^①据学者所作的统计,《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我国古代城市,几乎都分布

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P24.)。丹尼尔的主张受到了学术界极为广泛的关注。

①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在平原和河谷盆地上;《史记》、《汉书》中提到的城市有二三十个,从分布上看,黄河中下游平原有9个,占70%,长江中下游平原有3个,占24%。^①平原和河谷盆地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环境优越的平原、河谷盆地是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地域之一。

河湖沿岸也是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较早发生的地区。就地貌条件而言,河湖沿岸为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河湖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活生产的便利,也为他们提供了交通的方便:“一是河流有舟船之便;二是山地丘陵地带的河流虽然没有航运之利,但河谷平地却自然成为交通的孔道。”^②正如学者所指出:“河流和湖泊沿岸自古是人类最理想的居址,自然成为古代城市的空间生长点。因为河、湖沿岸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既利于生产和生活,也利于发展对外交流,是人口汇聚,经济发展水平高,商品交换最活跃的空间。”^③除此而外,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城市在河湖沿岸的兴起和发展还考虑到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城址筑在河、湖岸边及邻近地区,这些河、湖本身就是一道自然防御屏障。”^④出于生产、生活、交通、贸易和军事防御等多方面的考虑,河湖沿岸自然成为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地域之一。

4. 经济活动的发达地区

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不仅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

① 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351页。

②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③ 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④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系,而且与人文地理环境关系极其密切。^①从地理空间上讲,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生发展的地区,往往也是国家、文明、民族等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地区,他们在空间上大致是相互重合的,而这些地区通常又是当时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最为发达的区域。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城市、国家、文明等率先开始起源、形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早期城市获得了稳步而快速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的原始农业首先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展起来,黄河流域形成了以粟、黍栽培为主的旱作农业,长江流域则形成了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稻作农业。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到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黄河、长江两河流域已率先发展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达区域。^②从已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括聚落)的分布来看,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密集程度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要多于和高于其他地区。^③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及其社会政治的变革,使得中国城市率先在这些区域开始起源。有学者将中国城市的起源区域划分为两个主要地带和次要地带,主要地带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次要地带是北方的草原游牧区和由东南沿海向西南地区延伸的弧形地带。^④实际上,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区域有先后之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国城市最早起源和形成的地区。

①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可参考拙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33页。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王妙发:《黄河流域的史前聚落》,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王恩涌:《评〈中国城市发展史〉》,《人文地理》1996年第3期。

从我国考古发现的近 60 座史前城址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见图 5—1)^①,证实了中国城市在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的率先起源,这种现象显然是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的。

在早期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中国城市最早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起源,之后,在经过了漫长的起源过程后,中国城市最早在这一区域正式形成。夏代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率先在黄河流域的真正形成。从夏代开始,中国早期城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从地理空间来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于其经济发展的推动,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无疑处在全国的前列。

二 古代巴蜀城市的历史地理环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管是工具的发明、改进和物质生产,还是城市、国家、文明等的起源和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代巴蜀所处的主要地理区域是四川盆地,其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其所处的四川盆地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1. 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三大阶梯状分布,一级阶梯为

^①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 年第 1 期)一文附有中国史前城址分布示意图;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研究》(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1999 年博士论文)和《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中也附有史前城址分布图;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也附有图幅,此示意图据钱耀鹏图改绘,这里所引图幅即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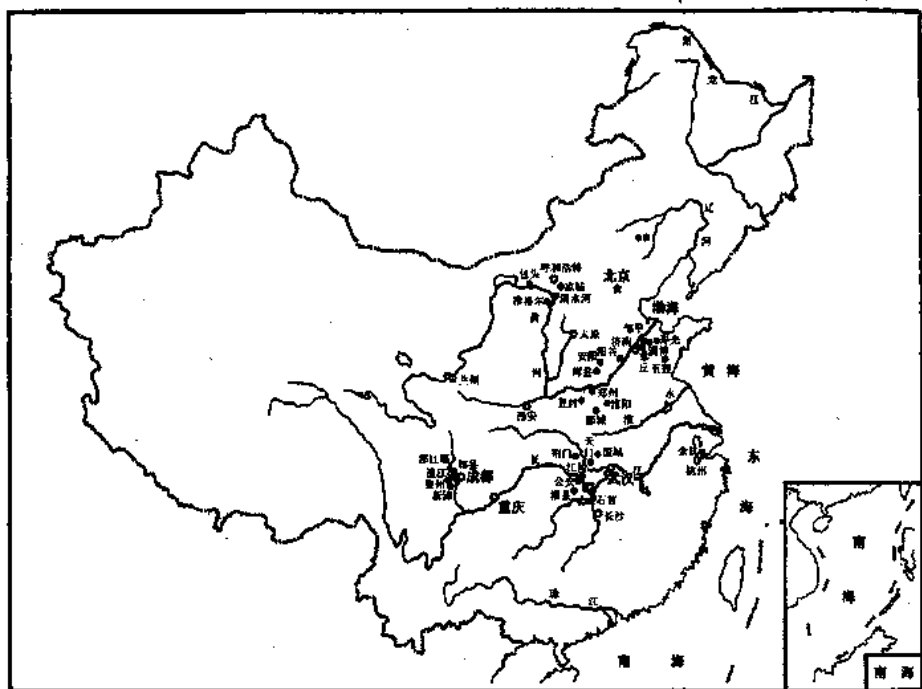


图5—1 中国史前城址分布示意图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5000—4500 米;东部沿海平原和丘陵为第三级阶梯,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下;二者之间是第二阶梯,为高原、丘陵和高山环绕的盆地,平均海拔 1000—2000 米。四川盆地位于北纬 $28^{\circ}30'$ — $32^{\circ}30'$,东经 103° — 110° 之间,面积 165456 平方公里,隶属我国大陆地势的第二阶梯,是典型的四周高山环绕、内部为河谷丘陵平原的内陆盆地。^①

四川盆地地处我国的亚热带,气候主要属比较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季温暖,无霜期长,春季到来较早,夏季湿热,

^① 《中国植被》编委会编:《中国植被》,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秋季多雨,全年多雾,具有鲜明的气候特点。^① 据相关研究,这一地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国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即近一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是由寒冷干燥期与温暖湿润期交替出现,距今 10000—8000 年是寒冷阶段,年温比今天低 4—5℃;距今 8000—3000 年属暖热阶段,年温比今天高 3℃左右,湿度也较今天要高;距今 3000 年以来气候进入温和阶段,温度变化不大。^② 历史时期植被的分布情况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状况。^③ 四川盆地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特别是距今 8000 年以来的气候向温暖湿润的转变,也得到了来自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的实物资料的证实。^④

和其他地区一样,四川盆地距今 8000 年以来的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本地区富有地域特色的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⑤ 正是在原始农业发展和社会不断变革的基础上,古代巴蜀的城市得以在四川盆地起源、形成并不断发展。可以说,四川盆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距今 8000 年以来由寒冷干

① 柳又春:《四川盆地的几个气候特色》,《地理知识》1980 年第 8 期。

② 陈淑全:《四川气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 1 辑;罗二虎等:《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版;刘兴诗:《四川盆地的第四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2 辑;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5—126 页;傅顺等:《金沙遗址古环境状况的综合探讨》,《中国地质》2005 年第 3 期;姚轶锋等:《成都金沙遗址距今 3000 年的古气候探讨》,《古地理学报》2005 年第 4 期;傅顺等:《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 年第 1 期。

⑤ 姜世碧:《成都平原的环境对蜀文化聚落建筑与经济的影响》,《四川文物》2003 年第 2 期。

燥转向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极大地促进并加快了该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为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 地形特点

古代巴蜀主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四川盆地的独特地形对于古代巴蜀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川盆地是全国一个特殊的自然区域,其自然地理特征非常明显,区域界限十分明确。从地形上看,四川盆地属典型的完整盆地,四周为海拔 2000—3000 米的高山和高原所环绕,中间为海拔 300—700 米的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西部边缘有邛崃山、大凉山等,由此向西是青藏高原;北部边缘是龙门山、大巴山等,以此为界,与汉中盆地相分离;东部边缘有巫山等;南部边缘是大娄山并以此与云贵高原相接。盆地底部大致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点连线为界。盆地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盆地内的长江支流北侧水量较大,有岷江、沱江、涪江和嘉陵江,即“四川”^①,南侧的支流较小,有乌江、赤水河等,构成了向盆地中心辐射的不对称水系。长江干流则向东切穿巫山而去,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盆地内自西向东由成都平原(又称盆西平原、川西平原)、川中丘陵(盆地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组成。^②

① 这里所说的“四川”是指四川盆地最主要的四大水系,而四川的实际得名是始于宋代。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卷 31《四川》条:“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 1994 年版)元代称四川行省,明代称四川布政使司,清代称四川省。

② 任美镔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 3 版),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26—231 页;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主编:《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9—121 页。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内部惟一的较大的平原,主要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的冲积扇组成,面积约 6000 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约 520—750 米;这种缓斜地形非常利于发展自流灌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建就是利用这种地形引岷江之水灌溉成都平原的大量农田。据《尚书·禹贡》记载,这里古为梁州,土壤属于青黎,即青黑色的土壤,土质细而结构疏松,肥力较高。成都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为该区域早期农业生产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龙泉山以东至华蓥山之间为川中丘陵区,丘陵海拔一般约在 350—450 米之间,相对高度仅有几十米。地表在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及其支流的切割下形成了台阶状的丘陵,丘陵的坡脚和丘陵之间的河谷阶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一般土层较厚,肥力较好,土质酥脆,结构良好,是一种比较肥沃的土壤,比较适宜于农作物的种植。正因为如此,早期农业得以较早在这一地区形成和发展。

华蓥山以东为川东平行岭谷区,主要由 20 多条东北—西南走向的背斜山地和向斜谷地组成。背斜山地海拔多在 1000—1200 米,向斜谷地海拔一般不超过 200—300 米,宽度可达 10—30 公里。这些向斜谷地的地形为局部平原与低丘缓岗,是川东平行岭谷区农业发展和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域。^①

四川盆地河网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为早期生产的发展和古代巴蜀城市、国家、文明等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演进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地理环境。此外,四川盆地由周围

^① 任美镛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 3 版),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26—231 页。

的边缘山地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边缘山地有史前时期一方面相对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促使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中心在盆地内的形成。正如段渝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所分析指出:

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极有利的地理条件,为新的古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这样,这一地理单元内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①

3. 生产与经济的发展

有学者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不仅是人类可能的发源地,而且从植物资源的历史来看,地处西南地区的云南很可能是亚洲南部栽培水稻起源的中心。^②“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证明:巴蜀地区乃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③四川盆地地处我国西南,是史前农业较早得到发展的地区,从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来

①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童恩正:《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童恩正:《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

③ 林向:《巴蜀考古与三大起源问题》,《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

看,史前农业在这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宝墩文化的系列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的小型石斧、石铤、石凿为主,还有石刀、石铲、石杵、石锥、石镞和石矛等,此外,还发现了“锄形石器”等石器农耕工具。从中不难看出,经济生产当以农业为主,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兼营渔猎和采集。^① 这些已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手工工具,而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工具却发现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多为骨质和木质,不易保存到现在。木质工具在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生产中远比笨重的石器工具更为便利和适用。骨木质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加工应是手工工具大量存在的原因。^② 生产工具的制作特别是农耕生产工具的制作反映出四川盆地史前农业生产的发展。^③

除农业之外,史前时期四川盆地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宝墩文化遗址大量陶器残片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制陶业的发展水平。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明了制陶水平的提高,至此,制陶业发展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青铜器制造和玉器制造至商周时期已是这一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可得到确认。此外,酿酒业、金银制品业、漆器制造业等也有很大的发展,这从考古出土的文物可得到证实。成都市战国船棺墓群的发掘,其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

①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6—127 页。

② 王毅、江章华等:《中国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成都文物》1997 年第 2 期。

③ 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4—92 页。

漆器,说明最迟至战国时期,这里的漆器制造已经非常发达。^①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古代巴蜀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乃至其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人文地理环境,正是在农业、手工业等较早得以发展的地区,城市以及整个社会也率先获得了发展。然而,在四川盆地内部,早期农业和手工业等的发展也表现出地区的不平衡性,包括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区在内的川西地区,土壤肥沃,河流密布,适合发展农耕;而川东的平行岭谷区虽有丘陵和谷地,但谷地面积相对较小,与川西相比,农耕条件相对较差。与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相联系,川西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早于和快于川东地区,据蒙文通的研究,《尚书·禹贡》所载的梁州主要是指得到较早开发的川西地区,而对开发较晚的嘉陵江以东地区却未提及。^②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农业最早兴起和发展的地区,这里“在西周初年以后几乎已见不到以畜牧或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考古资料似乎还可把这种状态的年代大大上推;而川东农业至迟在西周中叶还处于十分粗放的形态,它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并且与射猎经济并行。”^③这种生产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到了古代巴蜀城市的起源、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日本〕阿普(ARP)有限会社2000年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朱章义:《从三星堆遗址看早期蜀文化的手工业》,《成都文物》1988年第4期;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92页。

②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形成和早期发展以及该地区社会整体历史发展的空间差异和分布特点。

4. 早期文化遗址的分布

城市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城市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总是发生在人类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地域,并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发生发展的区域总是人类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古代巴蜀城市的发生发展是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巴蜀地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密切相关,在地理空间上与文化发展的发达区域相一致。

四川盆地适宜的自然环境为早期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这里很早以来就有人类生存繁衍,并创造出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已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有3处:巫山人化石发现于重庆市巫山县,距今约201万—204万年,“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①“四川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②;资阳人化石发现于四川省资阳市,属于更新世晚期的晚期智人;筠连人化石发现于四川省筠连县,属更新世晚期的智人。此外,四川盆地还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属铜梁、鲤鱼桥和富林三种旧石器时代文化。铜梁文化最早发现于重庆市铜梁县,距今约 25450 ± 850 年(一说为距今 21500 ± 310 年),从出土的石器工具判断,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鲤鱼桥文化最早发现于四川省资阳市,距今年代为25100

① 林向:《巴蜀考古与三大起源问题》,《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

② 贾兰坡:《四川史前考古学的希望》,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400 年,发现石器工具以尖状器为主体,表明经济生活是狩猎和采集并重;富林文化首次发现于四川省汉源县,距今已有约 2 万年,石器以小石器为主体,石器工具以刮削器最多,其次是尖状器,反映出当时的经济活动以狩猎采集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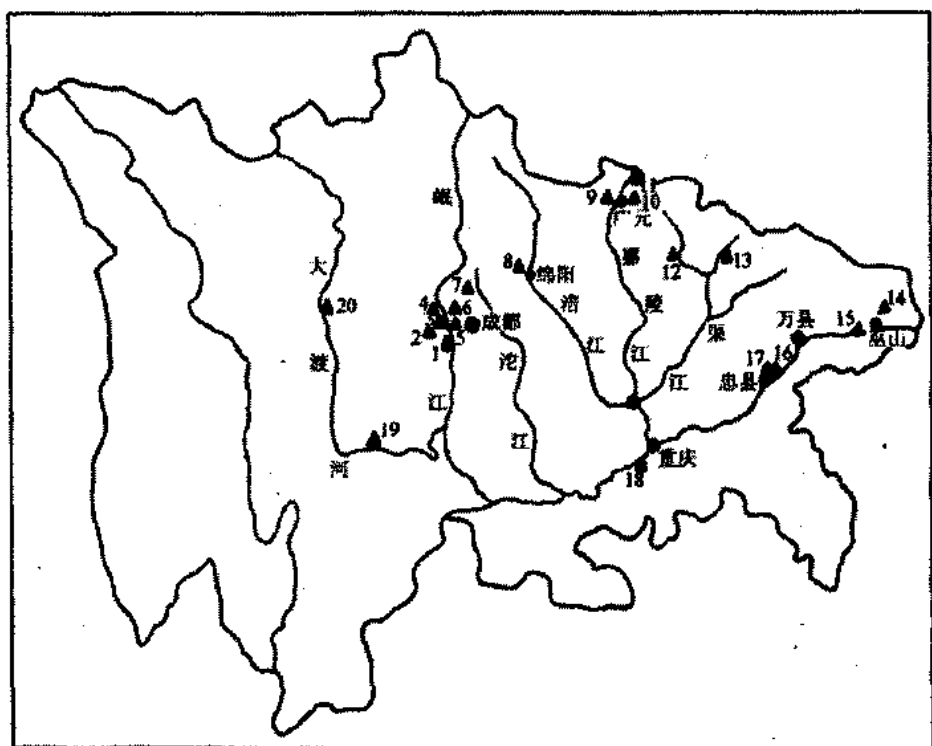


图 5—2 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1. 新津宝墩 2. 崇州紫竹村 3. 崇州双河村 4. 都江堰芒城村 5. 温江鱼凫村
6. 郫县古城村 7. 广汉三星堆 8. 绵阳边堆山 9. 广元张家坡 10. 广元邓家坪
11. 广元中子铺 12. 巴中月亮岩 13. 通江擂鼓寨 14. 巫山魏家梁子 15. 奉节老关庙
16. 忠县哨棚嘴 17. 忠县中坝 18. 江津王爷庙 19. 汉源狮子山 20. 丹巴罕坝依

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目前已有大量发现,数目已达

230 余处^①,而且不断增多的趋势。^②从遗址分布的地貌来看,主要分布于河流沿岸的河谷平原地带(图 5—2)。^③主要的遗址和文化有广元营盘梁细石器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巫山大溪遗址、忠县谿井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和宝墩文化遗址等。广元营盘梁细石器遗址可能属于细石器的制造场,出土有细石器及制品达万件,还发现有陶片,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特点,年代距今约六七千年或更早。绵阳边堆山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一定数量的陶器和骨制器,其经济生活为定居农业,并辅以狩猎,年代距今 4500—5000 年上下。巫山大溪遗址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石制、骨制和蚌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有一定发展,渔猎活动仍占重要位置,距今年代为 5300—6000 年。忠县谿井沟遗址发现有石器、陶器、人骨和兽骨,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渔猎仍占一定比重,年代上限略晚于巫山大溪遗址,而下限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西昌礼州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石器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居民生产以农耕为主体,年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以宝墩遗址的发现而命名,包括了新津宝墩、崇州紫竹村、崇州双河村、都江堰芒城村、

①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6 页。

② 仅在 2003 年当中,在成都平原的成都附近,在郫县红光镇八圣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乡村聚落,又在大邑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座史前古城: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成温邛高速惊醒“第七城”》,《成都日报》2003 年 1 月 16 日 B1 版;《4000 年前成都平原腹地就有人住》,《华西都市报》2003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数量会不断增加。

③ 见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一文,载宿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9—721 页。实际上,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不止于图中所列,这里标示的仅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代表。

温江鱼凫村、郫县古城村、三星堆一期、汉源狮子山等遗址,出土有磨制石器和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并发现有建筑遗迹,表明经济活动以定居农业为主,以渔猎活动为辅,距今年代约在 4500—3700 年间。^①

从已有的石器考古发现来看,四川盆地自远古以来就是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距今 8000 年以来,随着气候逐渐转向温暖湿润,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至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定居农耕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业已形成,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从而为古代巴蜀城市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土壤。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段渝:《四川通史》第 1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刘豫川、邹后曦:《重庆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载《巴渝文化》第 4 辑,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刘豫川:《从三峡库区文物考古成果看重庆地区史前和先秦历史的新轮廓》,载孟广涵主编:《历史科学与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六章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与 古蜀国城市的起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地区,考古工作者相继发现并确认了以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系列史前城址群,这些重要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文献中关于蜀人蜀国早期历史记载的欠缺,对于揭示蜀地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史前城址概况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大量文物的出土以及周围古城墙遗迹和建筑遗迹的相继勘明,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1995 年以来,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遗址的史前城址的不断发现,又把学术界的众多目光吸引到了这里。已发现并得到确认的史前城址有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紫竹古城。2003 年,又在成都附近的大邑县先后发现了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从而使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总数上升至 8 个。这些史前城址的发现和确认为探讨蜀地早期城市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物

资料。

1. 新津宝墩城址^①

宝墩遗址地处川西平原西南边缘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当地习称“龙马古城”,又传说为“孟获城”。遗址东北距西河约4公里,西南500米处有铁溪河从西北流向东南。1995年11月到12月,对遗址进行了专门调查、确认和试掘,并对真武观段城墙(东北墙东段)进行解剖发掘。1996年9月到12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就蚂蟥墩段城墙(东南墙的中段)做了解剖发掘。目前,通过已公布的资料可对宝墩城址有个大致的了解。

新津宝墩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方向45°,东北墙、东南墙北段和西北墙北段保存比较完整。城垣宽约600米,长约1000米,周长32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现存墙体最宽处约25米左右,最高处约有5米。通过对蚂蟥墩城墙的解剖得知:墙体残存顶宽3.15米,底宽8.4米,高1.85米。城墙建于高出当时周围地面约3米的台地边缘;构筑采用斜坡堆筑方法,即边堆土,边拍打或夯打,拍打分为斜面拍打和对每个大的层面的水平拍打两种;城垣周围未发现环壕。(见图6—1)

遗址中发现有宝墩时期房址1座、灰坑32个、墓葬5座。房址平面可能为方形或长方形,东西宽约4.10米,南北暴露长2.32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日本]阿普(ARP)有限会社200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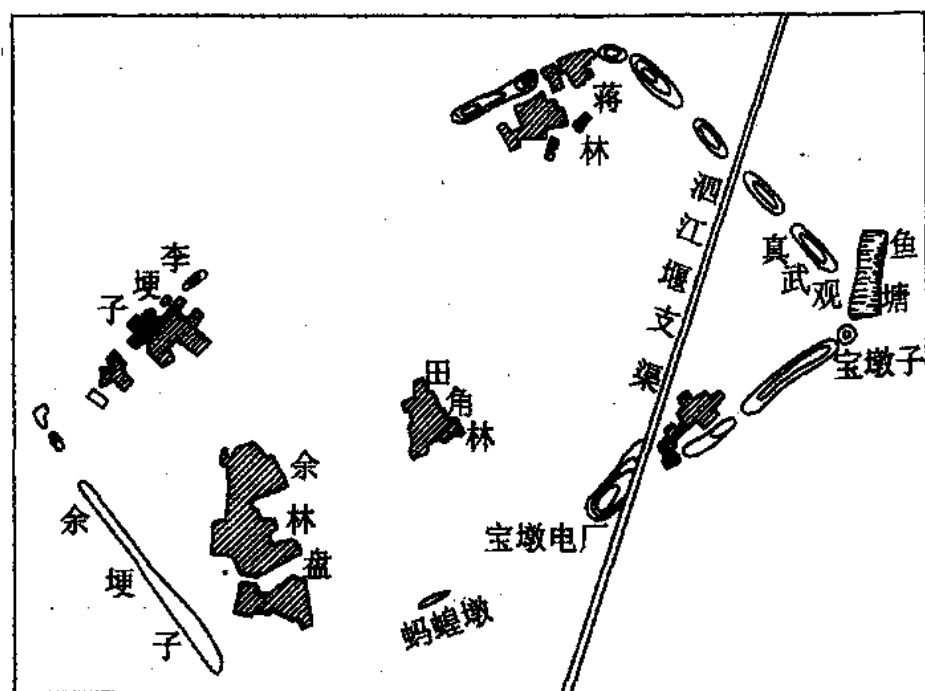


图 6—1 新津宝墩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 1996 年发掘简报》)

米,推测建造方式为“木骨泥墙”式,并经过烘烤。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石器和陶器等遗物。石器属小型磨制石器,制作较为精致,器物有斧、镑、凿、穿孔石刀和铲等,其中以斧、镑、凿的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此外出土了少量的矛、镞等,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陶器出土有纺轮、网坠等生产工具和罐、尊、豆、盆、壶等生活用具。

宝墩城址文化面貌独特,并且是同类遗址中面积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而此类考古文化被命名为“宝墩文化”。从宝墩遗址出土文物分析,宝墩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定居农业为主,辅以采集和渔猎。城墙的修筑“可能是由于当时竞争激烈,战争频繁

而导致了这一宏大工程的产生”。^① 城的废弃年代与遗址的废弃年代相一致,据碳素标本测定,宝墩遗址的年代上限当在距今4500年左右。

2. 郫县古城城址^②

郫县古城遗址位于郫县城北约9公里的三道堰镇古城村和梓路村,这里属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城址相传为三国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城址以北3.2公里处有青白江,其南2.5公里为柏条河。1996年11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小规模试掘;1997年10月至1998年1月,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对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发掘,对城墙和城内布局有了一定的了解;1998年10月至1999年1月,对古城遗址展开大面积的科学发掘,获得了重大进展。

郫县古城遗址城垣是同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除东垣北段有一缺口外,四周城垣相连几乎没有间断。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方向120°,长约620米,宽约490米,面积约30.4万平方米。其中北垣宽8—30米、高1—2.8米,西垣宽16—40米、高1.1—3.8米,南垣宽8—35米、高1—5米,东垣宽16—35米、高0.8—2.6米。东垣北段缺口宽约12.5米,经探沟发掘提供的情况

①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8—1999年度发掘收获》,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初步推测,此处应为城垣的城门处。城垣的外侧有壕沟,壕沟的宽度有待进一步勘探。墙体经过先后两次修筑而成,第一次建筑城墙的年代应在遗址的早期,第二次筑墙是对第一次墙体的再次增筑。城墙的构筑方法是斜坡堆筑,不见明显的夯筑痕迹。(见图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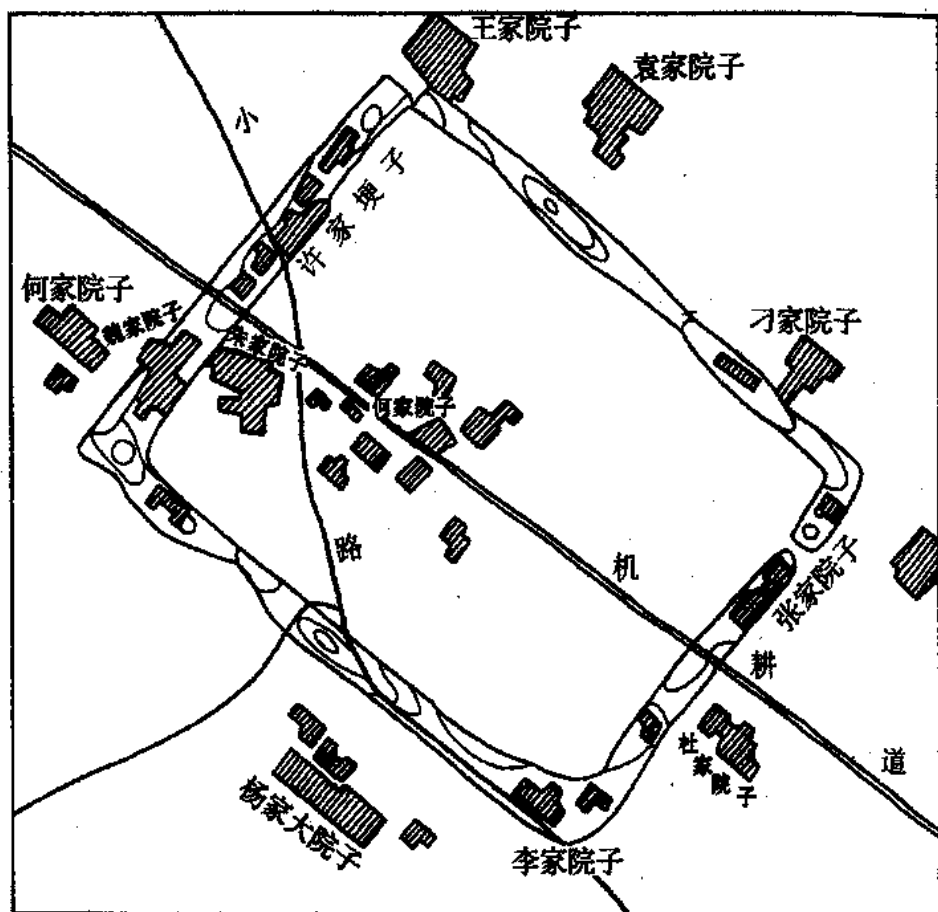


图6—2 郫县古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郫县古城遗址内出土有大量陶器和磨制石器,分属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有的器物如石矛等可能属于用于作战的兵器,此外还发现了1件通体磨制的玉器残块。经过三次试掘和发掘,在城垣

内共发现灰坑 35 个、灰沟 2 条、墓葬 1 座、房基 13 座。在这些房址中,发现有大型房屋建筑基址 F5。F5 位于遗址的中部,平面呈长方形,方向 131°,与城垣方向大体一致,长约 51.5 米、宽约 10.7 米,面积约为 551 平方米。该建筑的墙体推测为木柱夹竹笆,内外涂抹草泥形成。“F5 当不属一般的居址,可能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如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场所。”“F5 应建于遗址的早期,而废弃于遗址的晚期。”^①在城址的西北部,发现了干栏式建筑,这在宝墩文化时期尚属首次,意义重大。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对于古城城址内的平面布局可形成初步的认识,“即以位于城址中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F5)为中心,在其四周均分布有小型的木骨泥墙建筑或其他小型建筑,应为城址的居住区”。^②

郫县古城遗址的考古文化属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可初步分为四期,绝对年代在距今 4500—3700 年,郫县古城遗址为该文化的第三期遗存,其年代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

3. 温江鱼凫城址^③

温江鱼凫村遗址位于四川省温江县城北约 5.5 公里的万春镇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3 期。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 1998—1999 年度发掘收获》,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 年第 12 期;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8 年第 4 期;《温江县鱼凫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 年第 3 期。

鱼鳧村、直属村和报恩村三村,西南距离江安河约2公里,距离岷江7公里。遗址习称“鱼鳧城”,相传蜀人鱼鳧王曾于此建都。1964年曾对鱼鳧城遗址进行调查,当时城垣保存较为完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陆续对遗址做了一些调查。1996年10月至12月,对遗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予以试掘。1999年10月至2000年1月,对遗址展开第二次田野考古工作,进行了普遍钻探和重点发掘。

鱼鳧古城城址建于平原的台地之上,从台地边缘建筑城墙,城内地表明显高于城外。遗址现存不连续的低矮城垣,残存四段,城址平面为不规则多边形,面积初步推测为32万平方米。(见图6—3)后通过第二次的田野发掘,对城址的平面布局和规模又有了新的认识。重新发现了遗址的东垣,“鱼鳧古城整个城址复原平面形状为规则六边形,且两对边平行,总面积为40万平方米,在成都平原目前发现和确定的六个早期城址中面积位居第二。”^①城址北部发现有东西方向的低洼地带,宽约25米,应是古河道所留,河道的年代及其与城址的关系尚不清楚。现存的城垣一般高出地面约2米,宽度约15—20米。解剖处城垣高度不低于3.7米、顶部宽18.3—19.2米,底部宽28.6—29.0米,墙体建于高差1.3米左右的台地边缘。遗址墙体构筑方式为坡状堆筑,墙体中发现有大量卵石,应是为牢固墙体而用。

通过对鱼鳧古城遗址的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石器,清理出灰坑155个、房址14座、墓葬4座和灰沟6条。灰坑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垃圾坑、窑址和祭祀坑三种,祭祀坑分

^① 《温江县鱼鳧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布于城址的东南、靠近墙垣处。房址均为地面式建筑,可分为墙体是木骨或竹骨的墙基槽式和干栏式两种,干栏式房址的布局和建造方式与郫县古城 1998 年清理的同类建筑相似,推测为仓储式建筑的基础部分。根据遗址出土文物和出土地点的分析,城址东南部是当时人们活动的次中心,应为生活居住区;城址南部可能是墓地和废弃物的堆放地;城址的中心地区(鱼鳧村地界)和现存的东部边缘地点,应是人们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鱼鳧古城有可能延续使用时期长,人口也较多,是当时成都平原人们聚居活动的中心之一。”^①

温江鱼鳧古城遗址的文化可分为三期。一期文化遗存是遗址中最早的文化,早于城垣的兴建;二期文化遗存大致与城垣的兴修、废弃的时间相当。一、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宝墩遗址相当或略有早晚,时间范围在龙山时代前段(前 2550—前 2250 年);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晚于三星堆遗址的一期而早于三星堆遗址的二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末期至夏代初期(前 2050—前 1750 年)。

4. 都江堰芒城城址^②

都江堰芒城遗址位于都江堰市市区南约 12 公里的青城乡芒城村,地处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西距青城山支脉的药王山 2.4 公里,东距由北向南流去的泊江河约 1.4 公里,海拔高度 675 米。

^① 《温江县鱼鳧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 年第 7 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8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9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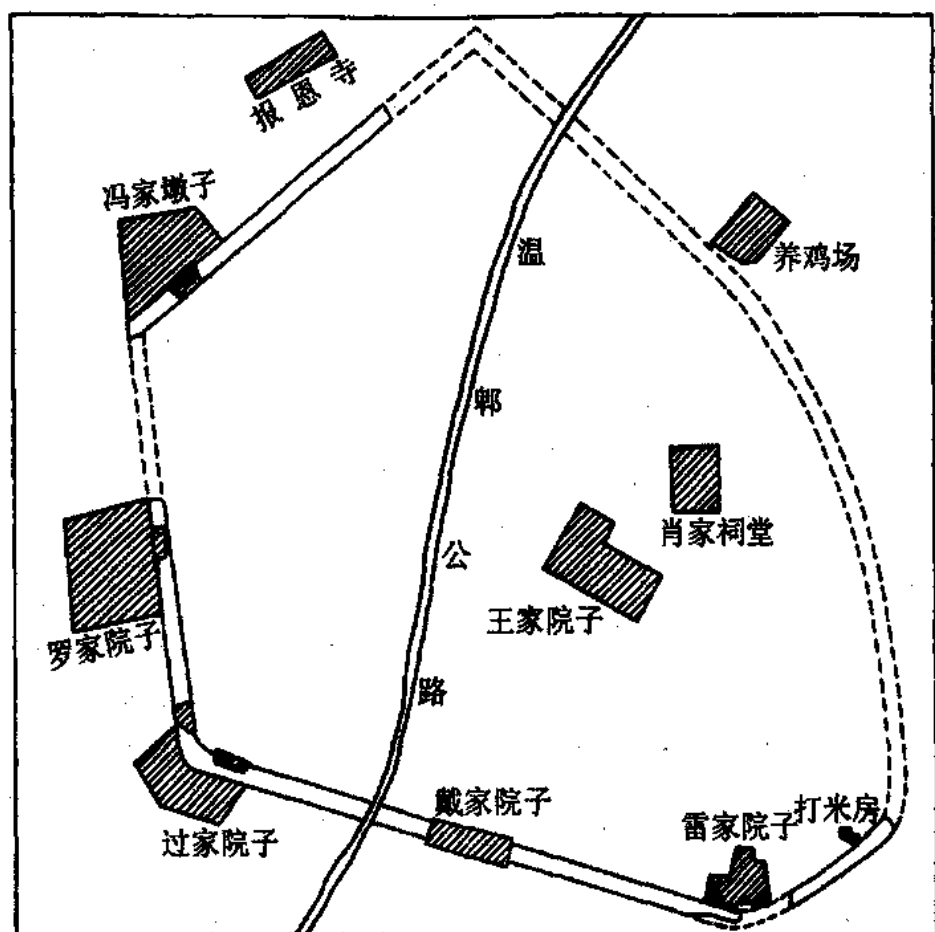


图6—3 温江鱼凫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1989年和1990年曾两次对遗址进行调查,但收获不大。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对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两次进行试掘。1998年至2000年,对芒城遗址连续三年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到目前为止,对遗址状况和文化面貌已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芒城遗址又称“芒城子”,相传为明末张献忠在匆忙中所建。

遗址现存明显城垣,形状为较规则长方形,方向 10° ,基本与泊江河平行。城垣分内外两圈,内圈保存较为完整,仅东垣遭到破坏;外圈城垣仅有南垣和北垣保存较好,另外两垣已不可见。内圈城址长约300米,宽约240米,面积7.2万平方米;现存西垣长约270米,北垣185米,南垣210米,残宽5—20米,高1—2.2米。外圈城址推测宽约300米,南北长350米,整个城址面积约10.5万平方米;现存北垣长180米,南垣130米,宽约7—15米,高约1—2.5米。内外城垣间距20米,为一人工形成的壕沟;此外,在外城垣的外面也有人为壕沟存在。(见图6—4)城墙的建筑方法是斜坡堆筑,但具有显著特点:作为内城墙主体的墙心部分修筑得特别好,夯层显著可见;内城墙的外皮和外城墙基本用小卵石堆筑,但较为松散,与其他城址墙心堆筑松散而外皮堆筑紧密形成对比。发掘表明,内外城墙和内外壕沟是一系统工程,即“挖壕取土筑墙”。内城墙曾经两次兴建,一期内城墙和整个外城墙修筑年代在遗址的早期末,内外壕沟的形成年代与之同时;二期内城墙的兴建年代在遗址的晚期末,取土来源于内城壕和内城墙内的地面;城墙的废弃年代与遗址的废弃年代相一致。通过对墙体的解剖,可见外城墙顶宽6米、底宽12.5米、高2米,一期内城墙顶宽7米、底宽10米、高1.45米,二期内城墙顶宽10米、底宽19米、高2米,内壕沟口宽24米、底宽16米、深2.4米,外壕沟口宽17米、底宽9米、深2.5米。^①

遗址出土文物有大量陶器和石器,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并有

^①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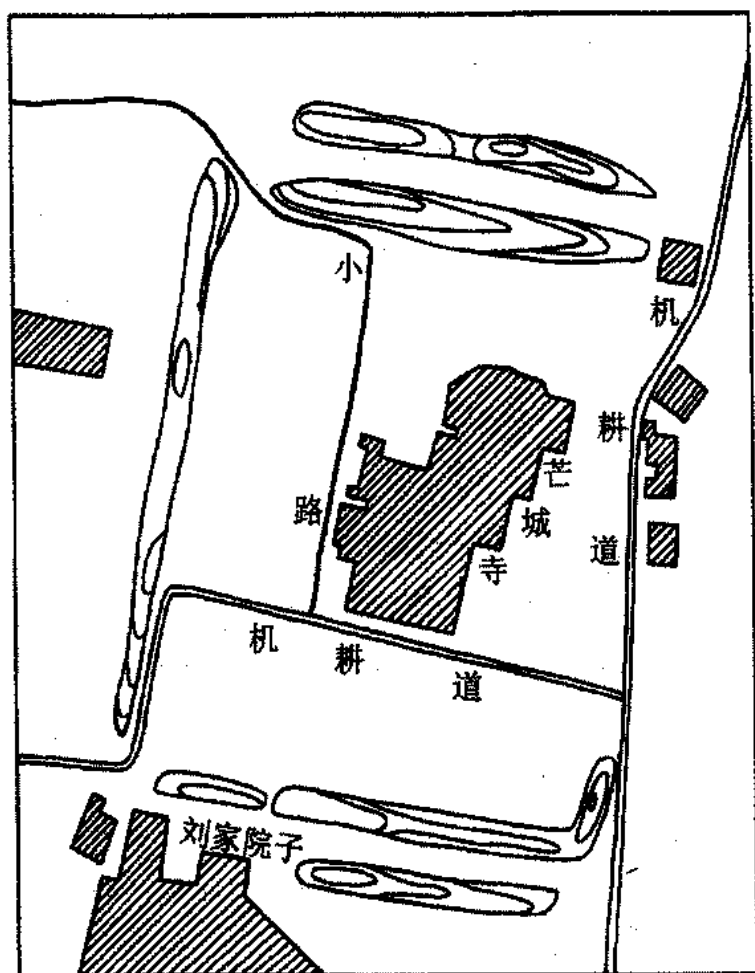


图 6—4 都江堰芒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江章华、王毅、张肇:《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少量陶器,石器工具的器形有斧、斨、凿、镞、钺、矛等;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分夹砂陶和泥制陶两大类。遗迹发现较多,有灰坑、灰沟、房址等。房屋是木骨泥墙建筑,方法是先挖墙的基槽,槽内埋上木骨,再内外抹泥,并经火烤成墙。此外,还发现一座竹骨泥墙房址,首次证实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竹骨泥墙的存在。在遗址晚期的灰坑中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从而可说明成都平原在

龙山时代已种植水稻。

都江堰芒城遗址考古文化与宝墩遗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宝墩文化可分为四期,绝对年代在距今约 4700—3800 年之间,芒城遗址为宝墩文化的第二期遗存,绝对年代在距今约 4500—4300 年之间。芒城遗址的文化本身又存在着早晚两个时期:在城墙修建之前已有聚落存在,为遗址文化的早期;一期城墙修筑后形成的文化堆积为遗址文化的晚期。^①

5. 崇州双河城址^②

崇州双河遗址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城关北 16 公里的上元乡芒城村,地处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海拔 586—595 米,西南距离西河 5 公里,东北距离 10 公里是岷江,味江支流螃蟹河从西边流过。遗址所在芒城村因原有“芒城寺”而得名,当地称遗址为“下芒城”,以与都江堰“上芒城”相区别,为方便起见,用所在上元乡旧称双河场命名遗址,故称双河遗址。遗址在 1996 年春调查时发现,1997 年 10 月至 11 月对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钻探并进行了试掘。

双河遗址城址平面大致为长方形,北、东、南三面有双圈城垣,内外城垣间是壕沟,西面没有城垣,可能以西侧河流作为天然屏

①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8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9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11 期;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 年第 3 期;江章华、王毅、张攀:《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9—7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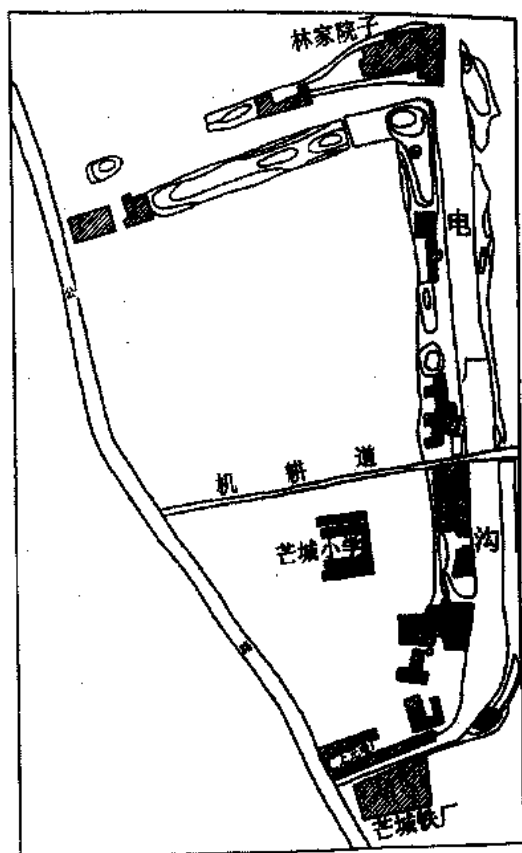


图6—5 崇州双河古城城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障,当时未修城垣,也可能西面城垣由于河流改道而被冲毁,遗址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双河遗址现存有大体连续的城垣,其中东面内外城垣保存最为完整。(见图6—5)现存的北面城垣,外垣长325米、内垣长270米、壕沟宽15—20米;在东面,外垣长500米、内垣420米、壕沟宽20米;在南面,外垣长120米、内垣110米、壕沟宽15—20米,现存城垣一般高出地面2—3米,顶宽18—30米。双河遗址城垣的兴建年代与其城垣内的文化遗存当属同一个大的时期。

遗址内出土文物较为丰富,多数为陶器,石器数量相对较少。值得提到的是遗址中发现了三孔石钺,这种具有早期礼器性质的器物在成都平原的同期遗址中的发现尚属首次,“此器选料精细,石质上乘,做工精致,造型特殊,是探索本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试掘中发现有灰坑、房址和卵石遗迹,房址 F1 南北宽 8.3 米、东西长 8.5 米、面积达 70 多平方米,现存柱洞 14 个,构成“十”字形布局,柱洞底部、中部垫有或夹杂卵石。“该建筑有可能是当时一种等级较高的活动场所。或许这一区域附近就是当时的一个中心区域,应建有与高大的城垣及精美的陶、石器相符的等级较高的建筑设施。”^①

双河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大致分成前后两期,但两期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应是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崇州双河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宝墩等史前遗址较为接近,在考古学上应属宝墩文化的范围,可初步推论其年代在距今约 4500—4000 年。

6. 崇州紫竹城址^②

紫竹村遗址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区西南约 2.5 公里处的隆兴镇紫竹村,地处川西平原的西部边缘,东面距离西河约 2 公里。1997 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其进行调查时发现确认,目前尚未进行正式发掘。紫竹遗址现存城址平面呈方形,分内外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11 期。

②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宿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9—721 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日本]阿普(ARP)有限会社 2000 年版,第 99—121 页。

双重城垣，内圈城垣边长约 400 多米，城垣宽度 5—25 米，高 1—2 米；外部城垣现已破坏严重，现存墙体宽 3—10 米，高 1—2 米；内外城垣相距 10—15 米，整个城址面积有 20 多万平方米。仅从已经采集到的陶片来看，紫竹遗址文化面貌与宝墩遗址文化较为相似。

7. 大邑盐店城址和高山城址^①

盐店古城遗址发现于 2002 年底，是为了配合公路建设而被迫进行发掘的，目前有关遗址的正式资料尚未公布，仅可从相关报道加以了解。盐店遗址位于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的盐店村，地处川西平原的西部，距离南河支流斜江河西南岸仅 1000 米。遗址现存断断续续城垣，经勘探发掘，可以确定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700 多米，东西宽约 500 米，总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规模较大，城址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其护城河保存至今。从城垣剖面来看，墙体构筑采用斜坡堆筑的方式。遗址中发现有石斧、石刀等石器和大量陶器残片，从中可以看出盐店遗址属于宝墩文化中年代偏早的史前古城，距今年代约在 4300 年左右。“这一古城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中心，它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以及史前成都平原的经济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②

在 2003 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又有新的发现，在四川省大邑县发现了高山古城，这是成都平原发现的第八座史前城址，具

① 《成温邛高速惊醒“第七城”》，《成都日报》2003 年 1 月 16 日 B1 版；《郫县红光镇八圣村发现的远古乡村聚落遗址证明：4000 年前成都平原腹地就有人住》，《华西都市报》2003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② 《成温邛高速惊醒“第七城”》，《成都日报》2003 年 1 月 16 日 B1 版。

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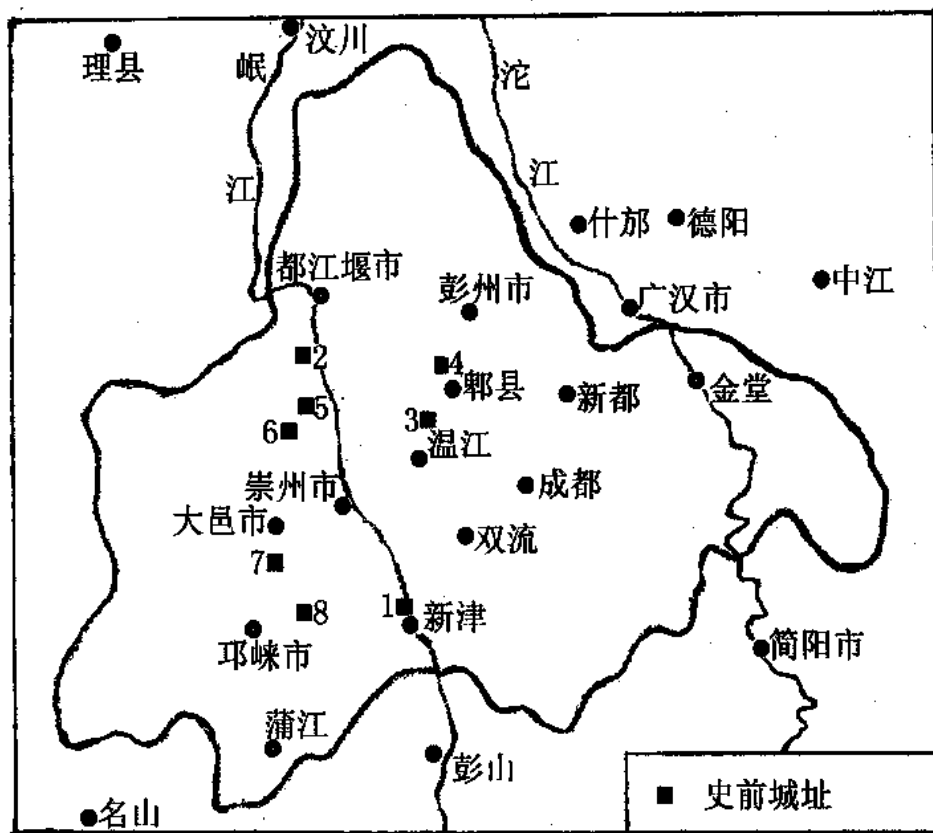


图 6—6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分布示意图

1. 新津宝墩城址 2. 都江堰芒城城址 3. 温江鱼凫城址 4. 郫县古城城址
5. 崇州双河城址 6. 崇州紫竹城址 7. 大邑盐店城址 8. 大邑高山城址

8. 小结

1995 年以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一系列的史前城址,到目前为止,数目已达 8 个,而且数量有可能继续增加,这些城址是四

^① 《郫县红光镇八圣村发现的远古乡村聚落遗址证明:4000 年前成都平原腹心就有人住》,《华西都市报》2003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川盆地已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史前城址。从考古发现来看,各个城址及其文化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更多地表现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有必要加以总结。(见表6—1)

表6—1 考古发现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状况表

城址名	新津宝墩城址	郫县古城址	温江鱼凫城址	都江堰芒城址	崇州双河城址	崇州紫竹城址	大邑盐店城址	大邑高山城址
所在地	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	郫县古城、梓潼村和梓桐村	温江县万春镇直隶村等三村	都江堰市青城山芒城村	崇州市上元乡芒城村	崇州市隆兴镇紫竹村	大邑县晋原镇盐店村	大邑县
所处地貌	平原临河台地	平原临河台地	平原临河台地	临河山地浅丘	平原边缘临河区域	平原边缘临河区域	平原、临河	
城垣形状	西北—东南向长方形	西北—东南向长方形	规则六边形,对边平行	内外两个较规则长方形	内外两个不规则长方形	平面呈内方外形	平面呈长方形	
城址规模	南北1000米、东西600米,面积60万平方米	长620米、宽490米,面积30.4万平方米,发现城门,城外有壕沟	总面积40万平方米	外城长350米、宽300米;内城长300米、宽240米,有内外壕沟	面积约11万平方米,内外城垣之间为壕沟	内垣边长约400多米,整体面积20多万平方米	南北700多米、东西宽5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有护城河	
筑城手段	坡状堆筑	坡状堆筑	坡状堆筑	坡状堆筑			坡状堆筑	

城址名	新津宝墩城址	郫县古城址	温江鱼凫城址	都江堰芒城址	崇州双河城址	崇州紫竹城址	大邑盐店城址	大邑高山城址
墙体情况	现存最宽处约25米、最高处约5米	现存最宽处约40米、最高处约5米	现存宽度15—20米、高出地面约2米	现存最宽处约20米、最高处约2.5米	现存高出地面2—3米,顶宽18—30米	现存墙体宽5—25米、高1—2米		
城内遗迹文物	房址、灰坑、墓葬、陶器、石器	灰坑、墓葬、房址(包括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石器、陶器、玉器	灰坑(包括祭祀坑、窑址)、房址、墓葬、灰沟、陶器、石器	灰坑、灰沟、房址(有竹骨泥墙)、水稻硅酸体、陶器、石器	灰坑、房址(高级建筑)、卵石遗迹、陶器、石器(三孔石钺,礼器)	陶片	陶片和石器等生产生活用具	
考古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时期
距今年代	距今4500年左右	距今4000年左右	距今约4000年	距今4500—4300年	距今4500—4000年	与宝墩遗址接近	距今约4300年	
发现时间	1995年11月	1996年11月	1996年10月	1996年11月	1997年10月	1997年秋	2002年12月	2003年
资料出处	《考古》97.1、98.1;《宝墩遗址》	《文物》99.1、01.3;《成都考古发现1999》	《文物》98.12《成都考古发现1999》	《考古》99.7、《成都考古发现1999》	《考古》02.11	《宝墩遗址》	《成都日报》2003年1月16日	《华西都市报》2003年6月1日
备注						未发掘	未公布	未公布

从整个四川盆地的地形来看,宝墩遗址等史前城址在成都平原的发现反映出城址与所处地形的密切关系。已发现的新津宝墩城址、郫县古城城址、温江鱼凫城址、都江堰芒城城址、崇州双河城址和紫竹城址、大邑盐店城址和高山城址都处于成都平原范围之内。(见图6-6)在微观地形上可以看出,成都平原史前时期城的建造对自然地形做了充分的考虑和选择。有学者依据城邑所处的地形不同,将中国史前城址分为四类:缓岗类、台地类、山城类和水城类。^①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基本属于台地类型,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山地浅丘型和平原台地型两种。处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浅丘地带的城址,一般海拔较高、面积较小,芒城海拔658米、面积仅10余万平方米,是诸多城址中海拔最高、面积最小者。双河古城海拔580米、面积11万平方米,也是诸城中海拔较高、面积较小者。处于平原台地的城址一般海拔较低、面积较大,宝墩城址海拔472—474米,面积60万平方米,是诸多城址中海拔最低、面积最大者。鱼凫城址海拔556—560米,面积40万平方米,也是城址中海拔较低、面积较大者。“因为海拔高,山地、浅丘陵的地形从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古代人类的建城规模,而海拔低者位于平原地带,地势开阔,地形平坦,具备了建大城址的客观条件。”^②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河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期城市的建立与发展更是对于河流有极大的依赖性。史前城址一般都选择在河流附近甚至紧挨河流,这主要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靠近河流便于生活用水(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靠近河流除了

①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

考虑生活用水外,更多的是要考虑城市及其周围的生产用水);二是靠近河流便于交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河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交通途径;三是河流可以起到一定的天然的军事防御作用,有的城市建于河流岸边,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一般都建在了靠近河流的地方:宝墩遗址距离西河4公里、距离铁西河仅500米;郫县古城距离青白江3.2公里、距离柏条河2.5公里;鱼凫城址距离江安河有2公里;芒城城址距离泊江河约1.4公里;双河城址距离西河5公里;紫竹城址距离西河仅2公里;盐店城址距离南河支流斜江河仅1公里。这些史前古城选建在靠近河流的区域,主要反映出蜀地先民对于方便生活用水的考虑。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平面形状表现出城址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的特点。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有单圈和双圈两种:宝墩、古城、鱼凫、盐店等城址为单圈城垣,芒城、双河、紫竹等城址为双圈城垣。城址平面多为长方形,只有温江鱼凫城址为规则的六边形。城址走向大体与临近的河流走向相一致,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等城址中发现有壕沟存在,大邑盐店城址据报道可能有护城河存在。就目前对城址墙体所做的解剖分析,构筑方法都采用的是斜坡堆筑,只有都江堰芒城的墙体建造表现出显著特点,即作为内城墙主体的墙心部分修筑得特别好,而内城墙的外皮和外城墙基本用小卵石堆筑,较为松散,从而与其他城址墙心堆筑松散而外皮堆筑紧密形成对比。^①

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陶器和磨制石器

①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等生产生活用具,此外,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了玉器,崇州双河城址中出土有三孔石钺,这些器物可能属于早期的礼器,反映出该地社会发展到了了一定的水平:文明正在孕育形成。这些城址中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房址等遗迹以及卵石遗迹。其中有祭祀坑,窑址在温江鱼凫城址中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有可能是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在郫县古城和崇州双河城址中发现,房体建筑一般采用木骨泥墙构筑,都江堰芒城的房址采用了竹骨泥墙的方式建造,这些建筑特别是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表明成都平原史前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芒城遗址晚期的灰坑中还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的存在,可以说明成都平原在龙山时代已种植水稻,表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遗存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宝墩文化遗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于广汉月亮湾^①,当时曾被归入以绵阳边堆山遗址命名的“边堆山文化”的范围^②,1995 年以来,随着新津宝墩等遗址的发掘,遂以典型遗址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学者们推定在距今 4500—3700 年间,前后有 800 年左右,可具体细分为四期七段:宝墩遗址可作为文化的第一期,分早、晚两个阶段;芒城遗址文化面貌单纯,无法再分阶段,可作为文化的第二期;鱼凫遗址早、中段与郫县古城整体面貌较为一致,可作为文化的第三期;鱼凫遗址晚段可作为文化的第四期;其中郫县古城遗址分早、晚两段,早段与鱼凫早段一致,晚

①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 5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90 年第 4 期;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 5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段早于鱼鳧遗址晚段而晚于鱼鳧遗址中段。^①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研究来看,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与其遗址文化具有明显的共性,各城址的距今年代也基本接近或表现出前后继承的关系,其年代在距今4500年以前。

成都平原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的发现,对于揭示四川盆地史前社会的发展、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以及四川盆地早期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址的相关考古工作开展得还十分有限,有的尚未进行正式发掘,有的发掘工作刚刚开始,有的尚需做大规模的发掘,城址的许多问题如城址与周围聚落的关系、城址内的布局与功能分区等等,至今尚不清楚,从而制约了人们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的进一步认识。

二 古蜀国城市的起源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相继发现及其考古工作的进展为揭示四川盆地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可能,下面仅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蜀地城市的起源做一初步的探讨。

1. 蚕丛与柏灌时代

“蚕丛及鱼鳧,开国何茫然。”^②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中曾慨叹古蜀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古蜀国的历史源头虽已

^①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难以确知,但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中,我们仍可窥见其悠久历史之一斑。犹如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样,蚕丛是可知的古蜀族的早期先祖。关于蚕丛,最早见之于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其书已佚,然可从后书对其引录中见其大概。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案:《文选·蜀都赋》刘注引下有“蒲泽”二字)、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蜀都赋》刘注,《魏都赋》刘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御览》一百六十六。案:《御览》引作“凡四万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案:《初学记》八,《艺文类聚》六,《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作“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御览》一百六十六,又九百一十三)。①

《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②

关于古蜀族的先祖,文献记载较少且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蚕丛是古蜀族的始祖。蚕丛与蜀族的关系可从“蜀”字的本义上有所反映。蚕丛(包括其后的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应是一个氏族或部族或家族的称号,而不是专指某一个具

① (汉)扬雄著,马怡整理:《蜀王本纪》,载孙家洲主编:《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体的人^①,这一群体当是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内容。关于“蜀”字,许慎《说文·目部》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有学者据此认为“蜀”就是蚕,蜀国的得名与其最初养蚕相关。然而蜀与蚕并不是同一生物,《韩非子》卷八《说林下》说:“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淮南子》卷17《说林训》:“今鱣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鱣与蚕,畏蛇与蠋。”^②鱣即鱣,蠋即蜀,鱣似蛇而非蛇,蚕似蜀而非蜀,鱣、蚕人见爱之,蛇、蜀人见惧之,很显然,蜀不是蚕,是一种外形像蚕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虫。在甲骨文中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等卜辞^③,证明了蜀的历史存在,但“蜀”与“蚕”二字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学者提出“以蚕释蜀是没有根据的”。^④实际上,“蜀”的称谓是中原统治者对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蚕丛族的一种贱称,正如学者所指出:“商代的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则可能是一种贱称。”^⑤中原统治者之所以以蜀称呼蚕丛一族,当是因为蚕丛族以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个擅长养蚕的民族,故以似蚕的毒虫蜀贬称之。段玉裁

① 刘琳认为:“蚕丛至杜宇疑亦应为氏族名。”(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84页注。)李学勤认为:“蜀王名号原与中原不同,如开明传若干世,都沿称开明,这是一种称号,不是个人的私名。所谓蚕丛、柏灌(灌,字形相似,秦汉文字中常互误)、鱼凫各数百年,神化不是,也可能是沿用的称号。”“‘望帝积百余岁’,看来也是一种称号。”(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07页)

②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殷墟书契前编》8.3.8;《殷墟书契后编》2.27.7;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④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⑤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在《说文·目部》的注文中写道：“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蜎蜎，蠋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正因为“蜀似蚕”，才有以蜀贱称长于养蚕的蚕丛民族的发生，蚕丛与“蜀”的称谓在此统一了起来。

蚕丛作为蜀族的始祖最早活动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置有蚕陵县，应为蚕丛之故地，据考证，蚕陵故城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南界的叠溪。^①在岷江上游，有不少遗迹传说与蚕丛有关。《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在叠溪之西有蚕陵山。清代陈登龙撰《蜀水考》记载：“（岷江）又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②灌县西有蚕崖关、蚕崖石。《蜀中名胜记》卷六记载：“《方輿胜览》云：‘蚕崖关在导江县西五十里，以振西山之走集。’《外史》云：‘关去县廿里，实汶川地，有巨石高丈余，峙山之麓，土人云：此蚕崖石也。关以此得名。’”^③这些记载和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蚕丛一族曾在此区域的社会生活。

蚕丛究竟距今有多远，蚕丛时代究竟在什么时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做了各种推测和猜想。李白诗中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提出蚕丛距其所生活的唐代已有48000年，这当然只是一种艺术夸张的表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文选·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云：“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这一说法也不可信。《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载：“自

① 任乃强：《蚕丛考》，载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清）陈登龙：《蜀水考》，巴蜀书社1985年版。

③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万岁。”又载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这一说法倒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性。结合文献中关于嫫祖、西陵氏、蜀山氏的记载以及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可大致推定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属同一时期。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雷祖：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肠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颡项。

《世本》中云：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雷祖，产青阳及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颡项。

《大戴礼记·帝系》提到了西陵氏、蜀山氏：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曰昌濮氏，产颡项。

《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泝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颡项也。

《华阳国志·蜀志》在记述蜀国远古历史时写道：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圉。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妻，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这是我们从这些文献记载中获得的信息，由此学者得出“‘蜀山

氏’、‘西陵氏’与黄帝同时,并已通婚,是可靠的”。^①虽然尚无法证实文献记载的完全真实性,但黄帝时代,有西陵氏、蜀山氏已经存在应是可信的。西陵氏当活动于川西北一带(至少活动范围在今四川盆地之内^②),嫫祖是西陵氏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养蚕治丝的发明人,有学者进而根据民间传说和相关文献推定嫫祖(又作雷祖、累祖)诞生于今四川省的盐亭县。^③从嫫祖长于养蚕治丝及其活动区域来看,当与蚕丛属于同一部族,他们都是传说中的蜀人的先祖,当属于同一时期即与黄帝属同一时代。正如任乃强先生所分析:“黄帝娶西陵氏女曰嫫祖,始教中原人民养蚕,‘西陵’盖即蚕陵国也。”^④

从昌意降居若水并娶蜀山氏的记载来看,蜀山氏活动于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流域。若水为今天的雅砻江,发源于今四川石渠县,流经四川西部甘孜、新龙、雅江、木里、九龙、盐源等县后入金沙江。^⑤蜀山的位置当在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蜀山指“蜀山氏所居岷江左右之山”。^⑥结合关于西陵氏之女嫫祖的记载,西陵氏、蜀山氏与蚕丛一族可能属于同一部族,蜀人先祖蚕丛族生活的历史时期即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从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城址应是古蜀国鱼凫王

①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② 向熹:《嫫祖杂说》,《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杨正苞:《关于嫫祖文化的思考》,《文史杂志》2002年第2期。

③ 王德奎、赵均中主编:《人文初祖黄帝元妃养蚕治丝发明家嫫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注。

⑤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⑥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朝时期都城的历史遗迹(后面章节有专门论述,此不展开)。距今年代早于三星堆城址而文化与三星堆具有一定差异的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的系列史前城址(三星堆文化对宝墩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应是早于鱼凫王朝的柏灌时代的历史遗存。宝墩文化史前城址中最早的距今已有4500年,由此上推,蜀人的蚕丛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同期也是完全可能的。

蚕丛之后为古蜀国的柏灌时代。关于柏灌,历史记载极少且有出入,但皆本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引作“柏灌”,《文选·蜀都赋》注引为“柏灌”,《艺文类聚》又引作“伯雍”,但都记为蚕丛之后、鱼凫之前蜀人的又一统治者,其经历数百岁,应为蜀人的又一部族而非个人,柏灌时代自然处于鱼凫王朝和蚕丛时代之间。“三星堆文化第1、2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而第2期与第3、4期一脉相承,为鱼凫氏统治时期的文化。据此,如以史籍所记三代顺序,则有可能第1期包含有柏灌的文化遗存。”^①三星堆一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是蜀人柏灌时代的历史文化。

2. 宝墩文化城址与城市起源

近年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墩遗址等8座史前城址,其遗存皆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从这些遗迹和出土物来看,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以来已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与此同时,城市也处于起源过程当中。

宝墩文化史前城址中发现有大型房址,很可能是礼仪性建筑。郫县古城遗址的大型建筑F5位于遗址的中部,平面为长方形,长

^①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约 51.5 米、宽约 10.7 米,面积约为 551 平方米。“F5 当不属一般的居址,可能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如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场所。”^①崇州双河遗址中发现的房址 F1,南北宽 8.3 米、东西长 8.5 米、面积达 70 多平方米,现存柱洞 14 个,构成“十”字形布局。“该建筑有可能是当时一种等级较高的活动场所。或许这一区域附近就是当时的一个中心区域,应建有与高大的城垣及精美的陶、石器相符的等级较高的建筑设施。”^②随着对这些城址的进一步发掘,大型建筑基址可能不断会有新的发现。这些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反映出成都平原史前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中,还出土有一些礼器。郫县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用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陶器和磨制石器,此外还发现 1 件通体磨制的玉器残块,这件玉器很可能属于一件极为珍贵的礼器。崇州双河城址中发现了三孔石钺,也应属于一种礼器,“此器选料精细,石质上乘,做工精致,造型特殊,是探索本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③目前,成都平原这批史前城址的考古工作开展得还极其有限,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礼器的出土可能会有所增加。礼器的出土,折射出这一时期该地区社会的进步。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气候湿润,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历史悠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3 期。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11 期。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11 期。

久。从宝墩等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当时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体,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在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的存在,证明成都平原至迟在这一时期已开始种植水稻。^① 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结合城址中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和礼器的出土,我们有理由推定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发展正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有学者认为,这时的成都平原已经建立起了早期国家——可能是酋邦制国家。^② “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共存形成的古城群,则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③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不仅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说明四川盆地蜀地社会正处在国家和文明的起源过程中;而且说明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同时,蜀地城市也正处于起源阶段。从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来看,面积最大者宝墩城址达60万平方米,城址平面形状有方形和多边形,都江堰芒城城址、崇州双河城址和紫竹城址的城垣为内外圈双层,除外圈城垣外有壕沟外,内、外城垣之间也有壕沟存在,郫县古城城垣外也发现了壕沟。这些城垣的存在尤其是双圈城垣和壕沟的存在,更加说明这些城邑的主要功能是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也可能具有重要的宗教功能,这一点尚需考古发现的材料证

①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工作简报》,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

③ 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

明)。历史上有些城墙曾承担着防洪的功能(如历史上武汉和太原城市的城墙)^①,然而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城垣的结构来看,其主要功能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防洪功能^②,而应是军事功能或宗教功能。中国城市在起源过程中也大多如此,“‘五帝’时代出现了城堡建筑物,这是城市的原始形态,它以政治、军事和宗教功能占主导地位。”^③长方形或方形城垣结构的出现,“其中既隐含着防御体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还隐含着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要变革”。“龙山时代以前,史前城址的发生发展似乎主要体现着史前战争的加剧,而龙山时代城址的发展则似更多地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重大变化。”^④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在成都平原的出现,是蜀地在农业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政治变革引起的战争加剧的反映,出于不断需要加强与保卫政权及宗教组织的军事需要,拥有高大城垣和巨大壕沟的城邑开始形成,这些城邑就是萌芽阶段的城市,标志着真正城市正在起源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出在都市和村落之间还有一个似都(城)聚落的概念^⑤,主张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起码应是似都聚落,很可能属于早期都市。^⑥不管怎样,成都平原的

① 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2页。

② 刘兴诗:《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③ 贺云翱:《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④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⑤ 王妙发:《略论似城聚落》,《地理科学》1992年第1期。

⑥ 王妙发:《论长江流域早期都市》,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

史前城址群已经不同于一般的乡村聚落,它虽然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已处在向真正城市迈进的城市起源过程之中。

此外,从三星堆城址来看,其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已经出现。那么由此上推,在其之前且时间上具有前后衔接、空间上处于同一区域的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它们的社会发展至少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城市发展至少处在早期的起源过程当中。

三星堆城址属于鱼凫王朝时期,对照文献记载的三代蜀王的顺序,可初步推定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时代应为柏灌时期。这一时期是蜀地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时期,蜀地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新的发展阶段正在到来。

第七章 三星堆城址与鱼凫王朝的国都

三星堆遗址自 1929 年发现以来,曾多次进行过调查、试掘和发掘,特别是 1986 年以来,随着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和随后进行的考古工作,使三星堆遗址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古蜀国的社会文明开始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三星堆城址的确定及其相关考古发掘的开展,为我们揭示古蜀国城市的早期发展乃至中国早期城市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三星堆遗址及其社会性质

三星堆遗址发现至今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正式发掘工作也已开展了 20 多年,而且发掘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收获已极为显著。整理和分析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已有资料,对于进一步弄清古蜀国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特别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社会历史、社会性质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1. 遗址概况^①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区以西约8公里的南兴镇的三星村周围,南距成都市40公里,这里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土壤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湿润,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29年这里就发现了玉石器坑,此后在1934、1956、1958、1963、1964年曾多次进行调查、清理和试掘,1980年以来开始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1986年相继发现发掘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而后又多次对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目前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至今为止,已经对三星堆的遗址范围、城址状况、城内布局、文化面貌等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认识古蜀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由数十个文化点构成的若干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所组成的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②,已发现有城垣遗迹、房屋建筑基址、祭祀坑、窑址、墓葬和灰坑等遗迹。其中,房屋建筑基址发现多处,已揭露出50多间。建筑呈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形状,以长方形和方形居多,面积在15—30平方米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断代、性质的再讨论》,《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之间,最大的一处房屋建筑进深8.7米,面宽23米,面积200平方米,并且数间相连,其功能超出一般居室,可能属于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房屋均属地面木构建筑,在地面开挖沟槽,槽中掘洞树立木柱,木柱间用竹木棍棒加以编织构成墙骨,两侧涂抹草泥形成墙体,并可能对墙体用火烘烤。祭祀坑在1986年先后发现发掘出两处,一、二号坑出土宗庙祭祀用器上千件,包括金、铜、玉、石、陶、骨、象牙等种类,代表了迄今为止所知的三星堆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遗址考古中的最为重大的收获。

历经多年考古发掘,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批的珍贵遗物。据初步统计,有金器近百件,青铜器五百多件,玉石礼器一千余件,石器数千件,以及大量的陶器(标本数万,可复原者上千件)、骨器、海贝和象牙等。^①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虎和鱼形饰、金料块等种类,特别是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重达500克,上面有精美的图案和花纹,对于揭示古蜀国历史有重要作用,文物价值极高。青铜器主要属宗教礼仪用器,生产生活用器发现极少,这些器物可分为三类:用于宗教活动的青铜铸像群(人像、神像、神怪铸像),如出土于二号坑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150多公斤,又如有大型青铜面具,高0.65米,宽1.38米,柱状眼球突出达0.16米,这些铸像造型独特,极具地方色彩,文物价值很高;二是一些可能与其历史文化有关的动植物造像(鸟、龙、虎、蛇、鸡、果实、树等),其中的青铜神树,造型神秘生动,与古蜀国神话文化应密切相关;三是青铜彝器,仅有十余件,属尊、罍、盘等。出土玉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器种类较多,有圭、璋、璧、琖、琮、环、珠、佩、管等用于礼仪、祭祀或生活,此外,矛、斧、戈、铤、凿等玉器多出于祭祀坑中,可能也属于礼器。石器有戈、矛、圭、璋、璧、琮、磬、斧、凿、斤等,用做兵器、生产生活用具和礼器,还发现有石人像、石龟、石蛙、石蛇等石雕工艺品。出土陶器具有显著地方特点,特别是带有鸟头把的器物的大量发现,构成了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

早在1984年12月就发现了三星堆的南城墙,并提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都城看法。^①随后又相继发现了东城墙和西城墙遗迹,并对城墙进行了试掘,初步弄清了城址的状况。三星堆城址平面形状略呈梯形,北面窄,南面宽,东、南、西三面建有城墙,城墙外可能有壕沟存在,北面未发现城垣,可能以河流为天然屏障,城址面积达3.5平方公里^②,大于郑州商城,在已发现的同期城址中位居前列。城址北临湔江(俗称鸭子河,古称雒水,东流汇入沱江),中有马牧河从西南折向东南流去(该河已经枯萎,但宽广的古河道遗迹清晰可见),当以城墙、壕沟和河流共同构成其军事防御体系^③。(见图7—1)三星堆城址现存东城墙长约1100余米,顶宽20多米,基宽40多米,现存高度约4米;南城墙已查明位于三星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② 最初确定南城墙为一、二号祭祀坑附近的三星堆土埂,因而相应认定三星堆城址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总面积2.6平方公里。在1994年11月到1995年1月的发掘中,重新认定遗址南城墙位于三星堆所在土埂以南,进而确定三星堆城址面积为近3.5平方公里。

③ 关于三星堆城墙的功能,学术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一种意见认为高大厚实的城墙属于一种防御体系,但防御作用有一定局限;一种意见主张城墙与防洪有关,三星堆城墙属防洪大堤;一种意见结合城内大量祭祀器物的出土,强调城墙是神权的象征,城墙属于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宗教性建筑。

堆所处土埂以南,现存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西城垣以自然土丘为基础修建而成,现存长约600多米,宽约40米,高6—10米。通过对部分墙体的试掘解剖得知: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基宽40多米,顶宽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构筑方法是分段夯筑,主城墙多采用平行夯层,内外侧墙多为斜行夯层,在主城墙顶部使用土坯砖筑城,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筑城的实例。在城址中,“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和集中的点都处在古城的中轴线上,这应是其宫殿区所在”。城址中陶窑、玉石器作坊以及铸造青铜器的泥芯的发现,表明城内手工作坊区的存在。“一个以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构成的古代蜀都,构成了商代长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的格局。”^①

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根据其文化特征可大致将其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的年代在距今4070—3600年;第三期的时代相当于商代的中晚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年(一说在距今3600—3000年);第四期的时代大约处在商末周初,测定年代在距今3100—2875±80年之间,三星堆遗址文化前后历时约2000年。^②通过对三星堆城址墙体的试掘,在墙垣夯土中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一期;东城垣以及南城垣的内侧,墙体夯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8页。

②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关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分期年代赵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又有所修正,可参考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9页。

《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祠之于湔。”《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蜀地的第三代蜀王，曾活动于或者说最后活动于湔山一带，湔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① 又据《读史方輿纪要》卷71《彭山县》记载：“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涪津也。”^②《四川通志》卷49《温江县》记载：“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综合文献信息，可知鱼凫作为早期蜀族的一个分支群体活动于川西平原，并逐渐成为蜀国的统治集团。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特别是近年来遗址中文物的大量出土，为认识遗址性质和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学者将三星堆遗址与文献所载杜宇都城“瞿上”联系起来，认为“瞿上”就是三星堆古城^③；也有学者提出杜宇最早在蜀建立国家，其都城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④。这两种观点虽有一定差异，但都认定三星堆古城为杜宇王朝的都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时代的城市，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是鱼凫世的文化遗存。^⑤ 当然，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其一期文

①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③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④ [日]古贺登：《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载[日]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1—181页。

⑤ 高大伦：《古蜀国鱼凫世钩沉》，《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又载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

化与二期以后文化差异较大,文化面貌缺乏内在连续性,当属两种不同的考古文化,一期属宝墩文化的范围;二期以后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们属于三星堆文化。从出土文物和相关年代的推算等来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鱼凫世的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都城所在。

有学者将“鱼凫”解释为鱼和凫,“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①。这种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实际上,鱼凫是一种以善于捕鱼的水鸟为图腾的部族集团的称呼,而并非个人的名称。这一点可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一条金杖,长1.42米,重约500克,杖的上端有0.46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共有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②,上方是两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③据考证,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为一枝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善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可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④

此外,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鸟头形勺把”,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许多射部呈鸟形的E型牙璋,二号祭祀坑发现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孙华:《蜀人溯源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4、5期。

② 在一号祭祀坑的发掘简报以及许多学者的引用中皆描述为“两背相对的鸟”,但据图案观察,两鸟形应为两头相对,这里在引用时故据实际更改。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④ 高大伦:《三星堆器物坑饰“鱼凫纹”金杖与强国墓地“鸭首形”铜旄》,《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12日第3版。

了巨大的铜鸟以及其他鸟的造型,^①这些鸟的形象应与金杖上的鸟的图案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和一致性,是鱼凫王朝文化的反映。鸟形器物以及带有鸟的图案的金杖等的出现时间都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以后,而三星堆一期与二期之间差异较大,文化面貌不具有连续性,一期文化又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由此可以推测,在柏灌时代的宝墩文化之后,鱼凫王朝取而代之,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形成了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将古蜀国的历史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从年代上推算,也可大致确定三星堆文化为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灭开明氏统治的蜀国。^②据《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开明氏统治蜀国共有十二代。罗泌的《路史·余论》说杜宇禅位开明后,经十一代350年为秦所灭。据此推算杜宇时期的结束当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这一说法与开明氏共经十二代可大致吻合(平均每代近30年)。有学者提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③关于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虽然已无法确知,但大体时间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应是可信的。杜宇王蜀有多长时间我们无从知晓,若以与开明王朝相当或者略长于开明王朝的时间400年左右计算,杜宇时代相当于西周和春秋早期,此正好与三星堆文化消亡的时间相一致。杜宇之前为鱼凫时代,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② 秦灭巴蜀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公元前316年,一说是公元前329年,多数学者认同前种看法。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载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结合前面所分析,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初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应属于鱼凫时代,三星堆文化是鱼凫时代的蜀国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十二桥文化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①,与文献记载的杜宇时代大体对应。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大约在商末周初,杜宇战胜了鱼凫,三星堆文化由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国由鱼凫王朝跨入了杜宇王朝。

柏灌之后的鱼凫王朝的政治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已发掘的祭祀坑来看,期间曾发生过变故。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发掘意义十分重大,两个坑中的器物都是经过焚烧后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入填埋的,二号坑的器物还经过人为破坏后埋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坑相距很近,但并不是同时形成的,据考古报告对坑中出土文物的年代分析,两个坑的年代相距约有百年。“可以说埋藏的器物是同一地区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用器。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两个宗庙先后被毁之后,将庙里的重器分别埋藏在两个坑中。”^②正如发掘报告所分析的,造成宗庙被毁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敌国入侵,一是本国内部政权的更迭。从祭祀坑的具体形成和文物出土来看,一、二号坑的形成情况有所不同。一号坑的形成可能是鱼凫王朝内部权力之争后出现的,但权力系统并未发生质的根本变化,只是从其一个集团转向另一个集团。因为在一号坑之后的二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与一号坑依然有许多相似之处,

① 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9页;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42页。

应属同一种文化,特别是在二号坑中出土的眼球向外凸出呈柱状的青铜人面具,极可能与《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纵目”有关,这一形象可能是经过艺术夸张表现的蚕丛形象。蚕丛是蜀人的始祖,在一号坑形成之后二号坑中继续出现,说明了一号坑之后的供奉蚕丛的统治者,依然是蜀族集团。另外,从一号坑之后,三星堆的文化依然处在继续发展中而没有出现中断,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次的权力变革发生在统治集团的内部。《国语·周语下》云:“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孟子·梁惠王下》亦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权力的更替,总是伴随着对原有统治者宗庙的毁坏和宗庙礼器的焚烧等。三星堆一号坑的出现,是内部权力更替的反映,鱼凫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集团从原有一小集团手中取得权力,于是将宗庙中一部分与先前统治者相关的宗教祭祀用器搬出,按照一定的礼仪,对其焚烧后填埋,以示彻底胜利;另一方面,宗庙中有关蜀人始祖当然也是他们始祖的祭器理所当然地保留了下来,并继续供奉,除此而外,又增加了一些与新的统治集团相关的一些宗教礼器,此后,宗教祭祀活动按照一定的礼仪定期地继续进行着。

二号坑的形成当与杜宇取代鱼凫王朝有关。有学者主张三星堆文化的消亡与洪水有关,是洪水毁灭了三星堆古城。^①然而从考古发现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杜宇取代鱼凫导致了三星堆的衰亡。二号坑中蚕丛等祖器被毁坏填埋,而且填埋器物数量极大,有可能是宗庙中的所有器物,这些器物不仅被

① 林向:《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成都平原的考古最新发现》,《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刘兴诗:《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肆意焚烧,而且加以专门毁坏,之后才按照相关礼仪规定进行填埋,以庆祝他们的彻底胜利。十二桥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但对三星堆文化有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其前后构成了发展的连续性。这似乎说明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毁于大的自然洪水,而是为新的杜宇王朝所摧毁,杜宇在政权上推翻鱼凫王朝的同时,又对其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将蜀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推进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从宝墩文化中经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前后发展的脉络明显具有连续性,这反映出从蚕丛、柏灌、鱼凫以至杜宇,蜀族的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蜀文化应是以蜀族为主体的共同体的物质遗存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先后建立的蜀国的遗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传说和文献记载的不同统治集团可能是蜀族内部不同集团相继在川西蜀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这一假想可以成立,倒是和考古材料一致的。”^①

3.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

以宝墩等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蜀地社会正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应同属古蜀文化系统,三星堆文化时期,蜀地的社会发展在宝墩时期的基础上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已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的遗址,遗址由数十个文化点组成,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遗址核心部分的城址占地面积达3.5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此外,在三星堆遗址以外的周围地区,还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

^① 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的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组成的复杂社会”。^① (见图 7—2) 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这一“复杂社会”已处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文明阶段,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时期蜀地的真正国家已经形成,整个社会已属于文明社会。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量的礼仪用器。在考古出土的 500 多件青铜器中,极少发现生产和生活用器,主要属于礼仪和宗教用器。青铜彝器有尊、罍、盘等类型,此外多是与宗教祭祀和神话传说有关的青铜器物。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和青铜神树等,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造型考究,纹饰内涵丰富,其工艺水平很高,反映出社会生产已具有较高水准。^② 遗址中还出土有金器,有金杖、金面罩以及金质动植物饰品等,金杖上有文化内涵深刻的装饰图案,这些器物出土于祭祀坑中,与宗教礼仪有关。玉器出土数量多,种类全,多为礼仪、宗教用器。在石器中,也有不少用作礼仪的器物,如成组成套的石璧等。这些众多礼器的出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此外,双手反绑的跪坐石人像等在遗址中的发现,也可隐约折射出三星堆文化时期蜀地文明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和突出。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有房屋建筑基址多处,其中已揭露出 50 多间,最大的一处房屋建筑进深达 8.7 米,面宽 23 米,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此建筑属数间相连,其功能已超出一般居室,可能属于重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邹衡所作序,第 8 页。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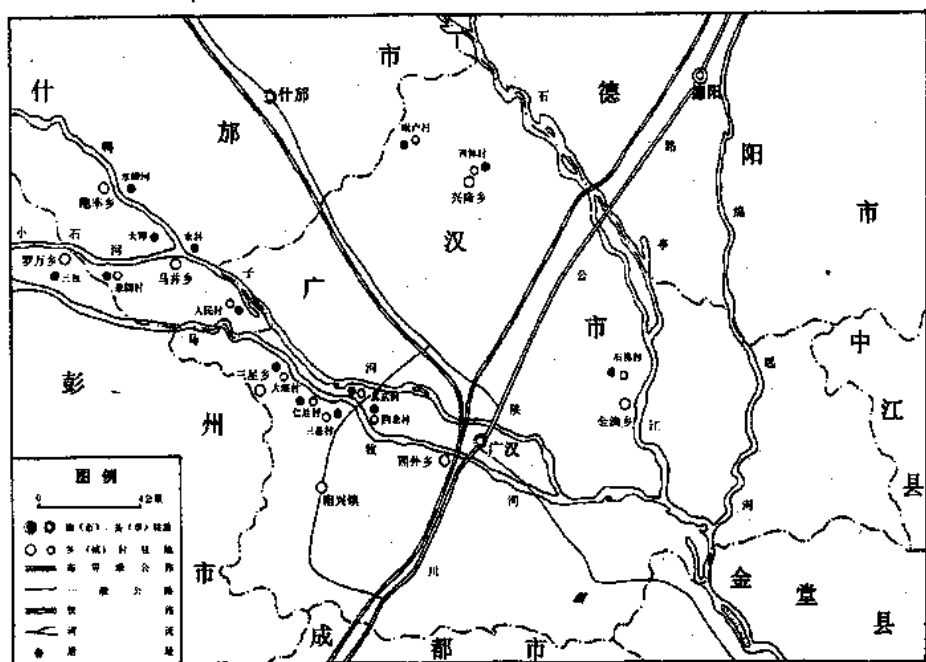


图7—2 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商周遗址分布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

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拥有规模巨大、气势宏伟、装饰神秘而华丽的宗庙建筑。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神坛和青铜神殿模型残片,可以看做三星堆遗址时期蜀地宗庙建筑形象的缩影。^①“神坛”形状似殿堂建筑,四壁镂空成龙鸟状,器物顶盖极似屋顶,器盖四周成屋檐状,从檐口可见“椽”和“滴水”,盖顶面上有云雷纹和烱纹;“神殿”上部为房屋形,顶部是屋顶状,顶下四周每面有5人站立,两手执璋呈奉献状,屋下四周有人呈站立状,头顶“房屋”四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青铜人立像高 2.62 米,青铜纵目面具宽 1.38 米,太阳形器直径约 1 米,复原后的青铜神树高 3.9 米,树冠直径达 1.5 米左右,有学者据此推算,如果要将这些器物安排在一个宗庙中,这个宗庙建筑面积应在 200 平方米以上,高度在 6 米以上;如果再把祭祀坑中出土的其他宗教礼器也放到其中,存放二号坑文物的庙堂建筑面积应不少于 400 平方米,这样的建筑可谓气势庞大,应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代表。^①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建筑尤其是礼仪性建筑、宗教性建筑的兴建,反映出其社会综合发展的水平,标志着古蜀国的真正建立和蜀地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三星堆城址是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所在,从现存遗迹来看,三星堆的城墙依然高大、坚厚,墙体底宽 40 多米,顶宽 20 米左右,高度有 4—10 米,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墙体的宏大。城内面积广大,可达近 3.5 平方公里,在已发现的我国同期城址中位居前列。城址三面有墙,墙外有壕沟,一面邻水,且有河流从城内蜿蜒流过,这是一个以城墙、壕沟和河流共同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河流充当了古城的天然屏障。“利用河流及其堤防作为屏障,原是古人惯用的方法,战国时代各国在边境上兴建的长城,多数就是利用河流的堤防连接山地而成。”^②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蜀地先民早已认识并充分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并将其与高大的城墙相结合,构筑出水墙一体的城市防御体系。从出土文物和发现遗迹来看,三星堆古城已有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的相对划分。这一切都说明,三星堆古城是一个与乡村聚落具有显著分野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21 页。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序言,第 3 页。

城市军事防御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权力中心的存在,结合出土的相关文物,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高度集权的国家政体已经形成,社会发展已经由文明的起源阶段迈入了文明形成后的早期发展阶段。

三星堆遗址中大量青铜器和礼器的出土、大型礼仪性建筑遗迹的发现和宗教性建筑的可能存在、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址的发现,无不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家已经出现,蜀地真正城市已经形成,社会发展的水平已处于文明阶段。“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族群在这一阶段已形成了国家组织,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①“如果说宝墩等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的话,那么在宝墩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王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②

二 鱼凫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

三星堆遗址是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遗存,鱼凫王朝时期,蜀地的国家和文明业已形成,城市也由其前的起源时期进入到真正城市的初期发展阶段。鱼凫时期的蜀国城市虽然我们已无法完全知晓,但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对其认识会逐渐趋于全面和深入。目前,三星堆城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为认识鱼凫王朝时期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② 黄剑华:《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蜀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和条件。

1. 鱼凫王朝的国都

三星堆城址已与宝墩等史前城址不同,反映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业已形成。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城市是成都平原古蜀国最早的早期城市。这一城市墙体高大,以城墙、壕沟、河流等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城市面积广大,占地面积达3.5平方公里,在同期古城中位居前列,城内具有一定的功能分区,建有高大的各式建筑,是区域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周围地区还分布着众多的居民聚落,已发现文化遗址有数十座,这些遗址同古城一起形成了宏伟宽广的三星堆文化的区域空间。由此看来,这座古城并非一般意义和规模的城市,应是古蜀国历史时期的王都。对此,考古报告指出:三星堆“城址规模很大,文化内涵丰富,无疑是一个方国的中心都邑”。^① 学者们也多主张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的都城,这一论点已似成定论。^② 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等可做出这种推断:三星堆文化应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文化;与此相关,三星堆古城应是三代蜀王中鱼凫王朝的国都。

三星堆鱼凫国都作为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区域中心,其城市发展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点可从城址等遗迹以及出土文物中有所反映。三星堆城址面积达3.5平方公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②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段渝:《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7页。

都城。遗址城墙高大,现存底宽40米,顶宽20米,高4—6米,三面城墙总长在5000米以上^①,加上北面临河可能建有一些防御设施,要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一定的技术水平,反映出当时古蜀国社会生产发展的高度,也说明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拥有较多的人口。如果再从城市的面积作一推测,鱼凫国都的常住人口数量应该较大。根据学者的推算,三星堆古城的人口至少应在12000—24000之间^②,这一估计应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③三星堆鱼凫都城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古蜀国人口和文化的集中之地。三星堆城址中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有的建筑面积可达200平方米,城内建有外形高大、装饰华丽神秘、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宗庙。^④由于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还十分有限,我们无法得知城内建筑的整体情况,但由已发现的建筑遗迹和文物推想,三星堆都城的建筑当十分壮观。从三星堆城址来看,鱼凫王朝国都城内已有相对分明的功能分区。从三星堆到月亮湾的南北一线是都城的中轴线所在,城市的布局以此为中心展开,三星

① 就相关资料得知,三星堆城址面积有3.5平方公里,形状呈梯形,三面围墙,南北宽1400多米,东西长1600—2100米;根据这些数据可大致推算出原古城城墙总长应在5000米以上。

② 林向:《巴蜀文化区导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林向著:《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④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点都位处这条中轴线之上,城市的宫殿区和作坊区分布于这条线的不同区段,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城市居民生活区,一、二号祭祀坑附近应是都城的宗教区所在。“宫殿区、宗教圣区、生活区、生产区,便构成商代三星堆蜀国都城平面规划的四个基本要素。”^①“一个以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构成的古代蜀都,构成了商代长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的格局。”^②总的来说,三星堆鱼凫都城不仅规模很大,人口较多,而且城市内的功能分区相对明确,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是古蜀国早期城市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三星堆鱼凫王都的城市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区域特色。

首先,鱼凫王都是一座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城市。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宗教礼器占有极大的比重,有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器以及用于祭祀的象牙等动物遗骸,特别是大型系列青铜祭祀用器的出土,表明都城中宗教祭祀文化的重要地位。根据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学者推测出城内建有面积400平方米以上,高度至少在6米以上,且装饰华丽的气势恢弘的宗庙建筑。祭祀坑与城址内的三星堆(人工建筑的大型土台)应属于一个整体系统,三星堆是当时城市居民举行各种祭祀礼仪的活动场所,人工夯筑的三个土堆也许就是祭祀社主的“冢土”即祭坛。^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是中国早期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大事,一

①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8页。

③ 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集,1989年。

般说来,重视宗教祭祀是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共性之一,然而这一点在三星堆鱼凫王都中表现尤为明显。“宗教祭祀活动在其国家产生、文明出现的过程中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构成了早期蜀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三星堆文化在“具有宗教特色的城市形态方面,似乎与龙山时代的良渚文化较为接近”。^① 显著的地方宗教文化特色构成了三星堆鱼凫王都的特点之一。

其次,三星堆鱼凫都城的军事防御系统也较有特色。关于三星堆古城城墙的功用,有学者指出与城市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关。段渝指出,蜀的大型礼仪中心,商代的三星堆古城是其中重要的一处,三星堆的大型礼仪宗教活动,“也许是在城墙上或广场上举行”。^② 后又进一步分析指出,三星堆“大型宗教礼仪性活动,便是在宽阔的城墙顶上举行的。这种情形,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古代文明、印加文明的城堡、城墙的功能,竟恰巧相同,毫无二致”。^③ 许宏提出,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城墙似乎并非仅为防御而建,极有可能还具有宗教与礼制的象征意义”。^④ 应该说,三星堆城墙也许具有多种功能,但雄伟高大的墙体,军事防御是其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三星堆古城北临鸭子河,城市应在河岸建有堤防或利用具有一定高度的天然河岸作为防御,河流和河岸共同组成了北部防线。城墙外挖掘有壕沟,与城墙一起增强了城市的防御能力。马牧河从城市中折向流过,方便了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弄清城市的城门位置,也许在马牧河入城出城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8页。

②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4页。

③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④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的地方方便建有坚固的水上城门。三星堆古城的军事防御系统由城墙、壕沟和河流共同组成,这种水、城、壕共同组成的城市军事防御设施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中较为少见,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

最后,三星堆鱼凫王都的特点还表现在城市具有多重功能。三星堆古城作为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国都,首先是古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政治功能显而易见,城址中宫殿遗迹的发现便是明证;三星堆浓厚的宗教文化和气氛,说明这里是古蜀国宗教文化和祭祀礼仪活动的中心,城市具有显著的宗教功能,这从遗址中大量宗教祭祀用器的出土和祭祀坑的发现可得到说明;为了保卫古蜀国这个政治和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鱼凫都城必须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能力,城市应具有军事防御功能,遗址中雄伟高大的城墙等组成的防御体系便是对此的最好说明。因此可以说,三星堆鱼凫王都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城市,其核心是政治和宗教二者合一的城市功能,军事防御功能只是其城市核心功能的延伸和外部保障,这一点和中国其他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似之处。

根据分析,三星堆古城城垣的始建年代早于三星堆遗址文化二期偏晚阶段,延续使用到遗址文化的第三期,时间约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城址的形成在时间上可以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等史前城址的消亡大体衔接,三星堆鱼凫王都是成都平原蜀地社会经过宝墩文化时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起源过程后形成的真正意义的城市,是古蜀国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三星堆都城的消亡可能与古蜀国杜宇王朝取代鱼凫政权的战争有关。遗址发现的二号祭祀坑的形成时间属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三期后段,约相当于商代中期。这一时间与遗址城垣弃用的时间大体一致,据此我们不难推想:杜宇率部战胜鱼凫王朝军队,鱼凫部众撤

退至湔山继续作战,最终彻底被杜宇军队击败。^①随后,杜宇众人将三星堆古城鱼凫宗庙焚毁,庙中宗庙礼器按照相关礼仪焚烧并有意破坏后填满。由于战争的破坏,三星堆都城建筑毁坏,城垣破损,到处一片狼藉,鱼凫王都这座昔日繁华兴盛的城市盛景一去不复返,此后,三星堆古城便弃而不用。

2. 鱼凫王朝城市的探寻

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城市并不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然而从三星堆遗址的遗迹和遗物来看,三星堆古城应是鱼凫王朝的国都。至于国都以外的鱼凫时代蜀国的城市,我们仅能依据相关考古的进展加以探寻。

根据近年来对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研究,三星堆遗址文化可分为四期^②,其中一期可划入宝墩文化,二、三期是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应属于十二桥文化。^③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十二桥遗址为代表,已发掘的遗址有成都市十二桥、指挥街、方池街、岷山饭店、抚

①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记载:“鱼凫田于湔山”,得到“仙道”而去,这可能是鱼凫统治者最后在湔山战败的隐约曲折的反映。

② 孙华将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六段,认为“三星堆的三期遗存,它们的文化内涵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差别”。“三星堆的三期遗存,实际上应当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下的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三星堆一期遗存为“边堆山文化”(即近年提出的“宝墩文化”),二期遗存是“三星堆文化”,三期遗存可称为“十二桥文化”。提出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应在遗址的第二期最晚期或第二、三期之际。参考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载《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又见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7页。

③ 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9页。

琴小区、羊子山土台下堆积、新繁水观音等,其中十二桥^①、指挥街^②、新繁水观音^③和羊子山土台下堆积^④的资料已经公布,据对已有考古资料的研究分析,认为十二桥文化可分为两期四段,一期早段年代在殷墟三期——殷末周初,一期晚段的时间可定在西周早期,二期文化的年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早段约相当于西周后期,晚段约在春秋前期。^⑤ 2001年以来,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又进一步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古蜀国城市发展的认识。^⑥

早在1993年,段渝就提出:“在殷商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本土的蜀王国即已产生形成了两座早期城市,这就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早期成都。”^⑦应该说这一论断无疑是具有充分的根据,成都和三星堆古城在殷商时代都是重要的蜀国城市,然而若从时间上讲,二者可能并非同时,三星堆古城在前,属于三星堆文化;成都城在后,属于十二桥文化,两座城市在时间上可大致衔接,成都至迟在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②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④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⑤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⑦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段渝:《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商代晚期已经建城。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政治文化的中心，从各个方面都反映出王都的气象。成都也以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成为与三星堆文明中心相呼应的次级中心”，成都城市的早期文明“不是独立于三星堆文明体系之外的另一种文明体系，这一点从两地所出鸟头把勺这一具有神权象征的神器的变化就可以得到佐证”。^① 这一观点将早期成都城市纳入了三星堆文明的体系之中，主张成都城市是三星堆都城之下的次一级城市。从时间前后来看，这一观点值得做进一步商榷。三星堆祭祀坑的形成和城市的废弃时间大致都在三星堆遗址的三期的最后，而四期已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围，成都建城在三星堆古城废弃后的商代晚期，因而成都城无法归入三星堆文化的城市体系之中。由此可以看出，鱼凫王朝时期的城市我们目前仅知其王都三星堆古城的一些情况，除此而外，并未发现别的城市。当然，古蜀国鱼凫王朝应还建有其他城市，这一点尚需考古发现的探寻。

^①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第八章 杜宇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鱼鳧之后,杜宇执掌蜀国大权。考古发现的成都十二桥遗址群、金沙遗址群,在年代上大致在三星堆遗址之后,考古文化为十二桥文化。如果说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鱼鳧王朝时期的文化,那么十二桥文化就可能属于杜宇时代的蜀国文化。十二桥文化在成都市区的密集分布,表明这里应是一处重要城市的所在,由此亦可推见杜宇时期蜀国城市发展的情况。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可对古蜀国杜宇时期的王权更替和城市发展等历史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一 杜宇王朝的兴亡

古蜀国在鱼鳧王朝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是杜宇集团,关于古蜀国杜宇王朝的兴废,历史文献中有些许记载。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案:《史记·三代世表·索引》引作“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案:《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下有“移居邦邑”四字)。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文选·思玄赋》注,《御览》一百六十六,又

八百八十八)。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案:《后汉书》注,《文选》注引作“鳖令”),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思玄赋》注,《御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三,《事类赋》注六)。^①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依据《蜀王本纪》等文献,对于杜宇时代的历史有较为类似的记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②

文献中关于杜宇的记载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和后世对其进行粉饰的成分,并且存在一些明显的谬误,如“七国称王,杜宇称帝”

① (汉)扬雄著,马怡整理:《蜀王本纪》,载孙家洲主编:《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的说法就是不可信的,但从这些记载中仍不难看出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我们可对杜宇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杜宇应属于一个部族或者说血缘群体、集体的总的称呼,并非专指某一个人。杜宇,史书中又作“蒲泽”,再作“蒲卑”,这一称呼可能与其曾都于郫邑有关^①,号曰“杜主”,又号“望帝”。杜宇之前古蜀国的统治者是鱼凫集团,杜宇集团通过斗争取而代之,建立了古蜀国的杜宇王朝,杜宇王朝历经几百年后,又为古蜀国新的开明王朝所替代。

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其文化属于鱼凫王朝的古蜀国文化,三星堆古城是鱼凫王朝的国都。遗址中二号祭祀坑的形成和城市的废弃,表明了鱼凫时代的结束和古蜀国杜宇时代的开始,时间上发生在商末周初,这从出土器物的变化上也有所反映。^②任乃强提出,开始建立杜宇王朝的杜主,应生活在“西周年代或且在殷末年代”,^③这一判断应该说是较为准确的。从考古文化的变化来说,三星堆古城与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大体一致,遗址中二、三期遗存属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已属于另一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范围,十二桥文化取代三星堆文化应是杜宇王朝取代鱼凫王朝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杜宇取代鱼凫的时间应在商代中期以后或者商代后期。

杜宇王朝消亡的时间相对来说较为清楚。据《华阳国志》和《史记》等文献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灭掉

①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83页注解。

②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③ 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了开明王朝的蜀国。又文献记载开明王蜀共有十二代,若以每代25年计算,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在公元前616年;若以每代30年计算,杜宇王朝灭亡的时间在公元前676年,可知开明取代杜宇大致在春秋中期或者早期偏晚阶段。《路史·余论》记载杜宇禅位开明以后,经过了十一代350年为秦所灭。由此推算杜宇王朝消亡当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这一说法可与开明氏共经十二代可大致吻合。李学勤提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①关于杜宇王朝消亡即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虽然我们尚无法确知,但大体时间定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应是可以接受的。从考古文化来看,接续鱼凫三星堆文化的十二桥文化(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的一期文化)的时间在商代后期前后,年代范围大致在殷墟一、二期之际到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250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②由此可粗略看出古蜀国杜宇王朝的前后延续时间大约有二三百年的。

杜宇王朝后期,蜀地曾发生严重洪水,由于开明鳖灵治水有功,杜宇禅位于开明,这是文献反映的杜宇王朝消亡的情形。事实到底如何呢?洪水的发生可能属于历史事实,鳖灵治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洪水的治理,但杜宇禅位开明可能是统治者粉饰太平的一种说法,未必可信,历史的真相可能是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发生严重水灾,杜宇蜀国受到重创,开明趁机起兵取而代之,建立了古蜀国的开明政权,随后开明王朝的首要任务是带领蜀国人民治理水患,进行灾后重建。这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结束以及十

① 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载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桥文化到新的古蜀文化中间有一断层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十二桥遗址群的二期文化已与一期的十二桥文化有所不同,“似乎处在从十二桥文化向战国时期前后的所谓‘蜀文化’的过渡阶段”^①,而一期、二期之间存在有较大的缺环,造成这一缺环的背景可能是杜宇后期的水灾及其随后开明夺取杜宇政权的战争。

关于杜宇的族属,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郦道元在所著《水经注》卷33《江水》中引来敏《本蜀论》云:“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②这两则资料中提到两个地名,一是朱提,一是江源,杜宇从天而降,到了朱提;《本蜀论》虽未提到朱提,但将江源女子利称为朱利,此处的“朱”当与杜宇的“朱提”有关。朱提即今云南昭通,江源在今四川崇庆县。由此可知,杜宇从朱提北上,后与江源蜀人联姻,逐渐融入四川盆地的蜀族之中。到杜宇取代鱼凫之时,杜宇族人(亦可算入蜀人)应已与鱼凫蜀人的文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宋治民提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蜀文化应是以蜀族为主的共同体的物质遗存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部族)先后建立的蜀国的遗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传说和文献记载的不同统治集团可能是蜀族内部不同集团相继在川西蜀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这一假想可以成立,倒是和考古材料一致的。”^③古蜀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纳新、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的共同体,杜宇虽来自外处,但较早进入四川盆地,并与当地蜀人联姻,逐渐融入古蜀族的群体之中。邓少

①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

③ 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琴分析指出：“杜宇继鱼凫之后而王蜀，其去帝位，乃‘升西山隐焉’，亦如鱼凫王之蒲山而得仙道，应视蚕丛及杜宇为同一族属。”^①这一推断具有一定的道理。

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杜，古与土同音，“杜主”即“土主”，四川过去各城中多有土主庙。^②说明杜宇部长于农作，似乎也说明杜宇时期蜀国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时期农业的发展不仅对蜀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四川盆地的巴人也影响较大。杜宇蜀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国界曾北到陕西汉中，南达四川青神县，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东到嘉陵江，且以岷山、南中（今四川凉山州、宜宾以及云贵北部）为附庸。^③

二 杜宇时期的蜀国城市

关于杜宇时代的蜀国城市，《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有零星记载，据此仅可对了解杜宇时期的城市提供一些线索而已。探讨杜宇蜀国城市的发展更多的则有赖于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十二桥遗址的发现和十二桥文化的命名，特别是2001年以来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和不断发掘，为我们认识杜宇时代蜀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可以想象，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对于杜宇蜀国城市发展的认识会渐趋全面和深入。

①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② 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③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 郫邑与瞿上

文献中提到杜宇蜀国的城市仅有都城郫邑和瞿上两座,至于除此而外的其他城市(包括都城和一般城市)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杜宇蜀国应该还有别的城市存在。《文选》张衡《思立赋》李善注引扬雄《蜀王本纪》云: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华阳国志》之《蜀志》写道: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郫县”记载:“郫邑,蜀望帝理汶山下,邑曰郫,是也。”从史料可知:郫邑和瞿上是杜宇蜀国的都城,从“移治”用字来看,其前杜宇还应有其他城市曾经存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移治”的问题。

关于杜宇时代的郫邑,至今尚无考古城址准确加以确认,因而在确定其具体位置时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判定。一是认为杜宇蜀国都城郫邑在今郫县城北约二里处,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古城。同治年间所修《郫县志》卷一二载:“杜鹃城在县北郊。扬雄《蜀记》杜主代鱼凫王蜀,徙都于郫,即杜鹃城也。”从扬雄《蜀王本纪》所记开始,历代多沿袭此说,至今仍有诸多学者坚持此说。^①二是认为郫邑在彭县九陇丘陵地区。任乃强提出郫邑在今彭县西北约二十余里的九陇黄土丘陵地区,其主要依据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相关记载:“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②三是认为郫邑即成都西部。徐朝龙通过对文献中“卑”的考证,主张郫邑应在今成都西部。^③四是

①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83页注。

②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注。

③ 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认为郫邑就是三星堆城址。日本学者古贺登在《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一文中提出,在古蜀最初建立古代国家的是杜宇,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就是三星堆古城。^① 五是认为郫邑应在今彭州濛阳、竹瓦一带。陈剑通过对郫县杜鹃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搞清杜鹃城为汉代所建,可能是西汉郫县县城所在;杜宇郫邑后为秦灭蜀后所建郫城、秦的郫县县城相沿袭,具体位置可能在彭州濛阳、竹瓦、清白等地(青白江、濛阳河流经地区)。^② 对于郫邑的位置及城市发展状况,尚有待考古发现的进一步支持。

根据文献记载,瞿上城是杜宇蜀国的又一都城。关于瞿上城的位置,一般认为在今双流县境内。《明一统志》说:“瞿上城,在双流县东十八里,蚕丛氏所都。”《路史》卷四记载:“蚕丛纵目,王瞿上。”罗莘注云:“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四川通志》卷四九载:“瞿上城在(双流)县南十八里。”顾颉刚提出:“杜宇‘或治瞿上’,是牧马山曾为古蜀国的都城。”当地学者通过实际考察后进一步确定了瞿上城的具体位置:“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多数学者都赞同杜宇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境内的观点。^③ 此外,任乃强认为“瞿上”在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元和郡县图志》谓之天彭门(又称

① [日]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1—181页。

② 陈剑:《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③ 顾颉刚:《双游游记》,载四川省教育厅编《文史教学》创刊号,1941年4月30日出版;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83页注;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天彭阙),从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称海窝子为“瞿上”;^①徐朝龙在《“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一文中提出新说,认为蚕丛、柏灌、鱼凫的国都为瞿上即三星堆城址古城。^②关于杜宇时期瞿上城的位置,学者们虽然做了一定的研究和推测,观点也难免有所不同,但其具体地点和城市发展状况,至今尚未得到有关考古发现的证明。

2. 金沙遗址与十二桥遗址群

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已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除新繁水观音^③、羊子山土台^④和青羊宫等遗址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新发现了十二桥^⑤、新一村^⑥、指挥街^⑦、方池街、岷山饭店、抚琴小区、黄忠村、君平街、盐道街、上汪家拐^⑧等遗址。这些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市内从西门车站到新南门长达数公里的弧形地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注。

② 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④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⑤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⑥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6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⑦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市上汪家拐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带,属故郫江及其支流的沿河地区”。^① 这些遗址,以十二桥遗址最具代表性,因此有学者将这一带商周遗址群总称为“十二桥遗址群”。^② (见图8—1)据已进行的发掘和公布的资料,可对遗址文化形成初步认识。

有学者将成都市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一是以上汪家拐遗存为代表的战国文化遗存(目前发掘的遗址仅有上汪家拐遗址下层和青羊宫遗址)。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分析,认为十二桥文化可分为两期四段,一期早段年代在殷墟三期——殷末周初,一期晚段的时间可定在西周早期,二期文化的年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早段约相当于西周后期,晚段约在春秋前期。上汪家拐遗存可初步分为三期,其年代从战国早期持续到西汉初年。“上汪家拐遗存与十二桥文化之间尚有一段空白,但与十二桥文化的继承关系却是很明显的。”^③十二桥遗址东西长142米,南北宽133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发现有木构干栏式建筑,既有小型房屋,也发现大型地梁基础,可能是大型带廊庑的宫殿式建筑遗迹。属于十二桥文化的遗物出土很多,石器有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镑、凿为主的生产工具和大量的不知用途的石盘状器;骨器有磨制的笄、针、锥、镞和鹿角器等,数量较多;铜器中发现了凿、镞及最原始的柳叶形剑;陶器出土很多,其中生产工具中纺轮数量较多,网坠较少;还发

① 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②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江章华、王毅、张肇:《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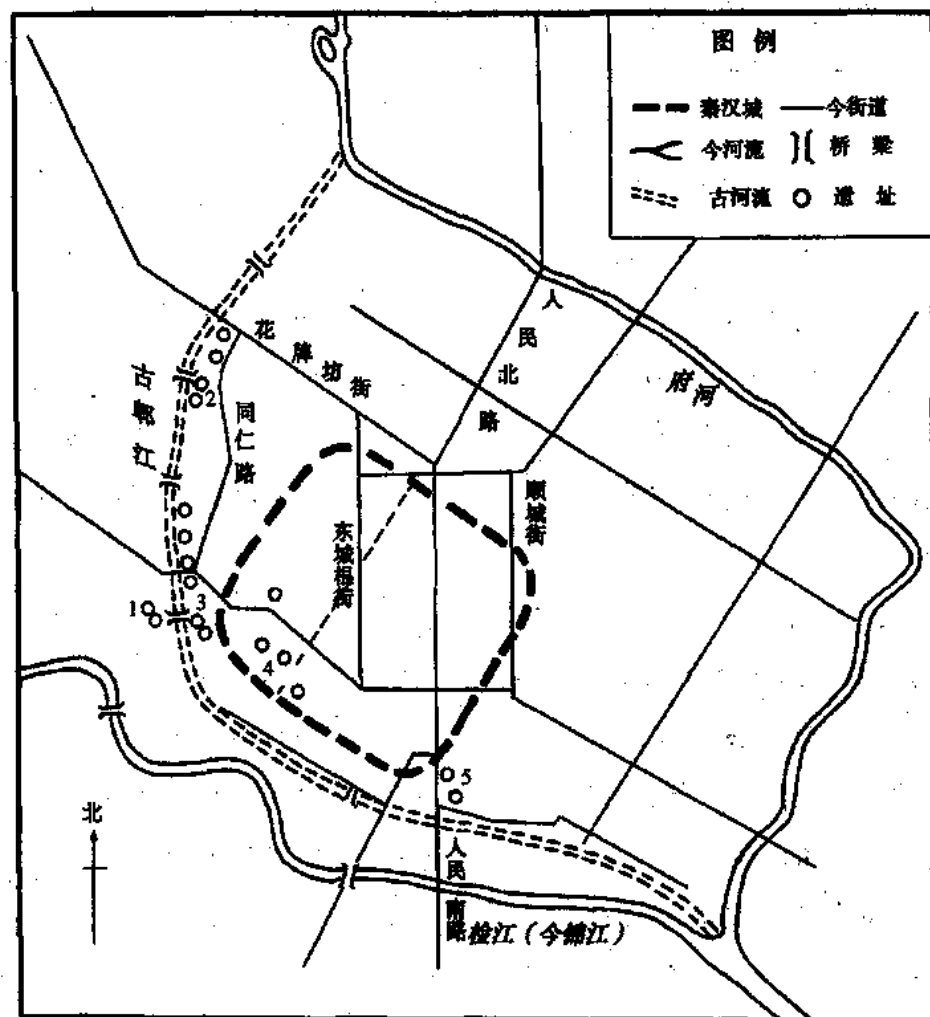


图 8—1 十二桥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孙华著:《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1. 青羊宫遗址 2. 抚琴台小区遗址 3. 十二桥遗址 4. 上汪家拐遗址
5. 指挥街遗址

现一定数量的卜甲,多为龟腹甲骨,有圆钻无凿和圆钻方凿并存两种。

孙华的《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一文,将成都市以

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期的遗址文化划分为三期六段：一期处于商代后期前后，年代范围大致在殷墟一、二期之际到西周初期（前1250—前1000年），其中1段不晚于殷墟二期，2段在殷墟三期前后，3段相当于殷墟四期或稍晚；二期处于春秋早期到战国初期，以春秋中晚期的可能性较大，绝对年代在前700—前400年间；三期处在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前400—前200年），其中5段为战国早中期，6段为战国晚期及秦代。一期文化属于十二桥文化，二期遗存文化归属尚难确定，三期遗存可暂时称作蜀文化，在一、二期遗存的文化之间存在有较大的缺环。^①

以上两种关于十二桥文化的认识存在有一些差异，其重要一点是该文化的时间跨度，前者将十二桥文化分为二期，时间断定在殷墟三期到春秋前期之间；后者仅把十二桥遗址群的一期划入十二桥文化，年代确定在殷墟一、二期之际到西周初期，绝对年代在前1250—前1000年之间。但两者也形成了重要的共识，即承认十二桥文化与其后的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前后之间文化发展存在着较大的缺环。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对于我们认识早期蜀国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沙村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②，2001年初以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涵，而且为认识成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地处市区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的青羊区的金沙村和

①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88页。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金牛区的黄忠村，摸底河自西向东穿过遗址中部，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遗址东南面是十二桥遗址群，整个范围绵延达10多公里。在金沙遗址中，现已确认了4处重点堆积区，并对“梅苑”、“兰苑”和“体育公园”3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17000余平方米，初步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见图8—2）

金沙遗址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址、窑址、墓葬、窖穴、灰坑等。在“梅苑”发掘区的东部，发现有象牙堆积坑；在南部，分布有面积约300平方米的石璧、石璋堆积区；在北部，发掘出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堆积区。遗址中出土重要文物达2000多件，其中金器40多件，玉器900余件，铜器700多件，石器近300件，象牙器、骨器40多件，还有大量的象牙和陶器或陶片。金沙遗址所出的金、玉、铜、石等质地器物，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所出相似，但同时也显示出较强的自身特点。

金沙遗址的年代范围约在商代晚期到春秋之间，主体文化遗存应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遗址文化属于十二桥文化。在遗址中，“梅苑”东北部出土有2000多件金器、玉器、铜器、石器等礼仪性用器以及大量的象牙、卜甲等，还发现象牙堆积坑，石璧、石璋堆积区和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堆积区。在这一区域的西部还发现了大量卜甲，应与宗教祭祀相关。“‘梅苑’东北部可能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它与北部的黄忠村‘三和苑’的重要居住区隔摸底河相望，相距约800米。”“兰苑”中发现大量房址、窖穴、灰坑和墓葬，出土众多日用陶器，这里应是居住区和墓葬区。“体育公园”原属居住区，废弃后成为墓地。金沙遗址的遗迹和出土文物表明，这里“是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聚落遗址，有可能是古蜀国在商代晚

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①

目前,金沙遗址考古工作仍在进展当中,不断有新的文物和遗迹相继发现,相关考古报告等资料也不时逐渐公布。^② 随着金沙遗址考古的进展,对于其认识和研究将会不断得以深入。

3. 杜宇时期的成都

杜宇时期蜀国曾都于郫邑和瞿上,除此之外文献中再没有提及其他都城或城市。然而从成都市发现的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等密集分布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来看,这里可能是一处重要的都城所在,并且可能与古蜀国的杜宇王朝密切相关。

金沙遗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从西北向东南沿古河道两岸分布包括十二桥遗址群在内的同期文化遗址绵延达10余公里,且文化遗址分布密集;从遗址的遗迹和文物来看,已有明显的宗教祭祀区、宫殿区、普通居住区、墓葬区等的分工;遗址中出土文物数量很大,工艺精致,生产水平较高,特别是大量金器、玉器、铜器、骨器以及象牙等祭祀礼仪用器的出土,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处重要的都城所在。“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当时的中心遗址,有可能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统治成都平原古国的都邑。”^③成都市区以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密集分布的商周遗址群,“构成成都古城的前身——古蜀文明的又一中心都邑”,“失落的三星堆古城已

① 本节关于金沙遗址材料的出处均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刘裕国:《金沙遗址考古再获重大发现》,《人民日报》2006年6月12日。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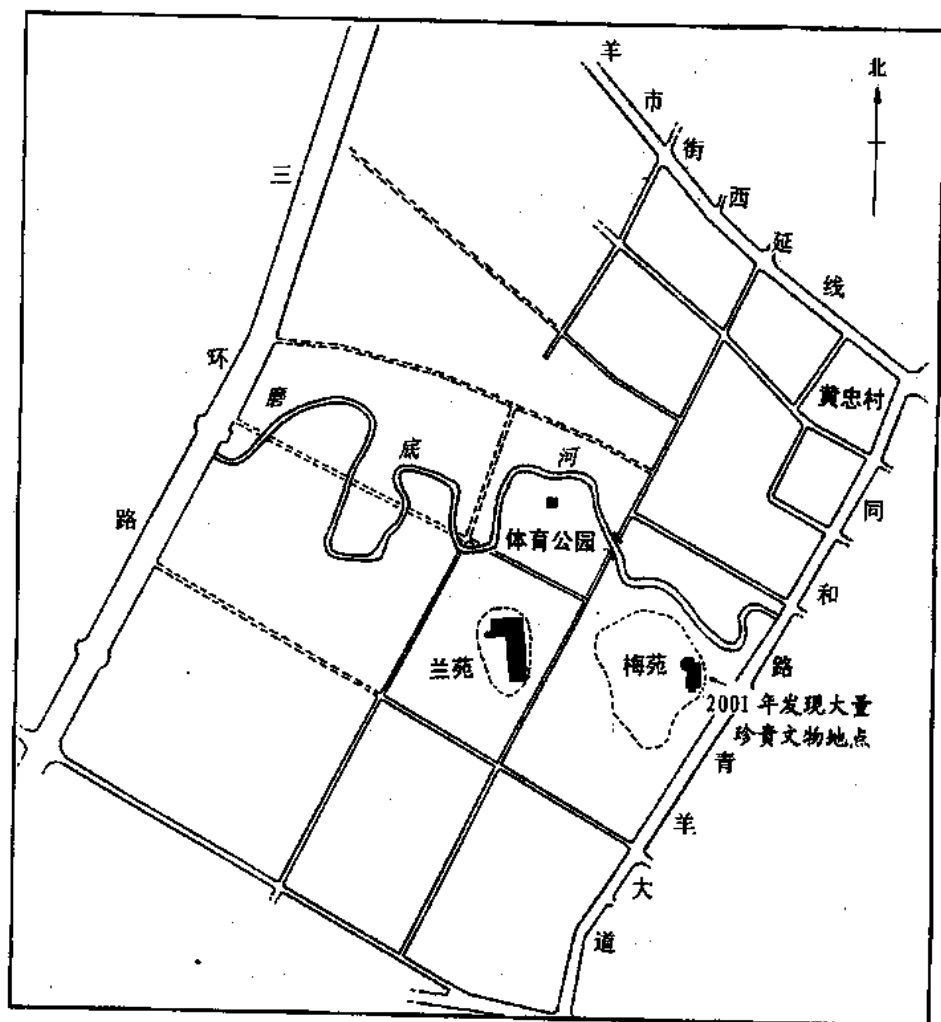


图8—2 成都金沙遗址位置示意图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经在成都市区找到了下落”。^①

如前文所述,三星堆古城是鱼凫蜀国的都城,三星堆文化是古

^① 林向:《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成都平原的考古最新发现》,《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

蜀国鱼凫时期的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中心、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继续发展,二者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十二桥文化下限最晚可至春秋早期且又不同于战国时期开明蜀国的文化(如上汪家拐遗存),加之开明王蜀共十二代,以此上推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应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将文献中有关杜宇的记载和蜀地考古文化发展的时间序列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我们可大致推定十二桥文化是杜宇蜀国的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商周时代的都邑是杜宇王朝的都城。有学者从出土的铜器论证了金沙遗址属于杜宇时期蜀国的文化遗存^①,也有学者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相比较,认为玉璋为鱼凫祭南方之礼器,玉琮是杜宇祭地的礼器,两地蜀文化分别属于先后相承的两个时期的文化。^②任乃强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成都这个地名虽古今没有更变,它的城址却有多次迁移。”^③这里指出杜宇最早在成都建城,成都城址历史时期多有迁移,这些见解都是颇见功力的。

从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群来看,杜宇蜀国的成都城市位置在今成都市西部偏南,城市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现已发掘的遗址遗迹和相关出土文物表明,城市内部具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金沙遗址“梅苑”东北部出土有大量祭祀礼仪性用器,可能是都城的宗教仪式活动区;与金沙遗址隔摸底河相望的黄忠村遗址发现了大型房址,最大一处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里应是当时城市的重

① 赵殿增:《竹瓦街铜器群与杜宇氏蜀国》,《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李复华:《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5期。

③ 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要居住区;金沙遗址“兰苑”一带发现房址和墓葬,应是都城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在金沙遗址以东的十二桥遗址发现了竹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其中有大型建筑基址,这里有可能是都城的宫殿区。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杜宇成都的城市格局会逐渐明晰起来。从出土文物分析,宗教功能应是该城的重要功能之一;此外,这里也是当时蜀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所在,城市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与城市政治宗教功能相适应,军事防御功能也应是城市的功能之一,总的来讲,杜宇时期的都城成都是当时古蜀国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具有政治宗教军事等多项功能,应是区域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杜宇成都的城墙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杜宇成都城市的城墙,但就各方面分析,这一都城当时有可能筑有城墙。成都平原已发现宝墩等史前城址8座,每个皆筑有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墙高大,且与河流共同组成防御系统。杜宇成都所属的十二桥文化是与古蜀国的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的,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相互间的继承发展线索清晰。“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其中如金人面像、金射鱼纹带、铜立人像……等都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可以找到造型风格一致、图案纹饰相同的器物,这些都反映出金沙村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①联想到三星堆的城墙以及城市的防御系统,我们可以推想杜宇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应建有坚固的城墙,且有可能像三星堆古城一样,城市邻水而建,有河流从都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城中流过。这一点也可从十二桥遗址等成都商周文化遗址多临近古河道旁,后受洪水侵害得到一定的证明。^①

杜宇成都的废弃应该与自然灾害和军事战争有关。据《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反映,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发生洪水,杜宇成都城市遭受水灾。这从考古发现的遗迹可得到说明,“十二桥木结构建筑的废弃,推测与洪水有关”,许多建筑构件均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倒塌,“地层中也明显出现洪水冲积层,出土遗物上也多见洪水冲刷的痕迹”。^② 根据前文的相关分析,杜宇蜀国在遭遇水灾之后,开明通过残酷战争取杜宇而代之,杜宇成都的废弃可能与此相关。因为从成都的考古文化遗存来看,十二桥文化与其后的上汪家拐遗址文化之间有一段时期的缺环。

过去,我们依据文献,可将成都的建城历史推定在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成都市十二桥等商周遗址的不断发现,特别是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对成都的建城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成都城市的历史始于商代晚期杜宇开始统治蜀国之时。成都“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成为成都平原的一大都会。根据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可以推测,成都的城市最初是在今市区的西北,由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和逐渐扩展,到了唐代末期才发展到了两江交汇处。金沙村遗址——蜀开明王城——秦汉的大、少城——唐末以后的罗城——现代的都城,就是成都城市发展的足迹。”^③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成都是我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①,其历史非常悠久,其城市起源可追溯到 4000 多年前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早在商代晚期,古蜀国的杜宇王朝已开始在这里正式建筑城市以作为国都,由此推算,成都城市的建城历史距今已有 3000 年左右。

这里还要附带提及一点,那就是郫邑、瞿上与杜宇成都的关系问题。从杜宇王朝的历时和杜宇成都的兴废基本一致推测,杜宇王朝以成都为都城,同时以郫邑和瞿上作为陪都,或者说以成都为都城的同时,郫邑和瞿上只是杜宇蜀国的另外两个重要城市而已,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杜宇族人先以郫邑为都邑,后又以瞿上作为都邑,这时杜宇尚未取代鱼凫为蜀国统治者,待取鱼凫而代之,新筑成都作为都城,此时郫邑和瞿上或弃而不用,或仅作为蜀国的一般城市仍在继续使用。这些推断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证实。

^① 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九章 开明时期蜀国城市的发展

杜宇之后,开明氏执掌蜀国政权。这一时期,古蜀国社会经济较前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关于开明王朝时期蜀国的历史,诸多文献都有较为详细的反映。成都平原战国墓葬的发掘、成都市羊子山土台和大型船棺葬等战国时期历史文物的出土,为揭示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结合相关的考古资料,可对开明蜀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包括城市的建置和分布等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

一 开明王权的更替

关于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权更替的历史情况,文献记载线索较为清晰,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写道:

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杜宇)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

张仪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①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反映的开明蜀国的王权变更也较为清楚：

会有水灾，其(杜宇)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名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据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②

开明取代杜宇，建立蜀国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代，最后为秦所灭。关于开明王朝的时间跨度，我们可大致推算出来。秦灭巴蜀的时间，《华阳国志》记作周慎靓王五年，司马迁在《史记》的《秦本纪》和《六国年表》中都记为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两书表述虽有差异，但时间完全一致，即秦灭蜀国发生在公元前316年。^③以公元前316年为基点向前倒推，开明王蜀共十二代，其取

① (汉)扬雄著，马怡整理：《蜀王本纪》，载孙家洲主编：《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③ 关于秦灭蜀国的时间，《史记》各篇记载有些出入，《秦本纪》和《六国年表》记作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张仪列传》则记作秦惠文王前元九年即前329年，结合《华阳国志》的记载，可认定秦灭蜀当在前316年，《张仪列传》记载可能有误。

代杜宇统治蜀国开始的时间大约应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杜宇王朝后期,蜀地适逢水灾,开明氏趁此起兵取而代之,史书中所述杜宇禅位开明鳖灵之事不足为信,“这一取代过程,无疑是充满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的。”^①开明王蜀时期,历经十二代统治,而史书中提到名字的蜀王仅有四位:开国治蜀者鳖灵(鳖令),第二代卢,第三代保,还有徙治成都的开明尚。^②“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据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316年,秦国利用蜀国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巴国与蜀国间的政治军事对立,起兵伐蜀,消灭了开明蜀国政权并趁机灭掉巴国。秦灭巴蜀后,在其旧地逐步推行新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措施,巴蜀地区的人口也因为迁入迁出具有一定变化。《史记·三代世表·正义》云:“周衰,(蜀)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菑等处。”褚少孙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蒙文通、童恩正等肯定了这条材料的价值^③,这条材料似乎告诉我们杜宇族人在战败后的最终去向,他们在西汉时依然存在。

开明王朝时期蜀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疆域不断向北、向东、向南扩展,《华阳国志》中说“卢帝攻秦,至雍”,“(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樊”,领土北面曾到陕西关中,西南到今四川雅安,南

①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② 关于开明尚徙治成都,《华阳国志》记为开明九世,而《蜀王本纪》记为开明五世。

③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面到达四川宜宾和贵州北部;《蜀王本纪》中讲“蜀王据有巴蜀之地”,说明开明蜀国领土东面已越过嘉陵江,甚至与强大的楚国接壤。通过开明王朝多年的不断军事扩张,到战国时代,“开明王朝的国力比杜宇时期大大增强”,蜀国“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①

关于开明氏的族属,《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文献都记为荆人。然而多年来,学者们依据对文献的分析研究,并结合考古发现的遗迹和文献,对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开明氏属于楚人^②,有认为属于荆人^③,有认为属于巴人^④,有认为属于濮人^⑤,有认为属于崇庸人^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承认开明氏与原有的从蚕丛、鱼凫以至杜宇的蜀人不同。这一点也可从成都市杜宇时期的十二桥文化与其后的上汪家拐文化遗存(开明蜀国的文化遗存)差异较大并且前后考古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缺环等方面得到一些说明。^⑦ 开明氏以异族统治蜀国,为蜀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蜀国文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于开明氏原来与巴人、楚人在地域上相临近的地缘关系,其文化

①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3页。

② 李晓鹏:《蜀开明族文化性质初探》,载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③ 伏元杰:《蜀王开明氏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

④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3页。

⑤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6页;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载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⑥ 孙华:《蜀人渊源考》,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 江章华、王毅、张肇:《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也或多或少融入了楚文化和巴文化的成分,在开明统治蜀国时期,开明氏的融有巴楚文化的文化直接影响到了春秋战国以来蜀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蜀文化与巴文化差异在不断缩小,加之蜀、巴同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之中,相互之间文化影响也是势所必然,特别是战国时期蜀文化与巴文化逐渐趋同,巴蜀文化统一体渐渐开始形成。宋治民的《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一文,从考古学角度就开明治蜀以来蜀文化的演变做了专门分析,其论点值得借鉴:

至于荆人鳖灵入蜀统治蜀国,是在川西由异族统治的蜀国。……外来的巴人开明氏作为蜀国的统治集团,自然要带来巴人的文化因素,因之川西战国墓出土许多和巴人船棺葬相同的器物。……蜀国的居民大多应是原来的蜀族人,他们和统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族属,所以蜀文化的一些因素在战国时期仍然延续了下来。由于这时川西的蜀文化和巴文化有许多共性,因此有同志称之为巴蜀文化。^①

二 开明时期的蜀国城市

开明氏早在取代杜宇王朝成为蜀国统治集团以前,就已到达成都平原,并在今四川乐山一带建立城市。^②《水经注·江水》云:“(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南安即今乐山一带,这里有开明氏的故城,由此亦可看到开明族人的移动路线。此外,据《舆地纪胜》卷147的记载,在今四川芦山县有“开明王城”,这可能是又一处开明代杜宇入主蜀国前的城邑所

① 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②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在。开明氏统治蜀国时期,蜀国的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下的《广汉郡》中写道:“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这里的三都就是开明王朝时期古蜀国最为著名的三座城市,它们构成了开明蜀国城市体系的核心。

1. 成都

《蜀王本纪》记载开明五世“徙居成都”,而《华阳国志》则记为开明九世“徙治成都”,两处文献记载具有差异,孰对孰错难以断定,但开明王蜀时以成都为国都当属历史事实。开明氏以成都为都,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考古发现也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船棺墓葬是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的一种特有的丧葬习俗,已有不少考古发现^①,2000年7月以来,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所载开明“徙治成都”的真实性。该墓葬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墓坑长约30.5米,宽约20.3

①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80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文管会赵殿增、胡昌钰:《四川彭县发现船棺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市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三文均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米,面积约620平方米。据分析坑中葬具总量应超过35具,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达17具,其中大型棺木有4具,小型棺木有13具。墓葬地面建筑总长约38.5米,宽约20.5米,分前后两个部分。墓葬中出土文物有数百件,有青铜器、漆器、竹木器和陶器,尤以漆器文物价值最高。“该墓葬的年代应该是在战国早期偏晚,而与这个时间相对应的正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的晚期。”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多、规格高,“很有可能就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①

羊子山土台位于成都市北门外的驷马桥以北,是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存。^②土台是三级四方形,每层有登台土阶,三级皆用泥草制的土坯垒砌边墙,墙间填土夯实,台底103.6平方米,最上层31.6平方米,整个土台高出地面有10米以上,用土量超过7万立方米。报告认为土台“是观望、或者为集会、祀典之所”,林向则更准确地提出,该土台“可能之为祭坛”,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场所”。关于此土台的年代,简报提出其年代上限“当属于春秋前期到西周后期”,下限“最迟不能晚于战国末年”;林向认为土台“有可能是商代始建,至少要在殷末周初前”;^③孙华则提出了更为可信的结论:“羊子山土台与蜀开明氏王朝有密切的联系,土台的建立是在开明氏建都成都之时。……羊子山土台的废弃年代也应与蜀开明氏王朝的灭亡有关。……土台

① 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初析》,《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③ 林向:《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的废弃也应在这同时或在此后不久,最晚也不得晚于秦国所封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蜀侯被废、巴蜀完全改用郡县制之时。”^①

成都市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和羊子山土台等文化遗址都具有很高的规格,当与国都中的蜀王、王室成员以及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这些遗址不仅内涵丰富,并且和开明氏都于成都的时间基本一致,从而雄辩地说明了开明王朝时期以成都为蜀国国都的历史事实的存在。

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表明杜宇时期便在这里建立了都城。金沙遗址在今成都市西郊,而大型船棺葬、上汪家拐遗址等战国文化遗址都位于成都市的市区之内,由此可大致看出,开明氏所都成都与杜宇在成都的都城相比,位置已向东移动。开明时期,成都作为蜀国都城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据考古发掘显示,东周成都遗址的分布范围,由西向东约有5公里,从南到北约有3公里,面积可达约15平方公里。^② 段渝参照战国临淄故城面积和人口比例每户占地268平方米^③,推算出当时成都有户55970,人口279850,应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一个数据。^④ 开明成都城市应有明确的区域划分:《蜀王本纪》所载的青羊肆(今成都青羊宫附近)所在地有可能是当时的市场所处的城市的商业中心,羊子山土台周围地区应是当时城市的宗教祭祀区,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所在的商业街附近地区可能属于开明成都城市的墓葬区所在。

① 孙华:《羊子山土台考》,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罗开玉:《成都城的形成和秦的改建》,《成都文物》1989年第1期。

③ 马世之:《略论楚郢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④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开明成都不仅是古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都城的工商业也极其发达,构成了蜀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成都是开明蜀国手工业生产的中心,战国时期,成都已是蜀国漆器、织锦等的生产中心。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其种类繁多,器形精美,均为木胎漆器,髹黑漆再朱绘纹样,其绘画的技法基本是单线勾勒加平涂。”“表明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的漆器制作工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和同时期楚国出土的漆器相媲美。”^①墓葬中出土的这些漆器可能就是在成都生产的。开明成都设有专门的市场,商品贸易十分繁盛。《华阳国志·蜀志》云:“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阊,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里的“修整”,说明“阊”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市张列肆”反映出商业的兴盛,可以说,早在张若之前的开明时期的成都城内就应有专门的市场存在,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规模。^②

开明成都在城市性质和功能方面与其前古蜀国三星堆鱼凫王都和金沙杜宇成都已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三星堆王都和金沙成都除作为古蜀国政治权力中心外,宗教祭祀色彩极为浓厚。而开明成都作为蜀国政治中心和宗教祭祀中心外,更是蜀国工商业的经济中心。开明成都城市的宗教色彩在逐渐淡化,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在逐渐强化。古蜀国这种城市功能的渐变,可能与开明氏作为异族入主蜀国并引起蜀国文化融合和转变有密切关系。

这里还想提及与开明成都有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成都”名称

① 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初析》,《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②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的形成,二是开明时期成都的城墙。成都的名称出现得很早,至迟在战国晚期到秦代,“成都”一名就可在铭刻和典籍中找到,《蜀王本纪》等文献就记载开明蜀国时期以成都作为国都。关于成都得名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形成了至少7种见解。^①然而这些见解都是形成在金沙遗址发现以前,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重新认识成都城市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成都的得名是否与其有关,或者说,在开明成都以前,杜宇金沙成都作为成都建城的开始是否与成都得名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尚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

关于开明时期的成都是否有城墙存在,至今还是一个疑问,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有这一时期城墙的遗迹或线索。《华阳国志·蜀志》云:“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秦灭蜀后在开明成都的基础上兴建成都城墙,这似乎可说明原有的开明成都并没有城墙。各种迹象表明,开明成都城市本身并未建有土质城垣。我们知道,开明氏以异族文化融入古蜀文化当中,因而使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转变,开明时期的蜀文化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蜀文化有了较大差异。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和三星堆古城遗址来看,古蜀文化原来具有建筑城垣的历史传统,随着开明氏异族成为蜀国新的统治阶级,蜀国原有建筑城垣的筑城方式是否还会在开明氏新建的城市中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值得怀疑。再从开明氏原有文化的特点来看,其与巴楚文化关系密切或者说与巴楚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而巴楚早期城市都未筑有土质城垣(楚国在楚平王以前的西周和春秋早期的

^① 孙华:《成都得名考》,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城市未发现筑有土质城垣,巴文化考古至今也未发现城垣遗迹),这种筑城思想极有可能在开明成都的城市建设中得到了贯彻。李昊《创筑羊马城记》所谓“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明氏所修筑成都的实际情况。

2. 广都和新都

广都是开明统治蜀国前期重要的都城。扬雄在《蜀王本纪》里写道:“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提出开明尚是从广都将都城迁徙到了成都,据此来看,显然在徙居成都以前,广都是开明蜀国的都城所在。《华阳国志·蜀志》则在记载九世开明帝之后说:“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其中仅言开明尚“徙治成都”,而并未提及从何处早期都城(开明尚时开明氏建国已历多代)移治成都。对此,难免让人颇多推测。

顾颉刚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中分析认为:“《华阳国志·蜀志》所以不言广都者,盖已言杜宇治瞿上之故。”^①据考证,杜宇瞿上城在今双流境内。^②鳖灵率开明氏族人从乐山溯江而上,以武力战胜杜宇,入主蜀国为统治者,并在杜宇蜀国郫邑之后的瞿上一带继续为都,定居广都樊乡,后经多代,开明尚时迁都成都。^③正如学者所分析:“开明氏建国之初,原定居广都樊乡,大约在战

①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顾颉刚:《双流游记》,载四川省教育厅编《文史教学》创刊号,1941年4月30日出版;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③ 罗泌在《路史·余论》卷1记载:“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提出开明尚是从郫邑徙居成都的,郫邑是开明蜀国的早期的都城。应该说,杜宇时期曾都于郫邑,后治瞿上,开明取代杜宇之后,最大的可能是以郫邑之后的瞿上古城继续为都,故本文中以开明尚从广都徙治成都为是。

国前期,迁到成都。”^①如此说来,开明蜀国早期都城广都就是杜宇时期的瞿上城,从瞿上到广都,只是政权和城市名称发生了改变,城市本身并未发生移动等质的变化,城市发展具有连续性,像瞿上城一样,广都也应在今四川双流境内。目前,我们对于开明蜀国广都的认识主要依据的是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对此,尚须得到考古资料的有力证明。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蜀国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新都是蜀国又一重要的城市。但新都的具体情况,历史文献中并未提及。1981年新都马家场战国木椁墓的发现和发掘,佐证了新都作为开明蜀国城市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战国木椁墓可能与开明氏贵族或王族甚至蜀王有关,发掘报告认为墓主人“是古蜀国国王……属于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的可能性较大。”^②还有学者专门对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文字符号进行释读,将其中的两个文字符号释为“开明”。^③从新都木椁墓的发掘报告来看,新都作为蜀国城市在开明王朝的后期依然继续存在。

开明时期,蜀国城市已粗具规模和体系。地处成都平原腹地地带的成都、广都和新都构成了其城市体系的核心,故有“三都”、“名城”的出现,并且三都又互为掎角之势,相互依托和补充,形成多都城系统。在三都和整个蜀国城市体系中,成都无疑是其中心和核心,成都城市规模宏大,是蜀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的中心所在。以成都和三都为基点,古蜀国城市呈辐射状向四周分布甚至到达极远的地方,开明蜀国政权通过这些城市和城市网络,对

①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74页。

②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③ 冯广宏:《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载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其领土实行着有效的管理。

3. 一般城市

开明蜀国的城市除上面提到的以外,我们还可从极其有限的文献记载及相关考古资料中窥其一斑:

郫邑:《蜀王本纪》记载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据此可知郫邑曾为杜宇蜀国的都城。又据《华阳国志》可知,秦灭蜀后曾建郫城,“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后又设置郫县。郫县、郫城、郫邑当在同一位置,为一个城市的连续发展,郫邑在开明时期应为蜀国的一个重要城市,具体位置可能在彭州濛阳、竹瓦、清白等地(青白江、濛阳河流经地区)。^①

葭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名其邑曰葭萌焉。”苴侯封地从广元以达汉中,筑城以治,城因其名而名。葭萌城地处蜀国北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城军事功能极为突出。据《华阳国志》,“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国趁此起兵灭蜀,“蜀王自于葭萌据之,败绩”。由此可见,葭萌城为开明蜀国的军事要塞,城市军事功能突出,可能筑有坚固城防。据考证,葭萌故城位置应在今嘉陵江与白龙江交汇处西南的广元至昭化一带。^②

南郑:据《史记》的《秦本纪》和《六国年表》等的记载(“南郑县,郡治。周贞王十八年,秦厉公城之。有池水,从旱山来入沔。

① 陈剑:《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② 可参考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51页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注。

大姓李、郑、赵氏。”^①),南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代城市,建城时间很早,而这里在东周中叶以前曾是蜀国的地方,这里可能曾是开明蜀国的一座重要城市。^② 作为开明蜀国的边陲城市,城市的军事功能当较为突出。

严道古城:据考古发掘,在今四川荣经县城以西发现并发掘了严道古城。此外,这里出土有大量巴蜀墓葬,时间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据分析:该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兴盛于战国秦汉,衰落于魏晋。^③ 这里在春秋晚期建城并有同期墓葬,地域范围又在开明蜀国版图之内,由此推论,这里可能属于开明氏蜀国的一处城市所在。^④ 又据《史记·樗里子传》记载,秦惠王二十六年(前312年),“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索隐》云:“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秦时建置严道县当是对开明蜀国古城的沿袭利用。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汉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赵殿增、李晓鸥、陈显双:《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第十章 巴国城市的发展

巴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历史时期曾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现今的土家族就与其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①巴人经多次迁徙,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川东长江和嘉陵江两岸河谷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巴国。古代巴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地方特色,城市发展也是如此。关于巴国的城市,相关考古工作虽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可依据历史文献的简略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所提供的零星线索,形成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 巴族迁移和巴国城市

四川盆地东部为平行岭谷地区,这一地区气候湿润,其中的谷地特别是长江沿岸和嘉陵江等河流沿岸的谷地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植被、鱼类等自然资源丰富,是适合早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良好处所。早在距今 200 多万年前,就有“巫山猿人”在此生活,到了新石器时代,这里更是早期先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有学

^① 潘光旦早在 1955 年撰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刊载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 4 辑,1955 年 11 月版,第 1—134 页)提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论证了湘西北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历史渊源关系。

者将峡江地区(指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以东、西陵峡以西的沿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考古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为4个大期即4种考古学文化:从史前时期的哨棚嘴文化(以谡井口第一期遗存为代表,时间在前3500—前2500年)中经三星堆文化(以谡井口第二期遗存为代表,时间在前1800—前1250年)和十二桥文化(以谡井口第三期遗存为代表,时间在前1250—前1000年),再到瓦渣地文化(以谡井口第四期遗存为代表,时间在前1000—前400年)。^①由此可以看出,川东河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在巴人进入这里以前,先民们就在此创造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巴人入主以后,这里为巴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巴族文化的辉煌和社会的进步在此区域达到了其历史的最高水平。

1. 民族迁移与社会演进

关于巴人的起源,《山海经》、《世本》、《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皆有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麋。有巴遂山,澠水出焉。

《山海经》之《海内南经》又有一处提到了“巴”: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① 孙华:《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世本》一书早佚,然后世文献多有引用,从中可看到该书有关巴人的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引)

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善注所引)

廪君种不知何代。(《太平寰宇记》卷168所引)

《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的起源有专门的叙述: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圉,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圉,圉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①

以上文献对于巴族起源的记载存在一些分歧,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以及对文献的不同诠释,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关于巴人起源的观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9种观点^②:一是主要根据《世本》关于廩君的记载,认为巴人起源于廩君活动的湖北清江流域,后溯清江而上到达川东并建立巴国,曾向东扩展到湖北西北部^③;二是依据《山海经》的记载,认为太昊即西方的伏羲,提出巴人最早活动于今甘肃东部,后沿汉水和嘉陵江而下,到达川东和鄂西,建立巴国^④;三是认为《山海经》所载太昊为东夷族,认为巴人起源与东夷族系相关^⑤,进而提出巴人为东夷中徐夷的分支,最早居于安徽淮水流域,商代迁到晋东南一带,与樊、相、郑、暋等四姓结盟,形成巴族,周灭商后,巴人南移至汉水中上游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徙入川东^⑥;四是认为巴人有东、西两源,但巴族的形成是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⑦;五是主张巴人是以蛇为图腾的古族,从岭

①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② 田敏:《先秦巴族族源综论》,《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孙华:《巴人溯源考》,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8页。

③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1页;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86—89页。

④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1955年版,第58—59页;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 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廩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⑥ 杨铭:《巴人源出东夷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又载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巴渝文化》第4辑,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李绍明:《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

南进入长江流域后先活动于洞庭湖一带,后迁徙到巫峡地区发展盐业,最后发展到川东地区^①;六是提出文献中所载“西南巴国”、“丹山之巴”、“伐纣之巴”和廩君巴等,“尽管他们同有巴名,但其民族既不同,也不在同一地区,而又各有君主,显然各是一国”,“古代的巴非止一国,古代巴人,也不是一源”^②;七是依据相关方志及史书的记载,认为巴州(今四川巴中)是古代巴国的中心,巴人起源于此,国都亦建于此^③;八是主张巴族起源并形成于三峡地区,后向外拓展疆土,建立巴国^④;九是根据《左传》、《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的记载,确定巴族与汉水中上游地区密切相关。^⑤

以上诸多观点中以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说和早期活动于汉水中上游说最具影响。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记载,巴人始于清江流域之廩君传说,然而正如《世本》所云“廩君种不知何代”,廩君传说缺乏时间坐标,到底是这里的巴人后迁移到其他地方,还是其他地方的巴人后迁移到这里,巴人源于清江流域

①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250页。

② 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蒙默等编:《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0页。

③ 周集云:《关于古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南充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④ 管维良主编:《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0页。

⑤ 童书业提出春秋时期的巴国当在楚西北的汉水流域(《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243页);燕庄和认为甲骨文中的“巴方”在陕西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川北、川东、湖北清江流域等处的巴人可能是陕西汉水流域巴人向东南迁徙的结果(《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段渝主张巴与周同为姬姓,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后向南发展(《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206页);田敏则明确提出巴族应起源于汉水上中游地区(《先秦巴族族源综论》,《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

说无法给予确切的证明。并且这种观点无法对于商周时期巴人在汉水流域以及鄂东的频繁活动等情况给予合理的解释。比较而言,倒是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中上游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既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又对于历史时期巴人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能给予合理充分的说明。

早在商代,“巴方”就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据考证,一般认为其地理位置在汉水的上游。“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①周武王克商,巴人参加并立下赫赫战功,并以宗姬封于巴。春秋战国时代,从各种史书的记载来看,巴人活动的区域有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地区、鄂西南的清江流域以及湘西的五溪和贵州北部地区。“从时间的先后次序分析,从地理位置看,川北、川东等地的巴人,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贵州乌江遵义一带的巴人,很可能是陕西汉水流域的巴人向东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他们可能是‘巴方’的后裔。”^②

西周初年,巴受周王分封为姬姓诸侯国之一。《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时期,巴国“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③,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进而开始向外扩张,后受楚的阻力,被迫放弃汉水上游的故土,南下川东,以图新的发展。战国时代,巴国东西分别受到楚国和蜀国的战争威胁,政局动荡,多次被迫迁徙都城。“楚主夏盟,秦擅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② 燕庄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③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①战国中期以后,巴国接连遭到来自东面的楚国的军事进攻,只得从川东退保阆中,直至前316年为秦所灭。关于巴国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写道:“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即疆域东到今重庆奉节,西到四川宜宾,北接今陕西汉中,南达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的交界一带。^②这一疆域仅是巴国历史时期曾经到达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巴国的疆域范围随着巴族的迁移和国家的盛衰,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其疆域变化大体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川、鄂之间。战国时代,进入川东,兼及与鄂、湘、黔相邻之地。”这一历史过程既可从文献上得到说明,也可得到相关考古发现资料的验证。^③

2. 巴国的城市

西周初年,巴受封为姬姓诸侯国之一;春秋战国之际,巴国处于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战国中后期,巴为秦所灭。关于历史时期巴国的城市,仅《华阳国志》有简单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④这里提到的5个城市只是战国时期巴国的都城而已,有关战国以前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② 刘琳在其文后注文中将巴国的疆域进一步解释为:“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极贵州思南一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页注)

③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206页。

④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巴国的城市却未有只字提及。此外,有学者提出在今四川巴中的古代巴州,巴人曾起源于此并建有国都。^① 这一意见主要是依据对相关方志记载的分析,尚未得到其他文献资料或实物资料的证明,因而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同。不过,从理论上讲,除了《华阳国志》提到的几座城市外,巴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应该建有很多城市。“巴国应该有城,且城市不止一座两座,当拥有很多的城。”^② 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欠缺,关于巴国城市的整体的和具体的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对于巴国城市的系统全面的认识只能有待于相关考古工作的发现和发掘了。近年来,随着云阳李家坝^③、开县余家坝^④和宣汉罗家坝^⑤等遗址的发掘,巴文化的面貌渐渐清晰起来,然而巴国城址至今尚未发现。专家认为,罗家坝遗址“应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地位”,发掘工作应“注意寻找同墓葬对等的大型建筑,探索有无城、壕等防御设施和祭祀遗迹”。^⑥ 可以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关于巴国城市发展的材料会逐渐丰富起来。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

① 周集云:《关于古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南充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② 杨华:《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下)》,《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管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陈淑卿、王芬:《重庆余家坝巴人墓地的发掘收获》,《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⑤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州地区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⑥ 《罗家坝遗址笔谈》,《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邑。邑曰筑,都曰城。”^①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巴国“都江州”、“治垫江”、“治平都”、“治阆中”、“先王陵墓多在枳”,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这5座城市应是巴国的都城,“都”、“治”、“多先王陵墓”已完全表明了这些城市的都城地位。应该看到,这些都城的建立是有先后之分的,并且与巴人的迁移和国力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先王陵墓多在枳”,可说明枳是巴国较早时期的国都;由于受到楚国的军事压力,巴人逐渐从川东长江河谷地带向嘉陵江沿岸由南向北移动,最后以阆中为中心直至为秦所灭,从中可看出阆中作为巴国都城建立要偏晚一些。战国时期巴国的这些国都城市皆沿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分布(见图10—1),这是与川东地形和巴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的。需要说明的是,从巴国都城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密集分布来看,巴国当时有可能实行的是多都制,这也与郡县制推行以前早期城市国家形态以国都城市为社会中心的发展模式相一致。

有学者提出:“江州是川东巴国惟一的政治中心,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二个首都”;垫江是巴国当时的一大重镇;平都是巴国的宗教中心和圣地,是一军事重镇和军需供应基地,“至多具有行都、陪都的作用”;阆中是巴国控制北土的中心地点,仅当“楚国攻陷江州以后,巴国统治者逃窜到那里,作为自己的都城”。^②这些论断是与其所主张的巴族起源于三峡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国家向外拓展的观点相一致的,然而这一意见没有对巴人的迁移和巴国疆域的历史变化给予更为充分的考虑,且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因而结论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要获得一定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2页。

② 管维良主编:《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

的认同尚需做进一步的证实。

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到的 5 座城市是战国时期巴国的 5 个都城,也是我们仅知的巴国在历史时期的几座城市,目前,关于这些城市的考古工作尚未系统开展,这里主要依据文献中的零星记载,结合已有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和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城市的发展状况简单总结如下^①:

(1) 江州

江州是战国时期巴国的都城,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之处,具体位置应在今重庆市区附近。《輿地纪胜》卷 175 记江州古城云:“在巴县南五十步,东西十五步。《地理志》云:周武王克商,封同姓为巴子,遂都此地,因险固以置城邑,并在高岗之上。”这里提到西周时期巴国即在此建都,此说欠妥,因这一时期巴国的中心尚未到此地域。《华阳国志》记载战国之时巴都于此,与巴人这一时期的地域范围相一致,可信。《华阳国志·巴志》云“仪城江州”,《輿地纪胜》卷 175 又载“古江州城,东接(渝)州城,西接(巴)县城”,《巴中记》云:张仪所筑”。从秦灭巴后建筑城垣来看,巴国时期的江州都城可能未筑有城垣,在川东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巴国 5 座都城所在地至今没有发现秦以前的城垣遗迹。《华阳国志》还写道:“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水经注·江水》云:“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据学者考证,其地为今天重庆的小南海,也就是说,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6—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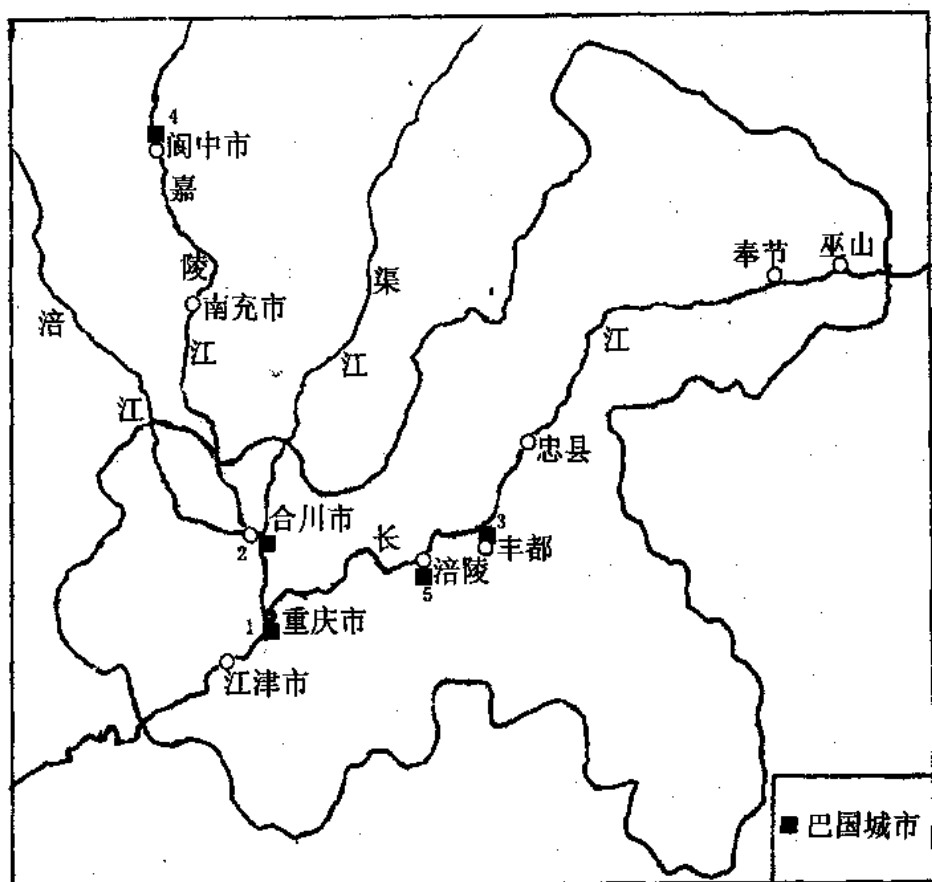


图 10—1 巴国城市分布示意图

1. 江州；2. 垫江；3. 丰都；4. 阆中；5. 枳

都城江州附近已设有官市。^①加之这一时期巴蜀“桥形币”(形制如璜,铜质)的普遍出土,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巴国都城江州“已具有组织地区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同时也建有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官方职能机构”,^②作为国都,江州除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外,城

①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②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市的经济功能也非常突出。

(2) 垫江

垫江是战国时代巴国的又一都城。《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或治垫江”，也就是说曾以垫江为国都。《史记·张仪列传》之《正义》引《括地志》曰：“巴子城在合川石镜县南五里，故垫江县也。”民国《合川县志》引雍正《四川通志》曰：“今（合州）州治之南，地名水南，俗谓之故城口，即巴子别都也。”据考证，今合川南津街，又称南坝，传说有古城，可能与巴国都城垫江的具体位置有关。垫江都城也可能未筑有城垣。^①

(3) 平都

战国时期巴国都城之一，《华阳国志·巴志》载“或治平都”，在文献所载5座都城中，建城时间应较早，与巴人逐渐西移北上应有关系，像巴国其他都城一样，平都亦应没有土质城垣建筑，具体位置在长江南岸今重庆丰都境内。

(4) 阆中

巴国晚期都城所在，巴国“后治阆中”，以阆中为都；秦灭巴，“执王以归”^②，亦当发生于巴国都城阆中。《舆地纪胜》卷185载：“《九域志》云：阆中古城本张仪筑也。《图经》云：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遂筑此城，今仪庙存焉。”从秦灭巴后在阆中建筑城垣来看，巴都阆中并未建有城垣。巴人都于阆中，是与其受到楚国挤压有关。巴人从川东长江两岸地区沿嘉陵江自南而北迁移，最后建都阆中，以图退保川西北。巴都阆中地处嘉陵江中上游，今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8页注。

②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属四川阆中市。《通典》载：“阆中城名曰高城，前临阆水，却据连岗。”据考证，旧城具体位置在“今城东北蟠龙山尾清真寺附近”，因地处高处，故曰“高城”。^①据实地考察，阆中城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该城三面环水，山环水绕，被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嘉陵江在此河床下陷速度较快，河水不断向西侧蚀，加之河水水量历史时期以来渐渐减少，城市概为取水、交通等的方便，不断随之逐渐下移。原巴都旧城在今城东部蟠龙山山麓的巴巴寺附近，可想当年巴都阆中亦山环水复，临近嘉陵江水面，巴人尽情享受自然河水带给的生产、生活和交通的极大便利。由此亦可看出，巴人在都城选址方面所具有的非凡智慧。

(5) 枳

枳为战国时期巴国的都城之一，地处长江南岸今重庆涪陵境内。^②由《巴志》“先王陵墓多在枳”分析，这里作为巴都建都较早，其所处地理位置也与巴人的迁移路线相一致；巴王陵墓多，说明了枳作为都城使用的时间相对较长。巴人后期以阆中为中心退保一隅，为秦所灭后，一些巴族统治者退处于枳，然而此后枳又为楚攻占，继而秦国随之消灭了楚国，故史书云：“楚得枳而国亡”。^③巴都枳应像其他巴国城市一样，没有土质城垣建筑。多年来，涪陵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期的巴国文物，特别是大量战国墓葬的发现，与文献所载“先王陵墓多在枳”相合，而城址至今尚未发

①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注。又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版）引蒙文通文认为：巴都阆中故城在今阆中县西。

② 任乃强认为，枳今名就是冬笋坝。（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重庆》，《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3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

现,涪陵巴文化遗址极可能与巴国都于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①

二 环境、文化与巴国城市

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对巴国城市发展的认识还极为有限。巴国城市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不过,从《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巴国的城市已经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巴国业已形成,社会已处在文明阶段。这一时期的巴国城市由于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特点。秦灭巴国设置郡县,将川东巴地的城市发展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古蜀国城市发展有所不同,到战国时期,巴国城市规模依然较小,巴国城市不筑城垣而树木栅,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较为明显。巴国的城市发展在空间分布、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展现出了较为显著的区域特征。

1. 巴国城市的特点

从仅知的几座战国时期的巴国城市来看,城市都分布于河流沿岸。平都和枳分布于长江沿岸地区,阆中和垫江分布于嘉陵江沿岸地带,并且垫江是处于渠江、涪江和嘉陵江的交汇之地,江州则处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之处。这些城市选建在河流两岸的冲积地带,既濒临河流,便于交通、生活、渔业捕捞和商业贸易,又处在土壤相对肥沃的河流冲积地带,便于区域农业生产的发展。这

^① 《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1期;邓少琴:《四川涪陵新出土的错金编钟》,《文物》1974年第12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种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和具体选址与早期人类对于一般聚落和城市的地理选择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巴国地处缺少较大平原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城市选建在临近河流的平坝地带无疑是其最佳选择,从而使得巴国城市的这一特点更为显著。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来说,巴国城市未建有土质城垣,这也构成了巴国城市建设的特点之一。^①《史记·张仪列传》索引云:“芭黎,即织木葺以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芭篱,即篱芭,用竹、木等木质材料构筑成的围墙。巴国城市未建土质城垣,可能仅在城市四周树立篱芭,以作为城市的界标。“巴国都城不筑城垣,以木栅为城市界标,这与春秋楚平王以前楚都的情况恰巧一致。”^②巴国都城的木栅充当了“城垣”的作用,“虽说一是‘木栅栏’,一是‘土城垣’,其建筑采用的原材料不同,但其用途和性能则是一样的。”^③由于川东河流两岸的平地一般较为狭小,由此可能导致巴人的城市一般规模不会太大;巴国多战争和巴人多迁移的状况也可能使得不宜建立规模较大的城市。此外,巴国城市所处地形一般不甚平整,有可能其城市内部的规划和建设依地势而起伏,众多建筑分布高低不一,错落有致,有可能开了重庆地区山城建设的先河。

① 巴文化考古中至今尚未发现巴国城垣遗迹,笔者曾就此问题向从事三峡考古的蒋晓春先生请教,他提出尚未发现巴国城垣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汉代以后三峡地区的城市多选择在地势险要之处,部分地段筑有城墙,有天然屏障处则无城墙,是否有这种可能:巴人选择的地方本是易守难攻的险要处,而不需另筑城垣。同时,三峡地区由于河流和水土流失等原因,遗址往往破坏十分严重,造成城垣遗迹未能发现,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②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③ 杨华:《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重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从城市功能来看,战国时期的巴国城市首先是巴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巴人的迁移和巴国政治重心的转移,作为权力中心的都城也随之发生变化。巴国城市的军事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尚武的巴人以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来保障其政治权力的中心功能。“巴以国都为中心所形成的城市,政治军事性质最为突出,而尤具军事重镇的特征。”^①早期的战争以城市的争夺为核心,秦灭巴国后,残余的巴族贵族退保于枳,后楚灭巴也是以对枳的占领作为标志。巴国的城市处于河流沿岸,城市的对外交通较为方便,因而城市的商贸功能应有一定的发展。作为巴国区域之中心,都城的手工业生产和其他经济生产应有一定发展,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应有一定体现。就目前所知,巴国城市的宗教文化功能不甚突出,远不如川西平原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宗教文化色彩的浓厚。已有的巴文化考古至今未发现大量祭祀遗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②

2. 环境与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战国时期,巴国城市的发展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区域特征。这些城市特征的形成,既与巴人历史时期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巴族民族文化的尚武精神和建筑传统具有充分的联系。

春秋战国之际,巴人进入川东的峡江地区。随后,巴国在川东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巴国的都城来看,巴国城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相关。川

①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② 《罗家坝遗址笔谈》,《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东地区地形为平行岭谷,主要由多条东北—西南走向的背斜山地和向斜谷地组成。背斜山地海拔多在1000—1200米,向斜谷地海拔一般不超过200—300米,宽度可达10—30公里。向斜谷地多为局部平原与低丘缓岗,特别是在河流经过的两岸地区,土壤相对肥沃,适宜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①长江自西向东在川东地区南部将平行岭谷地貌切割通过,两岸地区间或形成冲积坝地,这些相对平坦的邻水地带无疑对于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古代巴国的城市就分布于川东地区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河谷地带,城市选建于临河局部平原或较为平坦的台地,这反映出巴人对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充分认识和合理利用。由于川东河谷地带一般较为狭小,因而可能影响到在这里所建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城市规模一般不会太大,城市布局一般不甚规整。

川东河谷地带特别是峡江地区气候湿润,树木茂盛,用材方便;而另一方面,平坝土地相对狭窄,取土较为不便,这种自然状况可能对巴国城市未筑土质城垣而仅筑木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巴国之前,峡江地区的早期城邑就未有城垣建筑而是树立木栅以为屏障。宜昌中堡岛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发现有多条沟槽遗迹,最长者有60余米,宽0.3—0.5米,深0.6—1.1米,沟段内发现人工夯筑痕迹。“中堡岛遗址的沟槽遗迹,可能与云南佤族部落的防御工事一样,是用大量的木植物及木桩(柱)等栽入沟槽内,然后进行捆绑编扎,并将基部用土进行夯打,从而形成了数道牢固的防御工事。”^②与巴国相邻的楚国,其早期城市没有

^① 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3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6—231页。

^② 杨华:《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重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使用土质城垣,而是建有木栅作为城市界标。在古代日本,也曾出现“栅城”形式。^① 这些木栅作为城市城垣的替代品的出现,与其当地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战国时期巴国都城以木栅作为城市的界标和防御工事,当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巴人在城市建设方面适应和利用自然的体现。

巴国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也对其城市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国到达川东以后,东面有楚国,西面有蜀国,两国势力较为强大,成为巴国最大的威胁。战国时期,巴国受到来自东面楚国、北面秦国的军事压迫,处在战争频繁的环境当中,加之政局动荡,且有不时迁移的可能,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巴国不可能有大量人力和长久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城垣建设,仅能以木栅作为城市的防御屏障而已。这种人文环境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巴国城市建设的规模、城市建筑的质量以及城市的功能等。^②

战国时期巴国城市特征的形成还可能与巴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巴人长期生活在河流沿岸区域,其生产生活方式多具有流动不定的特点,这可能使得其城市修建呈现出仅以木质篱笆围墙为屏障、城市规模相对较小等特色。此外,如文献记载,“巴人天性劲勇”、“巴师勇锐”,^③巴族具有崇尚武力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烈向外扩张的愿望,并将其不断付诸军事行动,这一点从考古

① 李祖德:《关于中国与日本的城》,《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巴国虽受到战争的威胁,但因其所在地理环境独特,北面有米仓山、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东面长江瞿塘峡两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简单防御工事即可,故巴国城市无需建筑高大土质城垣。(杨华:《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下)》,《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③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出土的大量巴人兵器中可得到一定的证明。^① 对于有崇尚武力传统的民族来说,一般以其武力炫耀于人,不愿建筑高大城垣。如历史时期蒙古族以其武力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元朝,就不主张修筑城垣以为防御屏障,而其后的明朝则大修城垣作为防御工事。对于尚武的巴族来说,其城市建设可能也因其这种民族精神和传统而未有修筑城垣的习惯。由于长期向外扩张的愿望和行为,巴国城市的规模和功能可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巴族尚武”,“也有强烈的扩张愿望,并付诸频繁的军事行动”,因此,战国时代巴国城市不筑高大城垣,“当不奇怪”。^②

① 刘豫川、邹后曦:《重庆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载《巴渝文化》第4辑,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刘豫川:《从三峡库区文物考古成果看重庆地区史前和先秦历史的新轮廓》,载孟广涵主编:《历史科学与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第十一章 巴蜀郡县城市的发展

公元前316年,秦灭掉了巴、蜀两个古国并逐渐在此推行新的管理制度,郡县制度的实施,使这一地区的城市数量大大增加,促进了巴蜀地区城市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巴蜀地区的发展开始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之中,由此,巴蜀地区的社会历史迈入了新的时期。这里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已有的相关考古资料,试对巴蜀郡县城市发展做出初步探讨。

一 巴蜀郡县的设立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显王时,巴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周慎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秦利用蜀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巴、蜀两国的战争,先后灭掉了蜀国和巴国。此后,在巴蜀地区逐渐推行秦国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郡县制度的实施。从文献反映的信息来看,秦国在巴蜀实行郡县制度以前曾有一段时期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对巴蜀实施的是分封的羁縻政策。秦灭蜀后,曾先后分封蜀王之后通、恽、绾三

任蜀侯。“（赧王）十五年，王封其（蜀侯恽）子綰为蜀侯。……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①直至周赧王三十年即公元前 285 年蜀侯被废，分封制方在蜀地结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关于秦灭巴后对其地的分封管理情况，《华阳国志》虽没有直接记载，但从《后汉书》的这则资料来看，秦对巴实施的也是分封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巴、蜀之后并不是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随即开始在该地推行郡县制度^②，而是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一般认为秦国在蜀地设郡应当在周赧王三十年即秦昭王二十四年（前 285 年）最后一任蜀侯被废以后。^③巴郡的设置是在蜀郡之后^④，孙华认为《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秦昭王时期的“开巴蜀”，“就是在巴蜀地区推行秦国的制度，巴郡和蜀郡的设置也应就在秦昭王之时”^⑤，更有学者据《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即公元前 277 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进而将秦设巴郡的时间确定在这一年。^⑥（据《史记·秦本纪》，是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

①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② 刘师培：《秦郡建置沿革考》，载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 1 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6—87 页；王国维：《秦郡考》，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8—343 页。

③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80 页；孙机：《巴蜀为郡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④ 也有学者主张秦灭巴后即设立了巴郡。可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9 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5 年版。

⑤ 孙机：《巴蜀为郡考》，载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3—378 页。

⑥ 孙机：《巴蜀为郡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2 期。

南,为黔中郡^①)可以明确的是:秦在灭巴蜀之后、统一全国之前,已经在巴蜀地区全面推行了郡县制度。

战国晚期直至秦大一统帝国建立,秦在其所统治的巴、蜀故地分设蜀郡、巴郡和汉中郡三郡,并在郡下设县,全面推行郡县行政制度。有人据《华阳国志》卷1《巴志》的记载,认为秦国在巴、蜀故地的巴、蜀及汉中三郡之下建置有31县^②;有的据《汉书·高帝纪》刘邦为汉王,王巴、蜀和汉中三郡共41县,认为秦置三郡时当有41县^③;有人主张巴、蜀和汉中三郡初置31县,以后不断新置,秦末已达41县;还有人提出秦时巴、蜀及汉中三郡至少有46县(估计在50县左右)。^④巴、蜀故地三郡下设属县的名称已不可尽知,马非百的《秦集史·郡县志》指出25县的名称^⑤,罗开玉又增考14县,共可知39县,其中有巴郡属县12个,蜀郡属县19个。^⑥

郡治所在地应为该郡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县治所在一般应算得上城市聚落并同时属该县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郡县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县的设立,促进了所在区域城市网络的形成,将城市发展的历史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蜀郡以成都为郡治,巴郡郡治江州,成都和江州分别构成蜀郡和巴郡的中心城市,郡县制度在

①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875页。

②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2—34页。刘琳据《元和郡县志》卷33、《太平寰宇记》卷86、《舆地纪胜》卷185、《路史前纪·太昊纪》注等引用《华阳国志·巴志》作“分其地为31县”。

③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④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⑤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⑥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巴、蜀故地的推行,不仅使该地城市数量较前增加,区域城市分布密度加大,城市网络开始形成,而且使巴蜀地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由古代蜀国和巴国相对隔离的城市发展状态进入到纳入秦国乃至全国城市发展的体系之中。

二 蜀郡郡县城市

秦统一巴蜀一段时期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和管辖,遂逐渐开始在此实行郡县制度,将原来蜀国、巴国的故地二分为三,分置蜀、巴及汉中三郡。蜀郡的范围已小于战国时期蜀国的地域,秦筑成都以为蜀郡郡治,郡下设县,蜀郡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可划分为郡治城市和县治城市两级,二者在规模上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又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广泛地域内的城市网络体系。

1. 郡治成都

关于秦筑成都以及秦时成都的情况,《华阳国志·蜀志》写道:

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闾,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鱼畋之地也。

(周赧王)十七年,(秦)闻恚无罪冤死,使使迎丧入葬之

郭内。……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立祠。^①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引扬雄《蜀王本纪》也有较为相似的记载：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

周赧王五年秦惠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11年^②，张仪与张若主持兴修了成都城。秦成都城的建设当以开明蜀国的故城为基础^③，具体位置在今成都市区内^④。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据测算，城市（城墙内）面积约有2.25平方公里^⑤，城墙高约17.1米^⑥。为筑成高大的墙体，“去城十里”大量取土，留下了万岁池、龙坝池、千秋池、柳池等水塘。从秦筑成都墙体来看，开明蜀国时期成都城并未有土质城垣的修建。成都作为郡治城市，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城市面积可能小于作为蜀国开明王朝都城的成都。城市人口数量应较多，为加强对蜀地的统治，秦王朝“移秦民万家实蜀，百工技艺，

①（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②《成都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的《从云梦秦简探讨巴蜀史上的三个问题》一文，论述秦筑成都的具体时间在公元前311年10月至前310年9月。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③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④据刘琳考证：大城南城墙在今成都文庙后街，北城墙约在西玉龙街之南，东城墙约在盐市口一带；少城西南墙在今通惠门之东、下同仁路口附近，北城墙大致在今红光东路以南。少城毁于东晋时期，大城毁于宋末。见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⑤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⑥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多在其中,与蜀民同处一城”^①,成都城中有大量的秦地移民。

秦成都城由大城和少城两大部分组成。“张仪既筑大城,为军事政治中心,继筑少城,为经济重心。”^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67云:“张仪既筑大城,后一年,又筑少城。”成都城的建造有许多传说,如干宝《搜神记》卷13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据此,人们认为“成都城形方位不正,非方非圆,又因西有少城,故东西狭而南北长,大体为不规则之长方形。所谓曲缩如龟,大约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乃顺地势形态之自然趋势。”^③此说不足为信,成都附近地势平坦,没有必要将城筑成曲缩的不规则形,且从三星堆遗址来看,早在商代蜀国的城垣即较为规则,战国时期秦国也未有此类曲缩不规则形的城垣形态。据考证,龟城指张仪所筑成都大城,“城盖微狭长,六门如龟之有首、尾、四脚,故有‘龟城’之称”。^④“亚以少城,接于其西”^⑤,秦成都城平面呈长方形,中间隔有南北向的城墙,少城在西,大城在东,大城、少城南北长度相同,只是东西宽度有大小之别。^⑥大城设有六座城门,可考者北曰咸阳门,南曰江桥门;西面

①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②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③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④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注。

⑤ 左思:《蜀都赋》,载萧统编:《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 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巴蜀书社1986年版,“城郭”与“城门”部分。

与少城间城墙开有两座城门,北曰宣明门,南曰阳城门;东城墙设有两座城门,具体名称已不可得知。《太平寰宇记》引李膺《益州记》云:“(少城)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少城在西,亦应当设有六座城门(包括与大城共用的两个城门),具体情况尚不清楚。^①《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李冰为蜀郡郡守之时,穿郫江、检江,使其双流郡治成都城之南,为成都提供了生产、生活和交通的便利,促进了成都城市的发展。(见图 11—1)

秦成都城已经具有明确的功能区域划分。大城为郡治所在,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应当至少有行政区、仓储区(“造作下仓”)、军队驻扎区(城内专门用于安全保卫等的军队生活驻扎的区域)和居住区等的划分。少城有成都县治,“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阡,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少城之中,设有专门的盐、铁、市官等,也有专门的市场区域,从中可以看出这里除了行政区和居住区之外,还有手工作坊区和商业贸易区的划分。这里的“与咸阳同制”指的是“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和“市张列肆”,即在成都采用秦都咸阳的市场和城市行政管理制度。^② 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就设有专门的市场^③,秦将其管理制度较早的推行到了蜀郡成都。

成都作为蜀郡的郡治城市,自然是蜀郡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中心所在,其城市功能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其中城市市场

①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1 页注。

② 可参考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4 期;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李令福:《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0—151 页。

③ 袁仲一:《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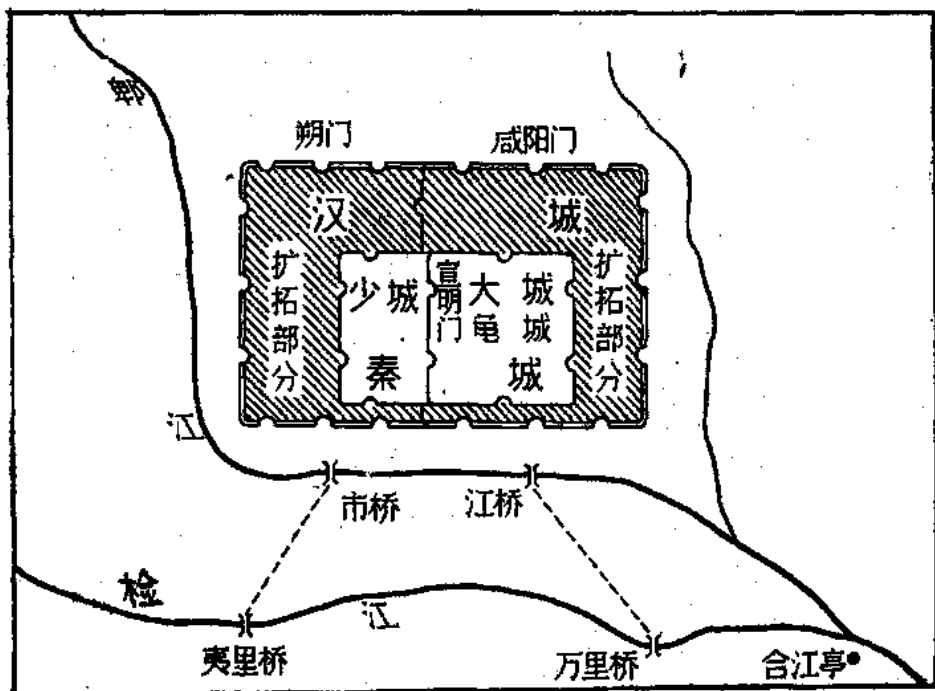


图 11—1 蜀郡成都城市平面示意图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繁荣,商业发达,商贸功能突出。少城之中,“市张列肆”,置有盐、铁、市官等,对市场商店进行专门管理^①,反映出城市市场和商业的发达。左思《蜀都赋》云:“亚以少城,接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市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②可以看到成都城内商品丰富,商人众多,市场繁盛。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农业

① 依据《秦律》,对于市场商店的管理如同对居民的管理一样,以五家为一“伍”,设有“列伍长”,协助管理监督商人的商业活动。对于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官营商业的现金收入,规定经手人收到现金必须当场放入“钱龠”中,由“介者”从旁监督,否则罚缴铠甲一件。见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版,第 128 页。

②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发达,物产丰富,成都作为郡治所在,地处平原的腹心地带,水陆交通方便,这样,成都城市很自然成长为蜀郡商贸最为发达的中心城市。成都作为蜀郡的中心城市,统领着下一级的县治城市,构成了蜀郡整个城市体系的核心和枢纽。

2. 县治城市

战国后期,秦在巴、蜀两国故地分置蜀郡、巴郡和汉中郡,其中,蜀郡属县今可考者有成都、郫、临邛、广都、繁、沮、葭萌、湔氐、武阳、严道、犍道、南安、汁方、青衣、新都、鄆、资中、梓潼、汉阳等 19 县,从中可以看出蜀郡县治城市的空间分布概况,这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仅将其中治所城市较为清楚者分述如下(见图 11—2)①:

成都县:《华阳国志·蜀志》云:“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成都县下载:“自秦、汉至国初已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战国时秦已在蜀郡下设置成都县,县治原在赤里街,秦成都城建成后,治所迁到成都少城内,具体位置在今成都市区内。少城内部布局分工明确,工商业极为繁荣。成都县治与蜀郡郡治同处成都城中。

郫县:杜宇蜀国曾都于此,秦置县。《华阳国志·蜀志》载:“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可见秦所筑县治郫城的规模。《元和郡县图志》卷 31:“秦灭蜀,因而县之。”“故郫城在今县北五十步。”《读史方輿纪要》卷 67 云:“郫城即古杜鹃城。”关于郫城的具体位置长期以来莫衷一是,陈剑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结合文献记载,

①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 页;罗开玉:《四川通史》第 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4 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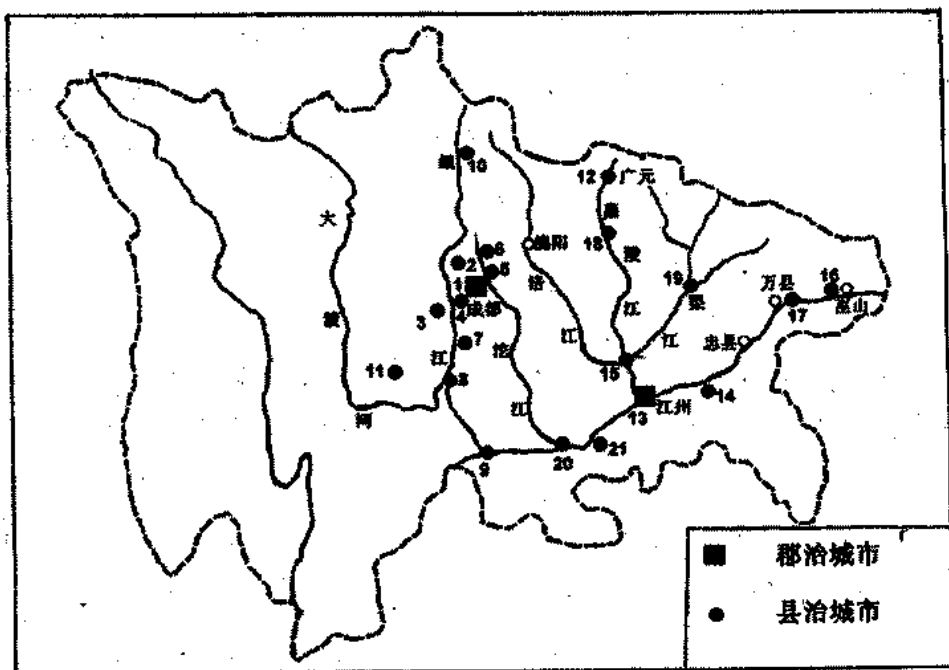


图 11—2 巴蜀郡县城市分布示意图

蜀郡郡治:成都;县治:1. 成都 2. 郫 3. 临邛 4. 广都 5. 新都 6. 繁 7. 武
阳 8. 南安 9. 犍道 10. 湍氏 11. 严道 12. 葭萌

巴郡郡治：江州；县治：13. 江州 14. 枳 15. 垫江 16. 鱼复 17. 胸忍 18. 阆中
19. 宕渠 20. 江阳 21. 符

提出古杜鹃城为汉代所建,可能属西汉郫县县城;杜宇郫邑后为秦灭蜀后所建郫城、秦的郫县县城相沿袭,具体位置可能在彭州濛阳、竹瓦、清白等地一带(青白江、濛阳河流经地区)。^①

临邛县:《华阳国志·蜀志》载:秦筑临邛城,“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秦置临邛县,县治临邛城,临邛城址在今邛崃县临邛镇。战国秦时,临邛与成都、郫城共同构成了成都平原中心地带。

① 陈剑：《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的最为核心的三座城市。

广都县：《蜀王本纪》云：“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广都是开明蜀国的都城所在。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穿广都盐井。广都原为蜀国故都所在地，秦治蜀时可能置广都县，县治当在原蜀国旧城。

繁县：据《读史方輿纪要》载，彭县，秦时为蜀郡繁县地。秦置繁县，以繁江（今青白江）得名，两汉因之。关于繁县县治所在，《元一统志》谓“在九陇故县（即今彭县治）东四十里”，嘉靖《四川总志》说在“新繁东北三十五里”，《读史方輿纪要》提出在“新繁东北三十里”。①

武阳县：《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秦伐蜀，蜀王开明退走武阳，被秦军追获。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秦因置武阳县，属蜀郡。两汉因之。《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武阳故城在今眉州隆山县（今彭山县）东。”《太平寰宇记》卷74云：“故武阳城在（彭山）县东北十五里，相传云秦惠王时张仪所筑。”秦置武阳县，县治武阳城，故城在今彭山县境内。

南安县：《水经注·江水》载：“（南安）县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凿平南安湫崖。《史记·高祖功臣年表》载，在高祖六年曾封有南安侯。据此看来，秦应建置有南安县，汉代因之，县治故城即今乐山市治所。

犍道县：原为蜀国故犍人城邑所在，据《輿地广记》卷31载，秦已置县，两汉、蜀、晋因之。县治犍道故城即今宜宾市。

湔氏县：秦置湔氏县，两汉曰湔氏道。《华阳国志·蜀志》云：

① 陈剑认为繁县为汉代新置，秦并未有此县设置。（陈剑：《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李冰)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水经注·江水》载:“江水自天彭阙东经汶关而历氐道县北,……县本秦始皇置,后为升迁县也。”秦湔氐县县治故城应在今松潘县北的元坝子。

严道县:据《史记·樗里子传》记载,秦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12年),“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索隐》云:“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南史·刘俊传》载:“青衣水左侧并是秦之严道地。”《元和郡县图志》卷32云:“严道县本秦旧县。”可知秦时已建置严道县,《清一统志》谓严道县治严道故城即今荣经县治。据考,今荣经城西五里有古城坪,古城坪当是严道城,县境约是今荣经县和雅安青衣江以南之地。^① 1974—1984年间,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今四川荣经县城以西发现并发掘了严道古城。城址由主城和子城两部分组成。主城平面为近似正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75米,仅有南垣和东北角保存较好,南垣中部有城门遗迹。子城在主城之北,南垣与主城北垣西段重合,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270米。据分析可知:该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兴盛于战国秦汉,衰落于魏晋;子城附属于主城,为主城建成后所增建。^② “从城的规模形制来看,其大城最有可能营建于秦置蜀郡而以严道为属县之际”。^③

葭萌县:《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葭萌为蜀国故城,秦当置县,县治应为葭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05页注。

② 赵殿增、李晓鸥、陈显双:《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曲英杰:《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萌故城,地处今嘉陵江与白龙江交汇处西南的广元昭化一带。^①

新都县:依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开明蜀国曾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新都是蜀国的重要城市。李冰时仍有新都县,说明秦灭蜀后设置郡县,新都县为秦新置,辖区为今四川新都和金堂。

三 巴郡郡县城市

战国时期,巴国受到东面的强大楚国的战争威胁,遂沿嘉陵江北上,退保阆中,后又为秦所灭。秦初置巴郡,并筑阆中城,当以阆中为郡治。其时,巴国故地长江一带东部尚为楚国占有。随着秦对楚的战争并最终消灭楚国,秦巴郡郡治也从阆中迁移到了江州。巴郡下设属县,今可考者有12个,即江州、阆中、垫江、鱼复、朐忍、枳、宕渠、江阳、符、夜郎、鳖、且兰等县,这里依据已有研究成果,仅对其中治所城市较为清楚者简要总结如下(并见图11—2):^②

江州县:秦置江州县,隶属巴郡。县治江州城,与巴郡郡治同城。江州原为巴国国都。秦筑江州城,《华阳国志》云“仪城江州”,《舆地纪胜》卷175载“古江州城,东接(渝)州城,西接(巴)县城,《巴中记》云:张仪所筑”。秦人采用北方筑城技术和方法,始筑江州城土质城垣,推行秦国文化和政策。秦江州故城地处今

① 可参考: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51页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注。

② 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重庆市区内,具体位置在今重庆市渝中区近半岛尖端处。^①(秦江州城被称为“南城”,汉代郡府在江北嘴,被称为“北府城”)

枳县:原巴国地,据《华阳国志》记载,巴人曾都于枳,战国后期一度为楚所占(《史记·苏秦列传》:“楚得枳而国亡”),秦灭楚后,在此置枳县,隶属巴郡。《元和郡县图志》卷30云:“(涪)州城本秦枳县城也”,《太平寰宇记》卷120说:“宾化县,秦为枳县地”。枳县治所在今涪陵市城区。

垫江县:据《华阳国志》的《巴志》记载,垫江原为巴国都城之一,《汉书·地理志》有垫江县,秦因袭巴国城市垫江,在巴郡之下应建置垫江县,县治当为原垫江故城,具体位置在今重庆合川市南津街。

鱼复县: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秦置有鱼复县,隶属巴郡。《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鱼复县故城在今奉节县东13里的白帝山上,公孙述改名白帝城。^②

胸忍县:据《太平寰宇记》卷137载:“开州,秦汉之代为巴郡胸忍县地。”可知秦已置胸忍县,隶属巴郡。《后汉书·吴汉传》李贤注云:胸忍“故城今夔州云安县(今重庆云阳县)西万户故城是也。”秦胸忍故城在今重庆云阳县的双江镇。^③

阆中县:《輿地纪胜》卷185载:“《元和郡县图志》云:(阆州)在秦为巴郡阆中县也。”又“《九域志》云:阆中古城本张仪筑也。《图经》云: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遂筑此城,今仪庙存焉。”阆中,战国时期曾为巴国国都,秦初设巴郡,阆中为郡治,同时也是秦

① 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77页注。

③ 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置阆中县的治所。秦筑阆中古城当以原巴国都城为基础,但新筑有城墙。秦阆中故城位置即今阆中治所。

宕渠县:据《华阳国志·巴志》和《蜀王本纪》所载可知,秦时已有“宕渠”之名,秦时当已置县。《后汉书·吴汉传》李贤注:“宕渠,山名,因以名县,故城在今流江县东北,俗名车骑城。”秦宕渠县治故城在今四川省渠县的土溪镇。^①近年来,渠县土溪镇城坝村发现汉代城址,“对进一步认识战国至西汉的城市的功能、城市的分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②

江阳县:据《太平寰宇记》卷8记载,秦为巴郡,汉为犍为郡的江阳、符两县。秦当置有江阳县,隶属巴郡,县治故城在今四川省泸州市的市中区。

符县:依据《太平寰宇记》卷8所载,秦应置有符县,隶属巴郡,县治故城当在今四川省合江县境内。^③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99页注。

② 陈卫东、周科华:《嘉陵江流域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22日1版。

③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第十二章 先秦巴蜀城市的特点与地位

先秦巴蜀城市受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和地域性特点,先秦巴蜀城市在巴蜀地区城市史和中国城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总结分析古代蜀国和巴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与地位,对于深化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区域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巴蜀城市的特点及其成因

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不仅在时间上表现出其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空间上,蜀国城市和巴国城市也体现出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和地域特色。这种历史现象的形成,是与巴蜀先民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1. 城市发展的特点

通过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我们可对历史现象的某些特征进行一定把握。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看出:先秦蜀国与巴国的城市发展不仅呈现出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差异;而且在空间上表现出城市分布、建设、形态、迁移等诸多地域特色和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

(1) 阶段性特点。

古蜀国的城市发展伴随着其国家政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从纵向来看,其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具体说来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城市的起源阶段。就目前来说,成都平原发现的宝墩遗址等8座史前城址是其典型代表,这些城址都筑有城垣,多数还发现壕沟,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其他形状,城垣有单圈和双圈之分,城址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反映出了蜀地城市、国家和文明社会的起源,据此,可将古蜀国的城市起源追溯到距今4500年以前;二是开明王朝以前古蜀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国都,从城址发现和出土文物分析,此时古蜀国已进入文明社会,国家已经完全形成,蜀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业已形成。杜宇取代鱼凫之后,蜀国城市继续得以发展,以成都市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曾是杜宇蜀国的国都。这一时期蜀国的城市在规模上已超过以前,并且继续筑有土质城垣,城市内部已具有较为明确的区域划分,在城市的功能中宗教祭祀功能极为突出;三是开明蜀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开明氏以异族入主蜀国,其文化(与巴楚文化关系密切)与蜀文化融合的同时,促使蜀文化出现新的发展变化,在城市建设上,以木栅作为城市界标而取代了古蜀国原已有之的夯筑城垣的传统,在城市的功能中商业功能较为突出;四是蜀国灭亡后蜀地城市的发展。秦灭蜀后,受秦国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蜀地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蜀国消亡,逐渐代之以郡县建置,蜀地城市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数量增加,城市筑有城垣,城市呈现郡、县二级网络体系。

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对巴国城市的认识非常有限。巴国城市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不过,从《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

来看,战国时期巴国的城市已经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巴国业已形成,社会已处在文明阶段。这一时期的巴国城市由于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城市发展具有较高的水平。秦灭巴国后开始逐步设置郡县,将川东巴地的城市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受秦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巴地城市开始建筑城垣,城市的数量也较前有所增加,巴地城市发展开始融入全国城市的发展体系当中。

先秦蜀国的发展以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为核心,巴国最迟至春秋战国之际迁徙到了川东地区,由于地缘上的关系,蜀文化和巴文化在战国以后相互影响不断增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①这则资料就反映了蜀国农业对于巴国的重要影响。“我国古代的蜀和巴是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个王国。”“蜀和巴是两支各自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以至出现了一些共有的文化因素。”^②秦灭蜀后,随即消灭了巴国,战国后期,秦在巴、蜀故地设置郡县,采取统一的制度和文 化,巴文化与蜀文化在吸收秦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了巴蜀文化,巴、蜀两地的城市发展开始步入同一步调并纳入全国城市发展的统一体系当中,同处四川盆地的两地城市同时迈入了统一的新的发展阶段。

①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② 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2) 地域性特点。

先秦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巴国比较,古蜀国城市的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早在距今 4500 年前,蜀地城市就开始起源,到三星堆遗址时期,古蜀国的城市业已完全形成,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内部功能分区较为清晰。杜宇和开明蜀国时期,城市数量较前增多,成都作为国都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功能齐全,特别是经济功能极为显著。在巴国,到战国时期,其城市规模依然较小,城市的军事功能较为明显,与同期蜀国城市比较,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蜀国城市和巴国城市的历史发展显现出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区域差异。秦统一巴蜀后,巴、蜀城市发展的这种差异随着两地推行郡县制度而渐趋一致。

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还展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地域特点。

其一,在城市的地理分布方面,蜀和巴的城市各有不同。蜀国城市从考古发现来看,不管是起源阶段的宝墩文化史前城址,还是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都城遗址三星堆城址、金沙遗址等,都分布于地势平坦的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且临近河流,是生产生活自然条件极其优越的地区。而文献中提到的古蜀国的诸多城市也多分布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带。秦灭蜀国后,蜀地郡县城市的分布也是以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为中心,由密至疏大体呈辐射状分布,并多靠近附近河流。与蜀国有所差异,巴国地处川东丘陵山地地区,城市地理分布充分考虑到对河流水源和地形的利用,城市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坝子)之上,就目前所知,巴国城市分布于长江和嘉陵江沿岸的较为狭小的台地当中。

其二,在城市建设方面,蜀与巴也有所区别。仅从城市防御来说,蜀国城市多建有城垣设施。成都平原发现的 8 座史前城址均

建有城垣,外有环壕或护城河;三星堆遗址古城筑有高大墙体,外有护城壕沟;金沙遗址应为杜宇蜀国的国都,也应建有城垣环壕设施;秦灭蜀后广建郡县,建筑城垣。应该说,先秦蜀国的城市建设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重视城垣环壕的建筑。巴国城市建设具有不同特点,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来看,其城市可能并未建有土质城垣,而是以木栅为城,“虽说一是‘木栅栏’,一是‘土城垣’,其建筑采用的原材料不同,但其用途和性能则是一样的。”^①巴国城市建设栅城作为城市的防御设施。

其三,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形态各具特点。早在城市起源阶段,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古城形态并未形成统一形式,有长方形(包括规则和不规则的两种形式)城垣,也有少见的六边形城垣;有单层的长方形城垣,也有双层的长方形城垣。并且城市形态的走向往往与附近河流流向有密切关系。鱼凫蜀国时期的三星堆城市具有长方形的城市形态,并与城北河流的水流方向一致。秦灭蜀国后的郡县城市多属于方形的城市形态。可以看出,从不规则到规则的方形城市形态的形成,蜀国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巴国城市选建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之上,往往因地制宜,依地势而建,树栅为城,城市形态可能不甚规整。

其四,蜀国和巴国都城位置的迁移情况有所不同。蜀国早期的发展经历了由四川盆地西北部岷江上游地区^②逐渐向成都平原迁移的历史过程,至文明社会前夕,成都平原形成了众多的古城。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兴建了古蜀国的鱼凫国都——三星

① 杨华:《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重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② 蒋成、陈剑:《岷江上游先民的史前家园——营盘山遗址》,何一民、王毅、蒋成主编:《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堆古城。此后的杜宇和开明时期,始终在平原中心地区的成都建立国都。而文献中提到的古蜀国的其他都城,也始终不离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可以看出,古蜀国的都城始终地处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都城的地理位置变化较小。文献中记载的巴国都城处长江及嘉陵江沿岸地带,都城规模偏小。这些都城应有时间上的前后不同,巴国都城位置沿着河流地带迁移较大。

2. 城市特点的成因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基本的文化裂隙是阶级与职业(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化裂隙,也是地区(是个可以层层相套的精巧层级)的文化裂隙,而不是城市与腹地的文化裂隙。”^①古代蜀国和巴国在城市发展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既是蜀文化和巴文化两种文化差异的体现,又受到了不同地域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和文化等人文环境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川西和川东地区虽同处四川盆地之中,气候极为相似,但两地地貌差别较大。川西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土壤肥沃,河流密布,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利于早期农业的开展,是早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良好处所。川东为平行岭谷地带,只有河流两岸的台地适合早期人类的生产、生存和发展,与川西平原相比,自然条件要稍差一些。“巴、蜀文明的差异同样可以反映它们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或者说它们文明差异的自然基础纯粹是由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所决定的。”^②古蜀国的发展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城市分布自

①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9页。

②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然选择了地理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区,城市的建设可就地就近取土构筑城垣和环壕,城市形态可根据其思想认识构筑而不必过多受制于自然环境,城市靠近河流可方便解决生产生活用水等问题。巴国地处川东地区,城市选建于河流沿岸的狭窄台地,这是对当地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因此也影响到巴国城市的分布与形态等;由于山林茂密,地势险要,巴国城市利用这些条件,形成了树栅为城的城市建设特点。自然环境的差异,对蜀国和巴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巴、蜀又同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之中,这种地理环境对于蜀文化、巴文化相互影响的不断加深以至于战国以后巴、蜀文化融合一体,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巴、蜀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也有所反映。

先秦蜀国和巴国社会环境的差异,对于其城市发展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起源较早,古蜀国农业经济极为发达,并且工商业发展较早,这些不仅影响到了城市的分布与迁移,而且为高大城垣的兴建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蜀国城市的历史发展水平。蜀地从史前时期就有筑城的文化传统,蜀国建立后,鱼凫国都依然传承了这种历史文化,城市兴修有巨大城垣和环壕,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古蜀国城市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巴国可耕地狭小,农业发展较迟,发展水平偏低,渔猎经济占有重要份额,生产生活方式多具有流动不定的特点,这些对于其城市特点的形成和城市发展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巴人天性劲勇”、“巴师勇锐”^①,巴族具有崇尚武力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城市建设因而可能未有修筑城垣的习惯,巴国城市不筑高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大城垣,“当不奇怪”。^① 战国时期,巴国处于战争频繁的环境当中,加之政局动荡,且有不时迁移的可能,因而城市建设不可能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大规模兴修城垣,权且以木栅作为城市的防御屏障。

二 巴蜀城市的历史地位

先秦巴蜀城市的历史发展是巴蜀地区城市史上的早期阶段,具有显著的特点,构成了该地区城市史的特殊历史时期。同时,早期巴蜀城市史又是中国早期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诸多特性。

1. 巴蜀地区城市史上的特殊时期

巴蜀地区城市史作为中国区域城市史之一,其城市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早在距今约4500年左右,该地区成都平原就有大量古城形成,显示出当地已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夕,正处于城市历史的起源阶段。此后,四川盆地逐渐进入文明社会,真正的城市开始形成,城市发展迈入早期历史阶段,古蜀国的三星堆古城与金沙成都城就是其代表。巴人到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川东地区,巴国在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广建城市,城市和社会发展也处于文明社会阶段。秦灭蜀国和巴国之后,开始在巴蜀地区逐步实施郡县制度,郡县城市发展纳入秦的城市体系当中。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构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领导下全国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先秦时期巴蜀城市的发展构成了巴蜀地区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

^①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巴蜀城市的发展是巴蜀地区城市史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城市发展是在与其他地域政权和文化联系相对较少、在地形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演进。古蜀国城市演进经历了独立的发展轨迹,从城市起源到城市形成再到城市的早期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在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城市特征。秦灭蜀国和巴国,中断了古蜀国和巴国城市发展的原有道路,巴蜀地区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的城市演进及最终为秦所中断,使得巴蜀地区城市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巴蜀文化是一个在一定地理环境中发育生长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形成历史久远。先秦时期是巴蜀文化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古蜀国和巴国的文化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与融合,形成了早期巴蜀文化显著的地域特色。先秦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构成了早期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出巴蜀文化的地域特点。

2. 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受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性特点的影响,各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在早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华文明就是多元起源共同发展并最终融合为一体的,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反映出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多元起源的特点。不同地域的城市起源处在相对独立的历史过程当中,发展速度和水平具有一定差异。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率先在中原形成。随着中原王朝的更替

和疆域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地域的城市发展开始纳入统一的城市发展体系之中,随着秦统一帝国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城市发展体系最终形成。多元起源和形成、不平衡发展并渐趋一统的特点构成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

先秦巴蜀的城市发展是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多元起源、不平衡发展、相互融合、渐趋一统等方面的特点。由于四川盆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蜀地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进行的,与其他地域的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体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的多元起源、共同发展的特点。古蜀国城市的发展要快于和高于同处四川盆地东部川东地区的巴国的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但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城市的发展相比较,这种优势并非明显,从中可看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古代巴蜀的城市发展也是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不仅相互之间互有影响,而且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中原王朝和楚国等地文化的重要影响,直至秦灭巴、蜀,蜀地、巴地直接得到秦文化的作用,巴蜀地区的城市发展开始纳入大一统帝国的城市网络和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充分展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渐趋一统的特点。

先秦巴蜀城市发展不仅在时间上隶属于中国早期城市,体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某些特点;而且在空间上属于中国早期城市史的区域之一,显现出中国早期城市演进的区域差异。先秦时期古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产生了诸多的地域特征,形成了与其他区域城市发展的显著区别,充分展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及其特点。正如早期巴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先秦巴蜀城市发展在中国早期城市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长沙: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 1999 年版。
3. [德]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4.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84 年版。
5.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6. (晋)郭璞:《山海经》,长沙:岳麓书社 1992 年版。
7.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8. [美]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9.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10.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11.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12.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

13. (清)陈登龙:《蜀水考》,成都:巴蜀书社 1985 年版。

14.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1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16.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17. [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8. [日]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成都:巴蜀书社 2002 年版。

19. [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21. [英]A. 高迪著,邢嘉明等译:《环境变迁》,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1 年版。

22. [英]柴尔德著,周进楷译,周谷城校:《远古文化史》,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

23.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24.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25. 《罗家坝遗址笔谈》,《四川文物》2003 年第 6 期。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7.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8. 《中国文物报》,1985—2006年。

29. 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30. 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1. 曹兵武:《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32. 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3. 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34. 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5. 陈剑:《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36.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37. 陈淑卿、王芬:《重庆余家坝巴人墓地的发掘收获》,《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8. 陈淑全:《四川气候》,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39.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时代、性质的再讨论》,《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

40.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41. 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集,1989年。

42.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43.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44.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4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

46.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4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4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4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5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日本]阿普(ARP)有限会社2000年版。

5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考古》2002年第7期。

5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4. 邓少琴:《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55.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56. 杜葆仁等:《秦城址考古述略》,《文博》1986年第1期。

57.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58. 杜瑜:《中外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的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59. 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60. 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12月第51本第4分。

61. 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

62. 段渝、谭洛非:《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3. 段渝、邹一清:《成都城市聚合形成模式的中外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64. 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65. 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

究为例》，《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66.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7.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8.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9. 伏元杰：《蜀王开明氏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

70. 傅崇兰、孟祥才、曲英杰、吴承照：《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1.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2. 傅顺等：《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73. 傅顺等：《金沙遗址古环境状况的综合探讨》，《中国地质》2005年第3期。

74. 傅兆君：《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75.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76. 高大伦：《古蜀国鱼凫世钩沉》，《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

77. 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78.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线

的推移》，载《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9. 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80.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1.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2. 管维良主编：《重庆民族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83.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84. 何一民：《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5.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6. 何兹全：《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87. 贺业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

88. 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89. 贺云翱：《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90.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91.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上海:新知书店 1947 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年修订版。

92. 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93. 黄春长:《环境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94. 黄剑华:《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四川文物》2002 年第 5 期。

95. 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4 期。

96.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97.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 年第 1 期。

98.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宿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9—721 页。

99. 姜芑:《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 年第 4 期。

100. 姜芑:《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2 期。

101. 姜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 3 期。

102. 姜世碧:《成都平原的环境对蜀文化聚落建筑与经济的影响》,《四川文物》2003 年第 2 期。

103. 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8 年第 4 期。

1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 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 2001 年版。

105.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2 辑。

106. 李复华:《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5 期。

107. 李令福:《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108. 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109.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110.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11.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12. 林向:《巴蜀考古与三大起源问题》,《文史杂志》1999 年第 1 期。

113. 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

114. 林向:《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成都平原的考古最新发现》,《中华文化论坛》2001 年第 4 期。

115. 林向:《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四川文物》1988 年第 5 期。

116. 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117.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8. 刘文鹏:《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19. 罗开玉:《成都城的形成和秦的改建》,《成都文物》1989年第1期。

120. 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121.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2. 罗世烈、林向、彭邦本、彭裕商主编:《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天津:历史教学社1995年版。

123. 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4.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5. 毛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6. 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127. 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8.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9. 蒙文通:《古地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130. 孟广涵主编:《历史科学与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131.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版),成都:巴蜀书社 1998 年版。

132. 彭伯通:《古代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1 年版。

133. 彭卫等主编:《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34.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135.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36.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37. 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138. 曲英杰:《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139. 曲英杰:《楚吴越三都城综论》,《东南文化》1992 年第 2 期。

140.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141. 曲英杰:《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州学刊》1985 年第 3 期。

142.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43. 曲英杰:《周代都城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144.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45. 任美镔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146. 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147.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8.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149. 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0. 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151. 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152. 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153.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154.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5.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1990)、第5辑(1992),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993年版。

156.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管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7.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158.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159.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60 年版。

160.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载《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161.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 年第 6 期。

162.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6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 年第 2 期。

16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16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5 期。

16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0 期。

16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第 4 期。

168.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8 期。

16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17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17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17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 200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9 期。

173. 宋俊岭:《城市的定义和本质》,《北京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174.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75. 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 年第 2 期。

176.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 年第 5 期。

17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30—131 页。

178.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79. 孙机:《巴蜀为郡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2 期。

180. 孙家洲主编:《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济南:泰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181.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8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1—8 册,北京: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183.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城

市史研究》第1—23辑,天津教育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相继出版。

184.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185. 田敏:《先秦巴族族源综论》,《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

186. 田银生:《自然环境——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首重因素》,《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4期。

187.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188.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9. 童恩正:《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90. 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

191. 王德奎、赵均中主编:《人文初祖黄帝元妃养蚕治丝发明家嫫祖研究》,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2. 王恩涌编著:《文化地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93.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94. 王和:《古史研究期待理论突破》,载2001年9月6日《光明日报》。

195. 王和:《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196. 王和:《史学的发展依赖于理论更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97.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8. 王妙发:《黄河流域的史前聚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9. 王瑞成:《中国城市史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0. 王文才:《成都城坊考》,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

201. 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2. 王毅、蒋成、江章华:《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203. 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与“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204.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5.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6. 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07. 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208.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9.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0. 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11. 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学术月刊》1996 年第 3 期。

21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年版。

213.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14. 徐良高:《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载《远望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215.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216. 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年版。

217.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21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219.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20. 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221. 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222.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223. 严文明、〔日〕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224. 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初析》,《四川文物》2002 年第 3 期。

225. 燕庄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226. 杨鸿勋:《宫殿考古学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版。

227. 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上)、(下),《四川三峡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4 期。

228. 杨华:《从考古资料寻找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的新线索》,《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229. 杨华:《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遗迹的考古与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

230. 杨华:《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上)、(下),《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3 期。

231.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32.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3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234. 杨铭:《巴人源出东夷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235. 杨生民:《论春秋战国的市》,《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36. 姚轶锋等:《成都金沙遗址距今3000年的古气候探讨》,《古地理学报》2005年第4期。
237. 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8.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39. 袁仲一:《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240. 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24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42. 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243. 张国硕、阴春枝:《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44.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5. 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246. 张鸿雁:《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47. 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48.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49.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50.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1. 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2. 赵殿增、李晓鸥、陈显双:《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53.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254. 赵殿增:《竹瓦街铜器群与杜宇氏蜀国》,《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255. 知原主编:《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256.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主编:《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7. 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20辑,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

258.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59.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

理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26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1 年版。

2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2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26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64.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 1996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 期。

265. 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巴渝文化》第 1—4 辑，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

266.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庆建置沿革》，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

267.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年版。

268.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69.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270. 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271. 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5 期。

272. 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273. 朱政惠:《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当代中国史学趋势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274.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75. 庄林德、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6.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77.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278.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后 记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早期城市研究——以古代巴蜀为例》的基础上经进一步补充修订而成,同时属于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重点资助项目“先秦巴蜀城市研究”的最终成果,也属于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流域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阶段成果。

笔者在四川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以及书稿的写作和修订完成等,曾得到了来自老师、朋友和同学的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使得在学术方面获益良多,并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川大期间,导师隗瀛涛教授不仅在学问方面经常给予指导,为书稿的完成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并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而且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以求的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5年10月,先生又为书稿拨冗赐序,并鼓励继续丰富材料争取早日出版。然而,在拙著尚未出版之时,隗先生却于2007年1月14日突然辞世,令人悲痛欲绝。在此,谨向恩师的培养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恩师的去世表示深切的悼念。此外,师母及其家人在生活方面也曾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研究员是古代巴蜀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近年来成果尤为丰硕,笔者曾就博士后研究报告多次向其请教,深受教益并获赠资料。后又出任笔者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委员会主席,为书稿的修订完善提出指导性意见。其后,继续在巴蜀城市史课题研究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使笔者受益良多。对于段先生长期以来的帮助和指教,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何一民教授。川大期间,曾有幸听取何老师为其博士生开设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课程并参加讨论,当面聆听教诲,并与城市研究所的蔡云辉、周波、邱国盛、范瑛、谯珊、冉华德、鲍成志等博士生们常常相互切磋,使得时时受益。何老师还常常就研究报告的完成和书稿的修改完善加以赐教,使我深受教益。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继和先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教授,与隗瀛涛、段渝、何一民等先生一起,作为笔者出站报告答辩委员会成员,在肯定研究报告价值的同时,就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他们的鼓励和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川大求学期间还得到了郭声波研究员(现就职暨南大学)、谢放教授(现就职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心和帮助,历史文化学院王挺之教授、孙锦泉教授以及缪元朗、李志勇等老师,学报编辑部徐亮工先生,人事处主管博士后工作的易岗颖老师,也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对于诸位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成都市考古队王毅研究员、江章华研究员在资料方面提供的支持,感谢三星堆博物馆在考察方面提供的方便,感谢陕

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对于课题写作给予的指导、关心和帮助,感谢重庆出版社曾海龙先生、宝鸡文理学院康少峰博士、郑州大学陈隆文博士等朋友、同学在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赵殿增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晓春博士对于书稿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邹一清先生在课题研究方面的帮助。书稿的完成得到了众多师友的支持,使我感念不已。

此外,西南大学朱圣钟先生帮助完成书稿图幅的绘制,大连大学王善军研究员在学术研究等方面时时给予提携,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张祖立先生在诸多方面多予帮助,大连大学科技处支持书稿的出版,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先生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为本书出版付出艰辛劳动,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令人感动,在此特致衷心谢忱。

长期以来,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学业和工作,无暇旁及他事。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然而由于愚钝和懈怠,事业至今无成,时感惶恐不安。对于日渐年迈的父母难尽孝道,对于家庭少有顾及,想到这些,心中时时忐忑不宁,充满愧疚之感。今值本书出版之时,谨对父母的养育和家庭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以现有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将二者密切结合,从城市史的角度对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的城市发展进行初步探讨。由于涉足古代巴蜀学术研究领域较晚,且学力所限,加之文献资料的欠缺和相关考古资料的局限,本书对于先秦巴蜀城市史的初步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还非常有限,提出的许多观点还很不成熟,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尽管如此,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是与诸多老师、朋友和同学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笔者将以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作为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争

取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有所进步和作为,惟有如此,方是对各方面帮助和支持的最好报答。

毛 曦

2007 年 5 月于大连



ISBN 978-7-01-006960-9



9 787010 069609 >

定价：22.00元